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后“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丰富、客观的社会经济问题解读视野。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高效帮助国内学子、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及专业培训，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旨在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致力于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主编：徐梦瑶 李封乾 校对：冯帅章 卢晶亮 张晓

## 2018 Workshop on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JNU, 2018.6.21-23



#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 | 2018 年  
刊 | 4-6 月

- ▶ 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正式启动
- ▶ 我院助理教授蔡澍的独立作者论文被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
- ▶ 我院多个学生科研项目获得立项
- ▶ 我院举办 2018 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
- ▶ 我院举办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

##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广东省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1 月, 研究院“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国家教育部与外专局联合实施的“111 计划”。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三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担任中心主任,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则以“111 计划”引智基地为重要依托,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双方将在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旨在依托研究院的海归师资、专业声誉, 帮助国内学子、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或进行专业培训, 目前已与美国德州 A&M 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 目录 CONTENTS

01	学院要闻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正式启动	01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深度解析	02
	我院多个学生科研项目获得立项	08
	韩嘉玲研究员受聘我院特聘讲座教授、社会调查中心特聘顾问	09
02	科研动态	
	助理教授蔡澍的独立作者论文被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	11
	副教授张思思的合作论文被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期刊接受	11
	助理教授宋彦的合作论文被卫生经济学领域知名期刊 Health Economics 接受	12
	助理教授刘诗濛与孙伟增的合作论文被国际期刊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接受	12
	助理研究员李书娟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内知名期刊《经济研究》	12
03	学术活动	
	学术会议	14
	HCEO 暑期学校	30
	名师讲堂	32
	SEMINAR	33
04	思想聚焦	
	媒体聚焦	40
	黄埔大道西观点文章精选	50
05	数据调查	
	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参加“学生领袖成长计划”调查方法专题讲座	67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68
	2018 AREU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与会嘉宾参观社会调查中心	69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第一轮宣讲会圆满结束	70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预调查顺利开展	72
06	对外交流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访问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74
	匹兹堡大学 Daniel Berkowitz 教授来访我院	75
07	人物专访	
	IESR 人物	77
	名师零距离	86
08	学生天地	
	冯帅章: IESR 小班教学不流于形式, 切实为学生学习助力	89
	点赞! 本科班的“益友型”良师	90
	润物细无声——记 IESR 本科导师制	92
	接轨国际、全英教学, 这两年他们收获了什么?	95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学员顺利结业, 即将赴美	97
	我院举办多场经济学 (国际化创新班) 专业高考招生咨询会	98
09	图说	
	暨南大学五一环校跑活动	101

# 学院要闻

-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正式启动
-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深度解析
- 我院多个学生科研项目获得立项
- 韩嘉玲研究员受聘我院特聘讲座教授、社会调查中心特聘顾问

## 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 联合计划正式启动



CEHD副主任Steven Durlauf教授与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

2018年6月25日晚6点15分，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揭牌仪式在暨南大学中惠楼323室顺利举行。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以下简称联合计划）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以下简称 IESR）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 CEHD）联合发起，由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James J. Heckman 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联合计划旨在促进双方在科学研究、数据收集、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打造联合研究之典范，创造世界一流之成果，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出席此次揭牌仪式的嘉宾有暨南大学副校长张宏、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处长王兵、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处处长蒲若茜、暨南大学财务处处长丁友刚、暨南大学社科处副处长黄晓燕、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及 IESR 师生、芝加哥大学 CEHD 副主任 Steven Durlauf 教授及 2018 HCEO 教师培训项目的所有教师与学员。



出席仪式的暨南大学校领导与HCEO培训项目授课教师

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揭牌仪式由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主持。冯帅章院长对出席揭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及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与感谢，并一一介绍出席嘉宾。

简短介绍之后，暨南大学副校长张宏教授代表暨南大学为此次揭牌仪式致辞。张宏校长首先向远道而来参加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揭牌仪式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ames Heckman 教授及其领导的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中心长期关注人类发展



暨南大学副校长张宏教授发表致辞

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影响深远。Heckman 教授及其团队多次来访暨南大学，通过学术会议、暑期学校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此次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中心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联合研究计划，是双方长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科迈向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张宏校长希望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能够顺利开展，为学术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暨南大学将会继续为这项激动人心的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持。

接下来，CEHD 副主任、芝加哥大学 Steven Durlauf 教授代表芝加哥大学为本次揭牌仪式致辞。Durlauf 教授表示本次联合计划对 CEHD 来说是一次突破性的合作，这项合作的达成，要感谢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尤其是冯帅章院长的不懈努力。CEHD 和 IESR 一样，非常期待通过这项联合计划与对方开展全方面的深度合作。联合计划就像是在双方院校之间搭建的小船，这是一项长期合作，如何在未来将这艘船搭建得越来越强大，是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CEHD 副主任 Steven Durlauf 教授发表致辞

随后，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介绍 IESR 及联合计划，联合计划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与全球顶级名校、研究机构间强强联合的一次积极尝试。未来，联合计划将重点在拓展社会调查项目、打造学术活动品牌、联合聘用科研人员及建立师生双向交流机制等方面开展工作。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介绍 IESR 及联合计划

令人惊喜的是，虽然 James Heckman 教授无法亲临现场，但他通过视频短片表达了他对联合计划顺利开启的激动与兴奋之情。在视频中，Heckman 教授表示非常感谢暨南大学校领导与冯帅章院长对该计划的支持与帮助。IESR 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积极进取、充满活力的年轻学者，他们正对中国问题进行着许多激动人心的研究。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实现双方的学者互访，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和 HCEO 整个网络的其他国际学者来到 IESR 进行访问，以及 IESR 优秀的年轻学者前往芝加哥大学来参加短期亦或长期的学术活动。芝加哥大学对于中国和中国经济的研究非常具有激情，而 CEHD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最后，Heckman 教授真诚地祝愿双方合作顺利，祝愿 IESR 越来越好。



James Heckman 视频短片

接下来，暨南大学副校长张宏、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CEHD 副主任 Steven Durlauf 教授共同为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揭牌，联合计划作为国内首次与国际顶级高校展开深度合作的尝试，它将为暨南大学、乃至中国的经济学科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未来，联合计划将发挥双方的核心优势，脚踏实地，努力建设成为暨南大学学术“走出去”的一张靓丽“名片”。

## 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 联合计划深度解析

日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以下简称 IESR) 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Economics of Human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 CEHD) 正式签署协议，共同开启“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The Chicago-Jinan Joint Initiative on the Study of Human Development, 以下简称“联合计划”)。这是国内经济学领域首次与国际顶级高校开展深度合作，也是一次全新的、突破性的尝试。

联合计划旨在促进双方在科学研究、数据收集、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打造联合研究之典范，创造世界一流之成果，服务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

### 一、志同道合 共创共赢

“芝加哥 - 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由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James J. Heckman 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

联合计划的缘起可以追溯到 IESR 成立之初。2016 年 3 月，IESR 刚刚成立，Heckman 教授就亲自来访，在详细了解了学院的发展情况与规划后，他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并且表示希望与 IESR 开展合作。



Heckman 教授首次访问 IESR 与冯帅章院长合影

2016 年 6 月，Heckman 教授所领导的 HCEO 国际工作组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 与 IESR 共同举办了“社会经济不平等”暑期学校项目 (Summer School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IESR 成为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亚洲第二所承办该项目的研究机构，并于 2017 年 6 月、2018 年 6 月连续三年承办该项目。

2016 年 10 月，Heckman 教授一年内第二次来访 IESR，参加了双方合办的“亚洲家庭变迁会议” (Asian Family in Transition Conference on Migration)，并正式受聘为 IESR 顾问委员会主席。



AFIT 会议与会嘉宾合影



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为 Heckman 教授颁发受聘证书

2017 年，IESR“人口流动与劳动经济学科创新引智基地”邀请 Heckman 教授担任海外学术大师，领衔海内外学术团队。该引智基地最终不负众望成功入选国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又称“111”计划)，成为暨南大学首个社科类“111 计划”引智基地。

由于双方在前期已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合作，共同开启“联合计划”可以视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双方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多次合作，并取得一系列引人瞩目的成果，得益于双方在研究方向上的一致性。

James Heckman 教授及其领导的 CEHD 长期关注人类发展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儿童早期教育问题，Heckman 教授团队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前沿研究成果颇丰。冯帅章教授自 2008 年以来，对上海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展开了长达 8 年的长期研究，其成果汇集为《城市的未来——流动儿童教育的上海模式》一书。研究方向的高度契合让两位学者跨越东西半球走到一起，携手开启交流合作新征程。2016 年 9 月，Heckman 教授与冯帅章教授合作启动了四川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该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完成了对 6000 名四川绵竹儿童的第一轮基线调查。Heckman 教授的高徒兼合作者，美国 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 研究员 Tim Kautz 全程参与项目的筹备工作，并两次亲赴绵竹投身于一线调查中。

当然，Heckman 教授与冯帅章教授的学术视野不仅于此，联合计划也不仅仅关注儿童发展领域。IESR 的宗旨是要用实证的方法，基于坚实的数据，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未来“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将致力于推动双方在应用微观经济学乃至其他更广泛学科领域的深入合作，开创协作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搭建中国最高端、最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有力支持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改革发展，有效提升我国科研成果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为了将双方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向纵深推进，“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应运而生。联合计划旨在将双方的合作从个人交流、团队小范围合作，推向更广泛的、更深度的两个科研机构，甚至是两所高校间的协作，从而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创共赢。这是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与全球顶级名校、研究机构间强强联合的一次积极尝试，将极大推动暨大应用经济学国际一流学科建设的进程。

## 二、对标国际 优势互补

在冯帅章教授看来，“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

计划”最大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联合”二字，他将其称之为“学术自贸区”。“联合计划可不像以往聘请 Heckman 教授来担任特聘教授这么简单，我们想做的是真正结合双方的优势资源，通过国际化的运作方式，搭建一个对标国际的学术平台。”冯帅章教授这样表述他的愿景。他希望 Heckman 教授在这个“学术自贸区”发挥领军作用，在教师聘用、科学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 未来联合计划将重点在以下四方面开展工作：

第一，全面开展科研合作。以正在开展的四川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调查项目为基础，联合拓展其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调查项目，包括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表现、全球化与经济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政策评估等重要问题。这些研究将基于坚实的微观数据，采用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以期得到世界级水准的科研成果。



绵竹项目调查员合影

第二，继续举办并开拓更多高质量的系列学术活动。联合计划将继续以往的品牌学术活动，如“社会经济不平等”暑期项目、“亚洲家庭变迁会议”等，此外还将打造更多的学术活动品牌，促进双方优质学术资源的更多交流。

第三，联合聘用科研人员及博士后，培养国际化复合型顶尖人才。联合计划将真正从人员聘用上实现双方的“联合”，所聘用的人员将同时归属于芝加哥大学 CEHD 和暨南大学 IESR，他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中国或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科研成果将归双方共有。这将极大促进双方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深度合作。

第四，建立师生双向交流机制。双方将定期派遣教师、学生互访，IESR 的教师和学生将有机会到芝加哥大学体验国际一流的经济学科研究与教育，CEHD 的教师与学生也



2017 THECO Summer School 师生合影

将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并参与在中国进行的调查项目。Heckman 教授每年也会到暨南大学和 IESR 工作较长一段时间，这对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科的国际化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冯帅章教授认为联合中心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的挑战是管理体制能不能跟上的问题，但是对于联合计划来说，更多的是机遇。只要我们将这四个方面的合作落到实处，联合计划就会像直达两地的高铁一般，迅速联通暨大和芝大，联通暨大与世界”。

## 三、制度创新 助力腾飞

回首两年前，在 IESR 成立仪式上，冯帅章院长以四个关键词“数据、研究、智库、学生”指明了学院今后努力的方向。如今，IESR 在这四个方面均有所建树并崭露头角：

在数据方面，IESR 下设的社会调查中心已延揽 20 余名来自密西根大学、波士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及具有多年调查经验的优秀人才，组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技能、高专业度的调查团队，开展了一系列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调查项目，并与国内其他学术调查机构共建高校调查联盟。

在研究方面，IESR 的优秀青年教师团队高水平论文频出，至今已有 42 篇论文被国内外知名期刊接受，获批 6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在智库方面，IESR 荣登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核心智库榜单，成为全国 16 家“高校智库 A 类——211 高校经济领域”入选智库之一。

在学生方面，IESR 已经招收了一届研究生、两届本科生，参照北美一流经济学培养模式，希望将学院打造成经济学教育界的“黄埔军校”。

IESR 的高速发展和已取得的耀眼成绩得到了学校的极大肯定。2017 年 9 月 30 日，暨南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将 IESR 作为“暨南大学综合改革示范区”试点单位，并将职称评定、评聘自主权下放至研究院，未来将进一步尝试在人事制度、学生培养和智库建设方面的创新。

IESR 的目标是成为国内顶尖、国际知名的应用经济学学术中心，为此，IESR 不断积极探索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新道路。2017 年底，IESR 成立了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领衔的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心成立不

久就延揽了二十余位国际计量经济学家担任 international fellow，其中不乏计量经济学界的顶级“大咖”。在今年的 AEA 招聘中，IESR 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获得了应聘者的广泛好评和信赖，成功招聘 4 名新的助理教授。

2018年3月，IESR 成立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由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这是继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成立后，IESR 成立的第二个以海外知名教授担纲的研究中心。中心一方面将在新兴经济体企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展开高水平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将主动对接国家及广东地区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现实需求。

“芝加哥-暨南大学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将进一步发挥海外负责人在引进顶尖师资、打造学术平台、培养优秀人才、开展联合研究等方面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创作出一系列世界一流的学术作品，培养出一批国际一流的学术人才，助推应用经济学跻身世界一流。

#### 四、志存高远 砥砺前行

“芝加哥-暨南大学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犹如一颗种子，在双方精心培育下破土而出，如今正处在萌芽阶段。冯帅章教授感慨地说：“联合计划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以前没有人尝试过这种模式。一方面，我非常感谢双方校领导，如果没有暨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校方的鼎力支持，联合计划就是一纸空谈，难以实现。另一方面，我十分感谢 Heckman 教授，他在推动联合计划开启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他

始终充满热情、竭尽全力，这让我也充满了斗志与信心。”

在冯帅章教授看来，联合中心的建立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首先，联合计划将发挥探路者的作用。作为国内首家与国际顶级高校开启深度合作的项目，联合计划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使得它既面临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也将遇到难以预料挑战。联合计划的成功经验将为暨南大学、乃至中国的经济学科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其次，联合计划将发挥平台的作用。借助与 CEHD 和芝加哥大学的合作，联合计划将不断聚集国际一流的智力资源，并作为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促进暨南大学其他学科，甚至中国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全球顶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合，从而促进更频繁、更高效的、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从长远来看，联合计划还将助力 IESR 发掘和打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内核”。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IESR 一直致力于为青年科研工作者创造一种更开放、更活跃和更自由的学术环境。芝加哥大学作为经济学的圣地，曾走出了超过 35% 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它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精髓将为 IESR 提供发展的借鉴和指引，帮助 IESR 打造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未来，联合计划将发挥双方的核心优势，脚踏实地，努力建设成为暨南大学学术“走出去”的一张靓丽“名片”。

## 我院新增 5 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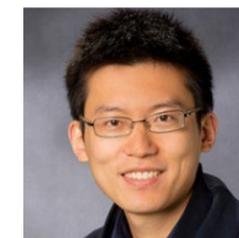
根据《暨南大学引进人才首次选聘研究生指导教师岗位管理办法》（暨学位〔2016〕20号）规定，经个人申请、学科组和学位评定分委会审议，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8次会议审议等相关选聘程序，最终我院新增5位教师成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目前，我院共有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3位，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17位。

序号	姓名	一级学科名称	二级学科名称	引进人才层次
1	牛梦琦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第四层次
2	薛森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第四层次
3	王芷苓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第四层次
4	李承政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第四层次
5	杨哲	应用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	第四层次



牛梦琦

助理研究员  
北京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卫生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薛森

助理教授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王芷苓

助理教授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



李承政

助理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  
研究领域：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杨哲

助理教授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  
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家庭经济学、健康经济学



## 我院多个学生科研项目获得立项

近日，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挑战杯”竞赛等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广东省“攀登计划”公布立项结果，我院多个项目获得项目立项。具体名单如下：

2018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创新训练（1项）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姓名	导师
201810559088	不分“闰左”可得安居乐业？——用主观幸福感对混合居住模式进行价值判断	创新训练	肖雄	史炜
2018年度暨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创新训练（6项）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姓名	导师
CX18346	不分“闰左”可得安居乐业？——用主观幸福感对混合居住模式进行价值判断	创新训练	肖雄	史炜
CX18347	广州市小学生课后托管研究——现状、问题及建议	创新训练	黎思嘉	李书娟
CX18348	探究政府监管对现金贷市场的影响	创新训练	武乘羽	宋彦
CX18349	短期空气污染抑制政策的效果及影响机制评估	创新训练	韩亚婕	朱宏佳
CX18350	收入差距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大型人口追踪数据的分析	创新训练	张艺滢	薛森
CX18351	中国现行高考平行志愿填报策略及其影响调查研究 - 以暨南大学学生群体为例	创新训练	张子哈	牛梦琦
2018年广东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专项资金项目（1项）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姓名	导师
pdjha0056	不分“闰左”可得安居乐业？——用主观幸福感对混合居住模式进行价值判断	创新训练	肖雄	史炜
"2018年暨南大学“挑战杯”竞赛等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创业竞赛拟立项项目（6项）"				
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负责人姓名	导师
18111021	不分“闰左”可得安居乐业？——用主观幸福感对混合居住模式进行价值判断	创新训练	肖雄	史炜
18111044	短期空气污染抑制政策的效果及影响机制评估	创新训练	韩亚婕	朱宏佳
18111045	从“以房为家”到“住有所租”——以广州市为例研究租售同权政策对房价和租金的影响	创新训练	吴乃嘉	宋彦
18111050	“互联网+”和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广东佛山陶瓷产业为例	创新训练	曾晓婷	谷一桢
18111051	机器换人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选择及前景——基于中西部调研的实证分析	创新训练	鄢瑜	王芷苓
18111057	探究政府监管对现金贷市场的影响	创新训练	武乘羽	宋彦

## 韩嘉玲研究员受聘我院特聘讲座教授、社会调查中心特聘顾问

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韩嘉玲研究员受聘我院特聘讲座教授、社会调查中心特聘顾问。韩嘉玲于1997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1984年获台湾大学硕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农村教育、国际迁徙、社会发展等。因其在扶贫领域研究及实践中的突出成绩，获得2004年中国消除贫困奖科研奖。

我院长期关注流动儿童问题，举办两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为政府部门、教育战线的工作者、长期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专家学者搭建沟通交流的平台。此外，我院社会调查中心还与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合作开展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该项目重点关注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发展，以及父母外出务工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这两个问题既深受学界关注，又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导向。

韩嘉玲研究员是我国最早关注流动儿童的学者之一，长期坚持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成果显著，其研究观点多次被政府部门所采用。韩嘉玲研究员的加盟将提升我院在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研究实力，同时她也将结合多年来丰富的实践调查经验，投身于我院多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中。



韩嘉玲研究员与冯帅章院长

# 科研动态

- 1 助理教授蔡澍的独立作者论文被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接受
- 2 副教授张思思的合作论文被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期刊接受
- 3 助理教授宋彦的合作论文被卫生经济学领域知名期刊Health Economics接受
- 4 助理教授刘诗濛与孙伟增的合作论文被国际期刊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接受
- 5 助理研究员李书娟的合作论文发表于国内知名期刊《经济研究》

## 学术研究成果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助理教授，蔡澍  
独立作者论文

“Migration under Liquidity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Randomized Credit Access in China” 被发展经济学领域顶级期刊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

此外，蔡澍的合作论文“Less advantaged, more optimistic?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 migrant and urban popul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合作者：Jia Wang）被知名期刊 **China Economic Review** 接受。

###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副教授，张思思  
合作论文

“The PSID and Income Volatility: Its Record of Seminal Research and Some New Findings”（合作者：Robert Moffitt）被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期刊接收发表。

该刊物由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创办，自1889年创刊已有近130年历史。当前影响因子2.401。在2017年Clarivate Analytics的期刊引用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在社会学期刊排名第9名(9/96 in Social 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在政治学期刊排名第32名(32/165 in Political Science)。本文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Krieger-Eisenhower讲席教授Robert Moffitt合作，是张思思副教授继上个月发表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之后又一篇文章。

## Health Economics



助理教授，宋彦  
合作论文

“The Effects of State-level Pharmacist Regulations on Generic Substitution of Prescription Drugs”（合作者：Douglas Barthold）被卫生经济学领域知名期刊 **Health Economics** 接受。

##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助理教授，刘诗濛（左）、孙伟增（右）  
合作论文

我院助理教授刘诗濛与孙伟增的合作文章 “Up in STEM, Down in Business: Changing College Major Decisions with the Great Recession”（合作者：John V. Winters）被国际期刊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接受。

## 《经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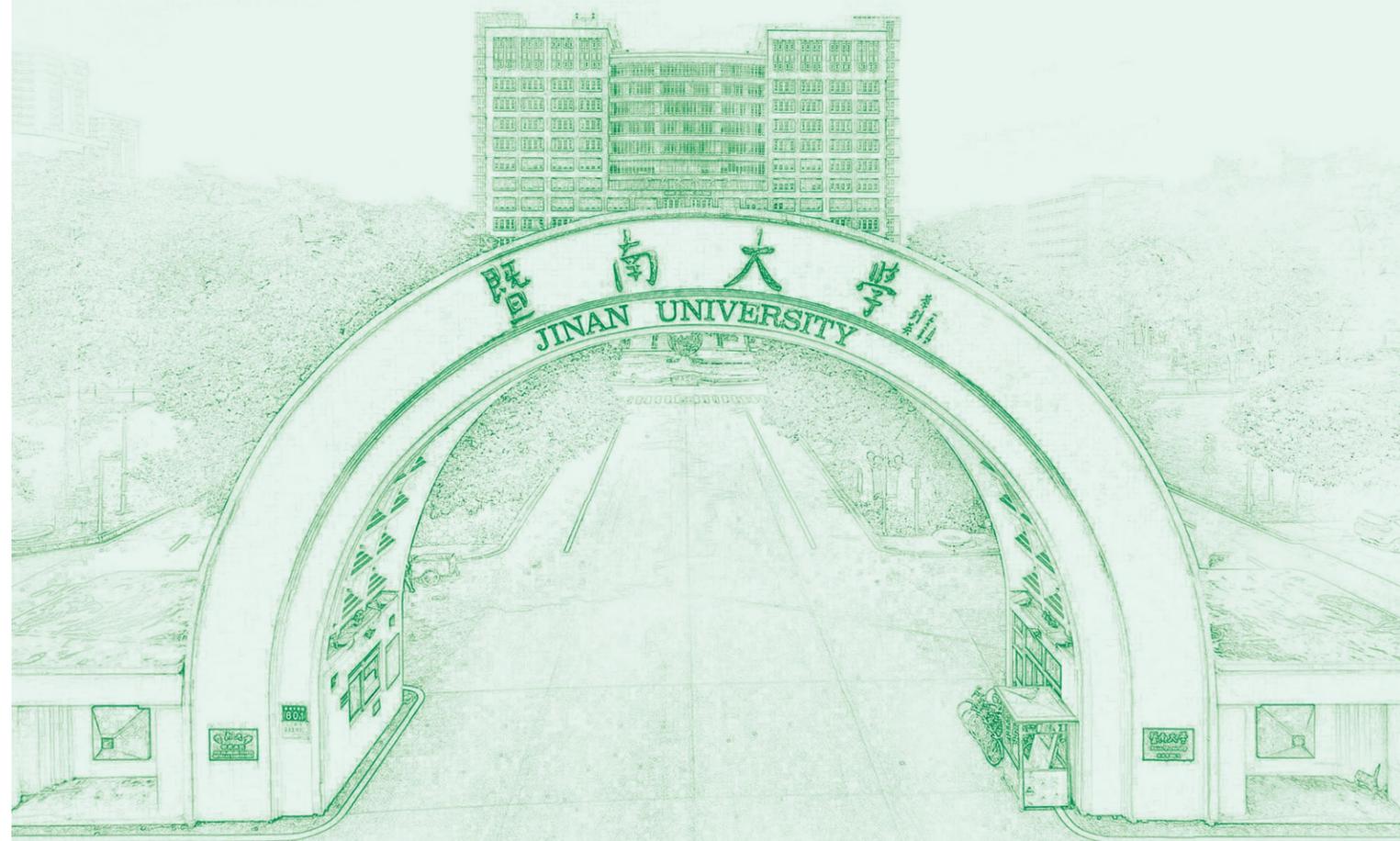


助理研究员，李书娟  
合作论文

《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合作者：毕青苗 陈希路 徐现祥）发表于国内知名期刊 **《经济研究》** 2018年2月刊。

# 学术活动

- 学术会议
- HCEO暑期学校
- 名师讲堂
- SEMINAR



## 暨南大学环境与经济跨学科交流会



暨南大学环境与经济跨学科交流会合影留念

2018年4月11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 IESR）和暨南大学环境与气候研究院（以下简称 ECI）联合举办“环境与经济跨学科交流会”。此次交流会旨在促进暨南大学环境和经济学科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助力跨学科协同创新，寻找新的突破点，围绕学术发展前沿进行探索。IESR 与 ECI 的学者们围绕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主要议题，交流了各自研究领域的研究话题、趋势和方法。本次交流会在 IESR 举办，ECI 出席此次交流会的有院长邵敏教授、名誉院长刘绍臣院士、常务副院长王伯光、副院长王雪梅等共 10 余位学者。

交流会开始，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首先对 ECI 邵敏教授团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ECI 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绿色发展已经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紧密相连，IESR 非常希望能以这次交流为契机，双方有更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如何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困局，为政策制定提供咨询与建议。此外，冯帅章院长从师资队伍、国际化学术网络、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等方面对 IESR 做了简要介绍。



冯帅章院长



邵敏院长

接下来，ECI 邵敏院长对冯帅章院长的热情邀请与周到安排表示感谢。他很认同冯帅章院长刚刚的发言，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难题，两院的合作有着

天然的优势。他对双方的合作寄予厚望。同时，邵敏院长从研究团队、研究方向、研究计划等对 ECI 做了简要介绍。

在双方进行初步了解后，交流会进入到正题，来自两大研究院的 10 余位学者对自己目前的研究工作进行汇报。

从汇报内容可以看出，IESR 与 ECI 在气候变化、大气污染对人类社会影响等研究方向上高度契合，互补优势显著。交流会现场气氛热烈，每场汇报都引起了双方学者的

深入讨论。IESR 冯帅章院长认为此次交流会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未来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首先，有关气候污染的数据问题 IESR 的教师可以向 ECI 的专家学者请教。此外，在数据收集、政策评估及政策建议方面双方可以开展一系列合作，如果能将环境、气候、污染、社会经济、企业调查的数据有机结合在一起，相信一定能做出很好的研究。对此，ECI 教授深表认同，今天的交流会为双方未来的深度合作开了个好头，期待两个团队今后的沟通交流，共同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献计献策。

## 广东乡村振兴暨千村调查研讨会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称 IESR）响应党中央和省委号召，积极参与广东乡村振兴工作，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主办“广东乡村振兴暨千村调查研讨会”。多位知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就广东乡村的发展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议初始，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致辞，他首先对各位前来参加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对 IESR 及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进行简要介绍。接下来，冯帅章院长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千村调查项目的背景、目的以及相关情况作出详细说明。他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与各位专家学者及业界人士加强合作与交流，丰富乡村振兴理论，完善乡村调查问卷，为相关政策制定建言献策。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致辞

致辞过后，会议进入到主题报告阶段。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刘守英教授分享了题为“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的报告，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周应恒教授分享了题为“乡村振兴中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潜力与路径”的主题报告。



刘守英教授



周应恒教授

之后研讨会进入圆桌讨论环节，本场次圆桌讨论主题为“乡村经济与扶贫”，由 IESR 副院长张思思教授主持。本次讨论中，IESR 助理教授谢斌分享了题为“产业扶贫对农村人口收入及就业状况影响”的报告，IESR 助理教授马祥分享了题为“农村信贷市场”的报告，IESR 副教授史伟分享了题为“信贷约束和创业：基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与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试点的证据”的报告。三位老师按序对自己的课题进行背景、意义、目的等方面的阐述后，在场的专家学者针对各位老师课题中的重点、难点、创新点展开激烈讨论，并给予中肯意见。

## 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 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

2018年5月19-2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在暨南大学中惠楼106会议室顺利举行。与会人员汇聚了国内外知名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国家卫健委、四川省绵阳市教育局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四川、广东等学校的校长、老师。研讨会围绕流动人口子女相关问题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政策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5月19日上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首先为论坛致开幕辞。他对出席会议的各位领导、同仁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随后冯院长深入剖析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他提出，本次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关注的主题是流动人口子女，既包括广受关注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也包括那些身份在流动与留守之间转化的、曾经有流动或留守经历的儿童；除了教育问题之外，我们也关心这个弱势群体的身体与心理健康、人身安全，以及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研究领域。冯院长强调，流动人口子女的问题本身就是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新问题，是一个既需要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提供支撑，又需要进行政策讨论、提出现实解决方案的一个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学术研讨会与政策论坛结合在一起的原因。最后，冯院长动情地表示，去年也正是这个时间，首届会议成功举办了，今年的会议我们恰好也选在了同样的时间，希望将来流动人口子女论坛暨政策研讨会能够一届一届办下去，搭建起一个长期的、跨领域、跨学科的平台。

大会开幕致辞过后，会议进入主题报告阶段。广州大学副校长吴开俊教授做了题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洼地’真伪考”的报告；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分享了“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海解决路径与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司综合处梁效革介绍了“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关爱工作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调查评估处助理研究员李红娟报告了“异地中考政策的区域差



与会嘉宾合影



冯帅章院长致辞

异：基于60个城市的分析”；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富言报告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变迁与展望”。这五场报告从不同角度揭开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现状，也提出了视角独特且观点新颖的应对方案，将本次会议的议题不断拓宽并深化。



广州大学副校长  
吴开俊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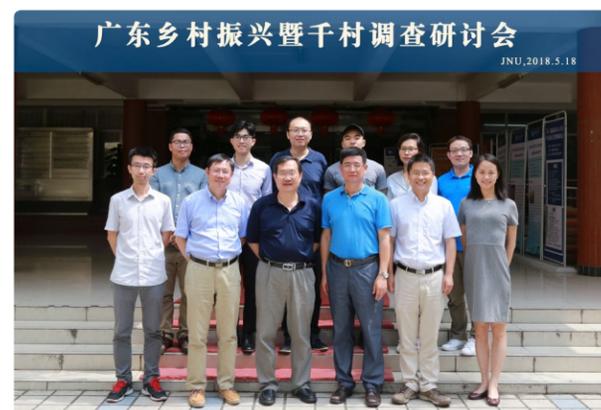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  
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

下午的研讨会首先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教授分享了题为“城镇化浪潮下，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与挑战”的主题报告，随后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石敏俊教授分享了题为“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主题报告。

之后研讨会进入主题为“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圆桌讨论议程，由 IESR 助理研究员李承政主持。本次讨论中，IESR 助理教授薄诗雨分享了题为“乡村治理与扶贫资源分配”的报告，IESR 助理研究员韩昱洁分享了题为“广东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的报告，广东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项目经理梁伟健分享了题为“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的报告。听取报告后，在场的专家们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关于广东乡村现状与发展的看法，对各位发言人的报告给出简明扼要的建议。

正如冯帅章院长在致辞中所言，衷心希望 IESR 的努力能够取得丰硕成果，推动广东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助力广东乡村早日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此次研讨会同时也是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启动会，IESR 将秉持为政策制定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及建议的初心，积极为广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广东乡村振兴千村调查研讨会合影留念



IESR 助理教授谢斌



IESR 助理教授马祥



IESR 副教授史炜



韩嘉玲教授



石敏俊教授



IESR 助理教授薄诗雨



IESR 助理研究员韩昱洁



广东华远国土工程有  
限公司战略发展项目  
经理梁伟健



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  
理司综合处梁效革



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  
口服务中心调查评估处  
助理研究员李红娟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助理研究员朱富言

5月19日下午的会议议程集中于政策论坛和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2017年度总结会。政策论坛围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新时代，新挑战”展开，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主持，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媛媛，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陆建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昱洁参与了论坛讨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韩嘉玲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  
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  
专委会主任周纪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  
院副教授、高等研究  
院院长助理陈媛媛



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  
书记、教授陆建非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与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合作开展的一项调查项目，2017年10月已完成基线调查。本次总结会由项目主管简昱夏报告了基线调查的执行情况，冯院长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初步的数据分析结果。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彭波局长、唐军副局长，紫岩小学谭克校长、齐天学校尹顺华校长、清平学校付润章校长等部分参与调查的学校校长、老师也特地来到论坛现场，听取报告并参与讨论。彭波局长在发言中表示，调查项目帮助学校更好地了解了学生们在认知与非认知能力方面的发展情况，也促进学校采取相应的措施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  
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  
主管简昱夏



冯帅章院长介绍绵竹项  
目数据初步分析结果



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  
彭波局长

5月20日，“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进入第二天的议程。上午，学术报告专场在暨南大学中惠楼106顺利举行，由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昱洁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陈媛媛分享了题为“城市人口控制指标与儿童留守”的论文，韩昱洁分享了题为“*How Does Primary School Choices Affect Migrant Children's High School Opportunities*”的论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李绍平分享了题为“*Parental Migration and Children's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 Rural China*”的论文，美国莱斯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李博伦分享了题为“*Ex-Ante Evaluation of Migration Policy on Child Cognitive Outcome*”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吕利丹分享了题为“*Parental Migration and Left-behind Children's Education: Large-Sampl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的论文。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陈媛媛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  
研究员韩昱洁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博士后李绍平



美国莱斯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生李博伦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  
展研究中心讲师吕利丹

论文切入点多样、以数据为支撑，极具现实意义。每位嘉宾分享完成后，与会人员还就论文涉及的问题及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交流，深化了对研究的认识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

下午，会议围绕“广东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展开政策论坛讨论，由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主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承政围绕租购同权以及住房政策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影响等问题与其他嘉宾展开讨论；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会江实验学校校长凌玉明以及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校长郑蕙分别针对流动儿童在广州市民办学校入学与公办学校入学现状进行交流；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流管处科长李萍则主要就流动人口子女积分入学以及在计生与卫生方面的加分等问题分享了最新的政策信息；千禾社区基金会生计与教育高级项目经理黄励提出的课后托管问题也引起了与会嘉宾的热烈讨论。现场氛围活跃，话题涉及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众多方面，给研究带来了新的信息和视角。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  
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  
专委会主任周纪平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  
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承政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会江  
实验学校校长凌玉明



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  
校长郑蕙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流  
管处科长李萍



千禾社区基金会生计与  
教育高级项目经理黄励

至此，为期两天的“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圆满落幕，会议搭建起各方信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广阔平台，对于促进流动人口问题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作为连续两届论坛的主办方，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也将继续保持对流动人口与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为中国流动人口现状的剖析和问题的解决贡献力量。

## 2018 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年会



2018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年会

2018年6月12日下午，2018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REUEA) 国际年会在云来斯堡酒店顺利开幕。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与会人员汇集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一百六十余名学者，年会将围绕房地产经济学、房地产金融、城市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开展为期两天半的业界论坛与学术报告活动。

6月12日下午4点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IESR 副院长、本次会议组织者张思思副教授主持并致开幕词。她对各位前来参加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对筹备此次会议的师生表示感谢。随后，她从师资力量、研究中心、学生培养等方面介绍了 IESR 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此后，IESR 助理教授、本次会议组织者刘诗濛向与会嘉宾简介了本次会议流程，并隆重介绍主题演讲嘉宾 Vernon Henderson 教授，会议进入到了主题演讲阶段。

在热烈的掌声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 Vernon Henderson 教授上台分享了题为“中国城市与城市化的胜利：



IESR副院长、本次会议组织者张思思副教授致开幕词



IESR助理教授、本次会议组织者刘诗濛简介本次会议流程

要素市场的制约因素”的报告。Henderson 教授在演讲中探讨了中国的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的各方面情况，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政府要素市场的控制如何影响城市发展，他还讨论了移民和限制移民的情况，并分析了移民政策未取得突出效果的原因。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Henderson 教授细致地解答了嘉宾们提出的关于住房供给弹性、户籍政策等问题。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Vernon Henderson教授分享

在开幕式的最后，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上台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感谢，希望大家享受接下来为期两天精彩的学术活动，并希望与会嘉宾继续关注 IESR 的发展，期待在今后展开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上台表示感谢

主题演讲环节结束后，会议进入海报演讲环节。本环节由 13 位年轻学者用海报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带来了多元化的视角与研究内容，报告主题涵盖住房价格、城市污染、城市交通、城市与创新等问题。海报会议现场气氛轻松，嘉宾们分别汇集在各个海报展板前，就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与对应的演讲者进行深入而热烈的交流讨论。

6月13日，近60篇平行报告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4个分会场开展，与会嘉宾围绕“Measuring House Prices”“Commercial Real Estate Investment”“Housing Wealth and Consumption”“Urban Labor Markets”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海报演讲环节

6月13日晚，2018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REUEA) 国际年会进入到业界论坛 (Industry Panel) 环节。本次论坛由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Sheridan Titman 教授主持，在 IESR 副院长、本次会议组织者张思思副教授的介绍之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辛商学院邓永恒教授，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姚文雄副教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与住区研究所副所长余猛，四川成都领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战略投资中心总经理王洋等来自学术界与企业界的专家代表围绕中国的城市土地利用，房价上涨等房地产热点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6月14日，AREUEA 进入到第三日议程，40余篇平行报告同时在4个分会场开展，与会嘉宾围绕“Housing Price Volatility”“Taxes and Local Public Finance”“Urban Shocks”“Mortgage”“Spatial Patterns and Urban Productivity”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学术讨论，会场座无虚席。



6月13日平行会议

6月14日平行会议

6月14日下午 16:15-17:15,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Joseph Gyourko 教授在暨南大学学术报告厅为与会嘉宾带来一场题为“Evaluating Housing Market Risk in Chinese Citi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的主题演讲。在 IESR 助理教授、本次会议组织者刘诗濛隆重介绍了 Joseph Gyourko 教授之后, Joseph Gyourko 教授开始了他的主题演讲, 他分析了美国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异同点, 并通过借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历史演变来分析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至此, 为期两天半的 2018 年度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国际年会圆满落幕, 会议搭建起各方信息交流与思想碰撞的广阔平台, 对于促进房地产与城市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Joseph Gyourko 教授作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现场

## CEMP 2018 Workshop



CEMP 2018 Workshop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2018年6月18-19日, CEMP 2018 Workshop 在暨南大学顺利举行, 本活动由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 (Center for Econometrics and Microdata Practice, CEMP) 主办, 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埃默里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相聚于此, 展开学术讨论。

6月18日下午,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主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胡颖尧主持并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位前来参加会议的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并向与会者介绍了 IESR 的成立时间及师资力量。胡颖尧教授表示 IESR 成长得特别快, 而 CEMP 将会与 IESR 携手共同发展。随后, 胡颖尧向大家简单介绍了 CEMP, 该中心致

力于为微观计量提供国际交流平台, 打造一支强大的本土研究团队。最后胡颖尧教授再次对与会者致以热烈欢迎。在接下来的一天半的会议时间里, 多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CEMP 中心主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胡颖尧教授



Yonghong An (德克萨斯A&M大学) 分享了题为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rket Power, and Consumer Welfar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Infant Formula Market" 的报告



Esfandiar Maasoumi (埃默里大学) 分享了题为 "Averaging Misspecified Models" 的报告



Zhongjian Lin (埃默里大学) 分享了题为 "Social Interactions Quantiles" 的报告



Wuyi Wang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 "Identifying Latent Group Structures in Nonlinear Panels" 的报告



Wei Song (厦门大学) 分享了题为 "Some New Results on the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emiparametric Binary Choice Model with Endogeneity" 的报告



Ji-Liang Shiu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 "Endogeneity in Semiparametric Nonseparable Models without Monotonicity" 的报告



Jeremy Fox (莱斯大学) 分享了题为 "Repeated Matching Games: Definitions, Computation and Estimation" 的报告



Wei Shi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 "A Dynamic Discrete Choice Model of Reverse Mortgage Borrower Behavior" 的报告



Ruli Xiao (印第安纳大学) 分享了题为 "Identification of Dynamic Games with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nd Multiple Equilibria: Global Fast-food Chains in China" 的报告



Yuanyuan Wan (多伦多大学) 分享了题为 "Identifying Marginal Treatment Effect with Monotone IV" 的报告



Xiaojun Song (北京大学) 分享了题为 "Improving Covariate Overlap using Integrated Propensity Scores" 的报告



Shuyang Sheng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分享了题为 "Estima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s in Endogenous and Strategically Formed Networks" 的报告



Ying Zeng (厦门大学) 分享了题为 "Study of A Peer Effects Model with Random Group Effects" 的报告

至此，为期一天半的 CEMP 2018 Workshop 圆满落幕。本次研讨会涉及多个热门议题，将经济计量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现代统计方法相结合，同时也加强了学者之间的交流。未来，CEMP 还将举办多场学术活动，为成为中国第一家专注于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大型研究中心砥砺前行。

## 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



“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合影留念

2018年6月21日-23日，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在暨南大学顺利开幕。本届研讨会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和暨南大学企业发展研究所共同主办，主题集中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企业发展、创新政策等相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议程主要包括：主题演讲、圆桌政策论坛、平行分会场报告、企业实地调研等。

6月21日上午，研讨会正式开始。本次会议由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徐熠主持，他对各位与会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认为举办此次研讨会会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提供一个共同探讨新兴经济体的契机；第二，本次研讨会邀请各国专家学者研讨、交流并比较来自不同国家的数据，他真诚地希望各位学者能从中有所获益。

随后，由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程仕军教授发表讲话，他向与会学者们介绍了暨南大学商科的悠久历史、雄厚的师资等概况，希望能借助此次研讨会进一步加深暨南大学与外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接下来，研讨会进入主题演讲阶段。来自多伦多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斯坦福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及学术机构的学者分享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徐熠教授



程仕军教授



Daniel Trefler (多伦多大学) 分享了题为 "Innova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 Scale and Competition" 的研究报告。



Kalina Manova (伦敦大学学院) 分享了题为 "Growing like Ch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的研究报告。



Hongbin Li (斯坦福大学) 分享了题为 "The Rise of Robots in China" 的研究报告。



Daniel Yi Xu (杜克大学) 分享了题为 "Two-sided Search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的研究报告。



Zhao Chen (复旦大学) 分享了题为 "The Impact of Energy Regul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的研究报告。



Jeremy Fox (莱斯大学) 分享了题为 "A Structural Model of Repeated Matching Game" 的研究报告。



Ernest Liu (普林斯顿大学) 分享了题为 "Industrial Policie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的研究报告。



Banu Demir (比尔肯大学) 分享了题为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Propagation of Shock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的研究报告。



Xiaobo Zhang (北京大学) 分享了题为 "Community Networks and the Evolu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的研究报告。



陈林 (暨南大学) 带来了题为 "湾区产业升级与政府引导" 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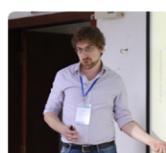
吴战旄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动因与评价体系" 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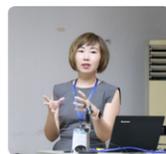
邓地 (暨南大学) 分享了题为 "从方太到传祺——本土品牌如何突破高端市场瓶颈" 的报告。

6月21日的研讨会议程到此结束,各个会场研讨会现场气氛轻松,学者们分别就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与对应的演讲者进行深入而热烈的交流讨论。

6月22日,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进入第二日议程。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伦敦大学学院、马里兰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专家与学者围绕“Financial Deepening”“Labor in China”“China in Global Production”“Government Policy”等主题进行了生动有趣的报告和热烈讨论,提供了创新性观点。



Michael Gechter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对印度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分享,主要包括印度制造业年度调查数据和对印度非农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Maggie Chen (乔治·华盛顿大学) 分享了巴西的企业数据,包括巴西的年度工业企业数据、技术创新调查数据、进出口数据和企业雇主员工数据。



zhao Chen (复旦大学) 对中国的企业数据进行了报告,包括中国年度工业调查数据、年度税收数据和环境数据库等。



Kalina Manova (伦敦大学学院) 分享了比利时企业资产负债数据和国内生产数据。



Zhao Chen (复旦大学) 分享了题为 "The Impact of Energy Regul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的研究报告。



Jing Cai (马里兰大学) 分享了题为 "Micro Effects of Financial Deepening" 的报告。



Xue Bai (布洛克大学) 分享了题为 "Trade and Minimum Wages i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and Evidence" 的报告。



Albert Park (香港科技大学) 分享了题为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Tasks and Skills in China" 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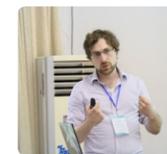
Wolfgang Keller (科罗拉多大学) 分享了题为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and Internal vs External Technology Transfer: Evidence from China" 的报告。



Yong Wang (北京大学) 分享了题为 "Trade Liberalization, Input-Output Linkage and Markup" 的报告。



Maggie Chen (乔治·华盛顿大学) 分享了题为 "Outsourcing Innovation: The China Shock Hits Brazil" 的报告。



Michael Gechter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分享了题为 "Efficiency and Equity of L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y Cities" 的报告。



Namrata Kala (麻省理工学院) 分享了题为 "Workhorses or White Elephants? The Effects of Earned Autonomy o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的报告。



James Roberts (杜克大学) 分享了题为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Entry Subsidies in the Presenc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报告。

6月23日,为了近距离了解新兴产业的企业的发展和营运,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部分参会学者赴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广州智博会进行了实地调研。



IESR马祥助理教授向嘉宾讲解

6月23日上午,参会学者一行来到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参观了年轻的互联网汽车企业——小鹏汽车的总部。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是广州橙行智动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互联网电动汽车品牌,专注于针对一线城市年轻人的互联网电动汽车的研发。



调研现场

在座谈会上,学者们听取了小鹏汽车企业负责人的报告,就小鹏汽车的管理层架构、产品创新、发展路径、市场定位等方面的话题展开了讨论。另外,小鹏汽车的高级副总裁肖斌和技术副总裁徐吉汉,就学者们提出的有关企业运营和技术研发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随后,学者们走访参观了小鹏汽车的办公区域及设计室,并对公司生产的汽车进行了试驾体验。

下午,学者一行来到广交会展馆,走访正在进行的2018年中国(广州)智能装备暨机器人博览会(简称“广州智博会”)。

此届广州智博会以“新智造·新生态·新动能·新时代”为主题，以展示推广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智能制造为主线，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抓手，全面连接工业云服务、工业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业，凸显智能制造、生态制造。

学者们在会展进行了参观与参展产品的体验，还与各参展企业就产品性能、营销策略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交流。

至此，汇集全球顶尖学者的第二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研讨会圆满结束。本次会议除了加强学者在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和发​​展经济学领域间的互动，还为学者们交流讨论不同国家的微观企业数据质量提供契机，成为了全面比较不同国家间微观企业数据的分享平台。

为了更好地筹备明年的会议，小编采访了几位参会嘉宾对本次会议的感受及对 IESR 的建议。以下是专访详情。



调研现场



嘉宾合影

## 您对本次会议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收获？



**Dan Trefler:** 这次会议很棒，在会议上我遇到了很多杰出的学者，收获很大。做研究不仅是要从我自己的视角看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不同国家的人如何利用这些数据做研究。这次会议让我了解了很多用中国数据做研究的学者的思维，这对我未来的研究也大有裨益。和中国的学者进行互动并去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我此次来中国最大的收获。



**Wolfgang Keller:** 这次会议满足了我所有的期待。在这 10 余年期间，我来过中国 20 多次，但这是我第一次来暨南大学。这次会议的信息大部分是会议组织者 Daniel Xu 告诉我的，他也向我介绍了 IESR 的发展历程。我对 IESR 成立的研究中心和数据收集非常感兴趣。IESR 举办的学术活动这种让国内外学者有更多交流机会，这些交流为双方的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Albert Park:** 虽然我来参加会议之前就知道有很多杰出的学者会参加此次会议，Daniel Xu 也是非常棒的组织者。但这次会议上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数量众多最新的关于中国的高质量研究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Kalina Manova:** 我很高兴参加这次的会议，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广州。通过此次会议，我对中国的贸易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同行的交流也让我备受启发。我曾去过北京和上海，我一直期待能对华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更多的了解，感受中国的南北发展的异同。此行能够了解到中国和尤其是广州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让我倍感收获。



**Michael Gechter:**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一直在印度进行相关数据的搜集和研究，对中国却了解颇少。参加这次会议，让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新兴经济的发展让我看到中国的创新活力。

## 您对 IESR 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意见？



**Wolfgang Keller:** 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心是非常棒的，除了胡颖尧带领的微观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心和 Daniel Xu 引领的​​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外，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建立也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在我看来，去引进像 Daniel Xu 这样中长期的知名海外教授来组织汇聚起更多的学者来促进研究中心的发展并提高中心的质量比更好的空调、办公室更加重要。



**Albert Park:** 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的建立令人瞩目，这次会议其实也是对中心建立的一种庆祝。我对劳动经济学中心也非常感兴趣，我期望能见到 IESR 未来有更多数据搜集的项目。对于 IESR 的研究者来说，和很多顶尖的学者交流他们的研究并得到反馈是很宝贵的机会，同时他们也可以从这种反馈中知道数据搜集的方向，从而促进 IESR 对中国更多原创性数据和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Kalina Manova:** IESR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发展得特别迅速。我很高兴看到你们组织了这么多富有影响力的会议。我希望，你们能够将这些学术交流活动持续进行下去。学术交流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这将帮助 IESR 保持活力与创新，站在学术前沿。



**Michael Gechter:** 我觉得 IESR 发展得很好，在这里有很多优秀、富有创造力的青年学者，我期待与 IESR 的学者们进行合作研究。

正如会议组织者暨南大学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徐熠教授在会议开幕致辞中所言，真心希望远道而来的各国与会嘉宾能真正从此次会议中有所收获，不虚此行。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还将继续拓展品牌学术活动，推进国内外高校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互动。

# HCEO 暑期学校



授课教授与学员合影

2018年6月25日-29日,由HCEO国际工作组(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 IESR)联合举办的2018 HCEO 教师培训项目(2018 HCEO Faculty Training Seminar)在暨南大学中惠楼 106B 室顺利举办。这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院顾问委员会主席 James Heckman 教授所领导的 HCEO 国际工作组与 IESR 第三次进行深度合作。本届 HCEO 教师培训项目旨在推进美国与中国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者及博士后的交流及合作。康奈尔大学 Lawrence Blume 教授、莱斯大学 Flavio Cunha 教授、芝加哥大学 Steven Durlauf 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Chao Fu 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Petra Todd 教授为 27 名来自美国、德国、伊朗、中国等不同国家的青年教师和博士后研究员讲授代际流动性、项目评估、技能形成、经济理论和结构模型等课程。同时,学员还参与到不同研究领域的工作组来报告自己的研究并参与讨论。



康奈尔大学Lawrence Blume教授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Chao Fu教授



莱斯大学Flavio Cunha教授



Christian Otchia分享工作论文



宾夕法尼亚大学Petra Todd教授



小组讨论现场



芝加哥大学Steven Durlauf教授



冯帅章院长与Christian Otchia

课程结束后,所有的教授和学员展开了自由讨论和互动问答。学员们纷纷提问,问题包括青年经济学家应该如何做好早期的职业规划,经济学研究如何影响政策制定等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在场教授都结合自己的经历,热情解答学员们的疑问。他们鼓励青年学者们,做学术研究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业,最重要的是在一开始要找到自己的热情和兴趣所在,去研究自己真正想做的、有意义的话题,而不仅仅为了发表而做研究。同时,他们也建议,经济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要与不同的人、不同的政府部门打交道,寻求外界帮助,获取更多信息。

至此,2018 HCEO 教师培训项目圆满结束,不少学员表示收获颇丰。来自刚果的学员 Christian Otchia 认为这5天的课程质量非常高。同时他还与中国、美国等国家的很多青年研究者进行了交流,大家都给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对他的研究非常有帮助。此外,Christian Otchia 了解到 IESR 正在进行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调查项目,这让他印象深刻。他对包括这个调查项目在内的很多数据都很感兴趣,希望在未来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进行一些高质量的研究。

## 名师讲堂

伦敦大学学院 Andrew Chesher 教授：  
Endogeneity and Identification

2018年5月28日-31日，IESR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Center for Econometrics and Microdata Practice, CEMP）主办的“名师讲堂”邀请到伦敦大学学院 Andrew Chesher 教授前来授课。

5月28日上午课程伊始，我院特聘教授、CEMP 主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系胡颖尧教授为本次活动作欢迎致辞。胡颖尧教授热烈欢迎 Andrew Chesher 教授的到来，希望在座师生能够充分利用本次学习机会，积极与 Andrew Chesher 教授互动交流。同时，胡颖尧教授表示，CEMP 未来将邀请更多的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海外学者，为校内外师生搭建一个高水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学术交流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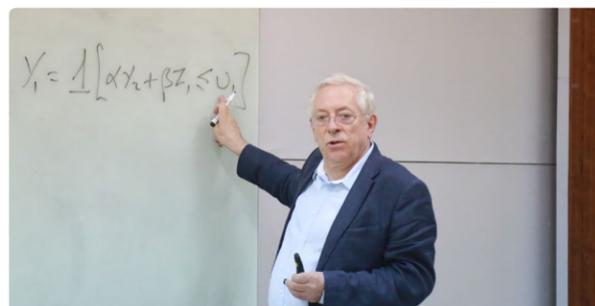
致辞之后，Chesher 教授正式开讲本期“名师讲堂”第一节课。他首先介绍了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研究目的与内容，随后开始讲解模型识别结构及特征的定义，探讨参数、半参数、非参数模型下不同的约束条件，并结合过度识别与模型误设问题研究结构计量模型。此外，他还讲授了如何区分完全模型（complete model）与不完全模型（incomplete model）以及对应的点识别（point identification）和集合识别（set identification）。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Chesher 教授进一步系统讲

授了带可加误差项（additive errors）或不可加误差项（nonadditive errors）的三角模型、分位数模型，并讨论工具变量模型在误差项不可加的非参数模型中的约束与识别。课程最后，Chesher 还介绍部分识别（partial identification）和广义工具变量模型（generalize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odel）及其在拍卖市场中的应用。课程结束后，不少师生表示课程质量很高，收获颇丰，期待未来 CEMP 还能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



课程现场



Andrew Chesher教授

## SEMINAR

【第 93 期】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副教授：Land  
Conversion and Misallocation across Cities in China

2018年4月20日，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副教授在暨南大学中惠楼 106 室报告了题为“Land Conversion and Misallocation across Cities in China”的论文，并与在场师生进行了交流。

张教授首先指出，中国的土地供应受到政府严格管制，而城市之间的土地配额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张教授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的土地配额是否导致土地资源错配，以及它会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其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土地资源错配问题，即越来越多的土地指标被分配给生产效率低的城市。其进一步的反事实

分析表明，土地资源错配造成每年的经济损失占 GDP 的 0.05%-0.26%。



张俊富副教授

## 【第 94 期】中山大学彭玉磊助理教授：货币政策与股权溢价

2018年4月20日下午，来自中山大学的彭玉磊老师进行了题为“货币政策与股权溢价”的论文报告。

货币政策是通过金融系统在经济中传递的，所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深远的影响。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应该怎样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本文通过建立模型，研究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金融市场中的重要变量——股权溢价。

这篇文章主要是运用有限参与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对股票溢价的影响。在本文的模型中，最优货币政策会考虑到风险分担，同时相对于股利冲击是反周期的。因此，它意味着与其他政策相比，特别是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

政策相比，其股权回报率较低。然而，最优政策并不能保证通胀稳定性，也不能产生与通货膨胀目标制相比更高的名义债券收益率。本文的结果显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股权溢价为 7%，而在最优策略下为 1.5%。所以本文认为，针对通货膨胀稳定的次优政策可能会导致高的股权溢价。



彭玉磊助理教授

## 【第 95 期】厦门大学李培副教授：Artifici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Evidence from China

2018年5月11日，厦门大学李培副教授做客我院第95期Seminar，并作了题为“Artificial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Evidence from China”的研究报告。

李培老师及其合作者以我国为背景，使用双重差分(DID)等方法并利用1986年-1995年1514个县级层面面板数据探究了县界划分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最终发现边界整齐与不齐的县之间的年经济增长率相差3.1个百分点，而关于机制的解释李老师则从资源配置以及地方领导人偏好等角度进行了阐述。因此，本篇研究对于理解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培副教授

## 【第 96 期】北京师范大学戴觅副教授：How Do Households Adjus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

2018年5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戴觅副教授在中惠楼102进行了题为“How Do Households Adjust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WTO Accession”的论文报告。

贸易自由化对个体行为影响的研究有许多，但是很少有文献从家庭层面来考察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而事实上，家庭是许多个人行为如工作、储蓄、居住模式等的决策主体。本文研究的问题是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城镇地区家庭行为，利用的variation是中国加入WTO后各地区的关税的削减程度的差异。本文使用的数据是1999-2008年的UHS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并结合工具变量法，作者发现关税下降程度更高的地区工资下降得也更多。面对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负向冲击，家庭做出了一系列行动来规避这种不利冲击。首先，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劳动力市场，

这些成员主要是女性和老年人，且集中在非贸易部门。其次，更多的成年人选择与其父母同住，因此家庭规模也变大了。最后，为了平滑由贸易自由化对消费带来的负向冲击，家庭的储蓄也少了。以上这些家庭行为都显著缓解了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带来的负向冲击。



戴觅副教授

## 【第 97 期】南京审计大学荣昭副教授：Credit Card Use and Small Business Fi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2018年5月18日，南京审计大学的荣昭副教授在暨南大学中惠楼102室报告了题为“Credit Card Use and Small Business Finance: Evidence from China”的论文，并与在场师生进行交流。

来自正规金融的资源可以重新分配给小型企业。文章通过对中国小微企业的考察，提供了这种再分配的直接证据。文章使用CHFS 2015年的数据发现，有非正式小企业的家庭更有可能在其业务受到信贷限制时使用信用卡。研究还发现，当社会的信用卡密度更高，当业主持有城市户口，当业主持有更多的财务知识，当业务更老的时候，这种效应更明显。此外，在正规小微企业中也存在这种

影响，并同时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上显著。最后，文章发现信用卡接入提高了非正规小微企业的生存率。



荣昭副教授

## 【第 98 期】厦门大学宋伟助理教授：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emiparametric Binary Response Model with Endogenous Regressor

2018年5月21日，厦门大学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院统计系助理教授宋伟做客我院第98期seminar，分享了题为“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emiparametric Binary Response Model with Endogenous Regressor”的工作论文。

文章中，作者拓展了带内生变量的半参数二元响应模型的识别与估计，在识别中利用了控制函数(control function)的方法。作者基于这一识别方法，证明了所构建的估计量在根号n下是真实值的相合渐近正态分布。这一估计量基于非线性最小二乘准则(nonlinear least square criterion)，并且在文章中证明了这一准则和最大评分积分准则(integrated maximum score criterion)

是等价的。蒙特卡洛估计表明在小样本下构建的统计量与文章理论一致。文章还提供了这一估计量在实证研究中的一个应用。



宋伟助理教授

## 【第 99 期】堪萨斯州立大学申蕾蕾助理教授：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The Big Squeeze from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Value-added Imports

2018年5月31日,堪萨斯州立大学申蕾蕾助理教授做客我院第99期Seminar,并做了题为“Polarization of American Workers: The Big Squeeze from Occupational Exposure to Value-added Imports”的研究报告。

首先,申老师开门见山的引出该研究的核心问题,即探究附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能否解释美国就业市场中不同工作之间工资两极化(polarization of wages)的现象,并从两个方面强调该话题的重要性:其一,传统意义上我们习惯用贸易总额来衡量国家间的贸易流,但这种衡量不仅无法区分本国自主生产与参与国际生产的份额差异,而且还忽视了间接出口和重复计算等问题,本研究所使用的附加值贸易就比较良好地缓解了上述不足之处,尤其对于行业层面的研究而言;其二,申老师通过特征事实的展示,指出美国就业市场中例行程度(degrees of routineness)不一样的工作之间工资两极化的现象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上都很重要,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探讨。

然后,申老师介绍了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六套数据:第一,1995-2009年CPS-MORG数据;第二,1995-2009年附加值贸易数据;第三,世界银行公布的中等收入与高等收入国家分类数据;第四,NBER工业调查数据中行业特征数据;第五,计算机使用率数据;第六,不同工作例行指数(routineness index)数据。

最后,通过直接的回归分析以及其他机制探究和异质性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相对于例行程度比较高的工作而言,进口贸易竞争对中等例行度工作的负向效应更大;第二,工资的两极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美国 and 中等收入国家之间最终品贸易的影响;第三,该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不同类型工作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



申蕾蕾助理教授

## 【第 100 期】伦敦大学学院 Andrew Chesher 教授：21st Century IV: Extending the Scope of Incomplete Models

2018年6月1日,伦敦大学学院经济系William Stanley Jevons讲席教授、ESRC Centre for Microdata Methods and Practice (CeMMAP)主任Andrew Chesher做客我院第100期seminar,分享了题为“21st Century IV: Extending the Scope of Incomplete Models”的理论前沿。

Andrew Chesher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广义的工具变量模型(Generalized Instrumental Model, GIV)在不完全模型(Incomplete Model)中的应用。不完全模型,区别于假设条件过于严格的完全模型,往往不易受到模型误设问题的影响。然而现有的众多理论特别是实证研究中,工具变量模型在完全模型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而在不完全模型中的应用仍然有限。Andrew Chesher教授指出,利用不作过强假设的不完全模型在例如高维度异质

性、产业组织、博弈论中进行研究有一定必要性,Andrew Chesher教授在讲座中展示了GIV在不完全模型的部分识别(partial identification)的理论框架,并以女性劳动力参与决策实证研究作为例子,展示了他和合作者在2017年《Econometrica》中的GIV的研究。



Andrew Chesher教授

## 【第 101 期】斯坦福大学洪瀚教授：Decision Making and ROC Curves

2018年6月7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洪瀚做客我院第101期seminar,分享了题为“Decision Making and ROC Curves”的工作论文。

文章对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中常用来判定算法优劣的ROC曲线进行了研究,挖掘了ROC曲线统计意义上的性质以及对模型选择的含义,并利用一个国家层面关于生育的大型数据作了说明,实证数据包括待生育夫妇详细的生理、心理数据,以及医生给夫妇双方做出的风险预测(是否会产出不健康的孩子)。



洪瀚教授

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不能简单地依靠 ROC 曲线评判某个职业（法官、医生等）预测结果的优劣，主要原因在于：

(1) 个体相比于机器，拥有更多影响最终判断的不可观测信息；(2) 个体相比于机器，因为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动机，对真阳性率（true positive rate）和伪阳性率（false positive rate）两类损失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在最终给出判断结果时往往会赋予不同的权重，而 ROC 曲线对这两类损失赋予的是相同权重。

文章说明了理论计量与应用计量研究的必要性，并揭示了数据科学与机器学习当前在研究人的行为方面存在的不足。或许我们可以结合两个学科的优点，利用数据揭示法官、医生的价值判断与效用函数，或者根据不同的损失权重作出调整后的 ROC 曲线并在合适的领域为算法优劣作相应判断。

## 【SEMINAR 第 102 期】波士顿大学 Arthur Lewbel 教授： Causal Reduced Form vs Structural Model Identification

2018 年 6 月 27 日，波士顿大学经济学系 Arthur Lewbel 教授做客我院第 102 期 seminar，分享了题为“Causal Reduced Form vs Structural Model Identification”的工作论文。

文章对计量经济学文献中出现的二十几项不同的“识别”概念作了回顾和比较，包括点识别、部分识别、因果识别等，并针对点识别构建了一个新得框架以整合现有的点识别定义。在报告中，Arthur Lewbel 教授首先回顾了计量经济学中识别的历史，并着重对结构模型和简约模型中的识别概念进行了分析。他以三角模型为例（triangular model）为到场师生讲解了结构模型与简约模型中为达到识别所需要的不同假设条件，进一步阐明了两者的区别，概括的说，识别一个结构模型所做的假设往往基于个体的行为表现，而识别简约模型中的因果关系所做的假设往往与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s）相关。

Arthur Lewbel 教授最后对未来的经济学论文进行了建议和展望，他认为将结构模型与简约模型相结合的文章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在简约模型应用的具备随机性的数据

中往往也会出现测量误差、选择性偏误、样本污染与退出的问题，如果能结合结构模型的优势进行分析，往往能得出更丰富和稳健的结果。另外，结构模型还能够以简约模型的分析结果作为基准参照。Arthur Lewbel 教授强调，两类模型不应是互相排斥，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并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两类模型相结合的优秀文章。



Arthur Lewbel 教授

# 思想 聚焦

媒体聚焦

黄埔大道西观点文章精选

## 媒体聚焦

### 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暨南大学启动“广东千村调查项目”

【编者按】近日，我院召开的“广东乡村振兴暨千村调查研讨会”引起广泛关注与热议，凤凰网对会议精彩内容进行了报道。现将全文转载，以飨读者。

2018年5月18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举办了“广东省乡村振兴暨千村调查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内知名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与广东省美丽乡村建设一线的业界人士，就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广东千村调查项目设计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学界参与乡村振兴要以微观调查为基础，以乡村振兴理论为指导，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手段，以政策研究为落脚点，为相关部门提供切实有效的决策咨询。研究院下辖的社会调查中心将组织各方力量开展“广东省千村调查”项目，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村入户调研，利用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 乡村振兴的理论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在会上做了“关于乡村振兴的理论”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的乡村具有特殊性，研究中国乡村绕不开农民和村庄这两个主体。以往的公共政策，着眼点大多在农民和农业；在“振兴乡村”战略提出以后，公共政策才真正实现农民、农业、农村三位一体。

村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传统民间来说，它具有经济、道德形成、宗教、防卫等方面的作用；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它更是一种“制度装置”和“秩序”，它会影响到社会合作（如差序格局下的合作困境），进而影响乡村治理的成效。

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如何观察乡村变迁也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刘守英教授提出通过“农民与村庄的粘度”来观察这一变迁。粘度包含有两个维度：一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乡村的“根”；二是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是乡村的“魂”。在国家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工业化时期，农民与村庄联系较紧，粘度较强。90年代以后的跨地区工业化、快速城市化，使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农一代”离土离村，粘度减弱。值得注意的是，乡村的非正式制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分析乡村振兴，有如下几个分析框架：

（一）城乡中国结构，聚焦于中国社会由乡土中国转型为城乡中国，将来可能进一步转型为城市中国。

（二）农民的分化与代际革命。如今小农高度异质化，只有约15%农民单纯以农为生，农民的生计趋多样化；代际方面，农二代生活方式日趋城市化、传统礼教观念发生变化。

（三）对农业重新定义。这一框架要求我们从农业的地位、内涵、功能、发展方式等方面，对农业做出新的认识。

（四）乡村演化与现代化，包括村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村庄的分化和集聚。（五）城乡互动与融合，包括从单向城市化转向城乡互动、城乡分工与城乡文明融合等。

#### 三产融合发展与产业扶贫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周应恒作了“乡村振兴中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潜力与路径”的专题报告。“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农村产业的兴旺。在农村产业发展方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是趋势。在产品功能的基础上附着休闲等多种功能，是小规模农业增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农业发展及其增值空间存在于整个涉农产业链的各环节。通过对比日美发展经验，周教授认为，中国的涉农产业发展空间仍十分巨大，特别在农业产后加工和流通服务领域。



配图源于网络

推进农村三产业融合的措施可以归纳为多模式推进、多主体参与、多机制联结、多要素发力、多业态打造。要注意的是，政府在这一进程中既不能越位包办，也不能缺位放任；各地发展也不能一个模式重复，需要保持乡村的特色与风貌，力争“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集群”，实现品牌化、标准化、专业化、集群化。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谢斌尝试从“产业”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就业、人口回流等的作用”。谢斌进一步将问题细化为“发挥影响的作用渠道”“乡村非农产业的有效形式”“受益群体（是否改善贫困和不平等状况）”三个问题，并在千村调查的村问卷及个人问卷的设计上体现出来。

周应恒教授强调，农村产业扶贫不一定是工业扶贫，更多是农业扶贫。如今工业形态发生较大变化，国家提倡工业要在园区集聚，乡村工业化不是趋势。因此，农村的产业扶贫，要着眼于农业，侧重于研究脱贫的内生动力和机制。

刘守英教授则提出，研究者应注意到在乡村由农业延伸出的产业，研究农村产业的新变化，以及它们对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有何影响。这方面课题有重大潜力，可能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工业化理论）做出贡献。

#### 乡村振兴的绿色发展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引进国外杰出人才”石敏俊做了“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专题演讲。

从全国看，各地的绿色发展程度并不均衡，绿色发展综合得分呈从东南沿海向西向北逐渐递减的态势，沿海地区绿色发展优势明显。中国经济绿色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空间集聚的负外部性，把绿色发展与空间发展规划有机衔接起来。当经济密度过高，特别是当资源环境负荷超过阈值时，会导致可持续性下降。

着眼于乡村，可以发现乡村生态环境面临较大的挑战，如“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乡村振兴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发展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使可持续性成为生产力。

具体而言，应该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强化湿地保护和恢复，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扩大退耕还林还草；严格保护耕地，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改革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聘教授，原北京社科院韩嘉玲研究员做了“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与挑战”的主题演讲。她指出，在城镇化浪潮下，传统的“村村办小学，镇镇办初中”的格局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全国范围看，学校数量从2000年的55.36万所锐减至2016年的19.32万所。由于学龄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数量持续减少，义务教育城镇化率攀升，远远超过了人口城镇化率。农村学校经过较长时间的撤点并校，寄宿制学

校成为主要办学模式，由此也带来相应的挑战。首先是教育形成“乡弱城挤”的局面，农村生源萎缩、农村学校变成“空心校”，城镇学校则出现学位紧张的情况。其次，寄宿学生有低龄化趋势，过早离开父母可能对孩子成长有负面影响。此外，寄宿要缴纳住宿和餐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家庭的实际开支。最后，由于工作强度大、办公条件差，农村学校难以留住优质青年教师。

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5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家的重视和介入将有助于改善乡村教育存在的困境，但仍需要实证研究来评估政策具体实施效果。

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问题复杂，需要相关部门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全国约有902万留守儿童以及数百万困境儿童；广东省约有25万留守儿童，11.22万困境儿童。广东省各级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正在推广留守儿童之家、儿童督导员两大帮扶政策。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昱洁计划在千村调查项目中设计相关问题，如从村问卷收集村的留守儿童之家数量及服务情况，儿童督导员的数量，从儿童问卷收集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接受社会帮助的情况、个人的成绩等，通过定量方式研究两大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



配图源于网络

## 乡村信贷市场与农民创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马祥计划在千村调查中设计与农村信贷相关问题，研究农村信贷市场。角度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 农村信贷的供给，关注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
- (二) 农村信贷的需求，包括生活性借贷、生产性借贷；
- (三) 农村信贷的价格，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利息水平、抵押物要求、担保要求。并据此分析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和薄弱环节，如信息不对称、执行不充分等。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史炜则基于2015年开始试点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政策（俗称“两权抵押”），计划在千村调查中设计与“两权抵押”相关的问题，探究农民的创业需求与计划，评估政策在试点县的执行度及对农民创业的作用，并预测扩大农村担保物范围对于农民创业的作用。

## 乡村治理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

在资金配置方面，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薄诗雨及其合作者则关注扶贫资源分配的问题。不少研究表明，更多的扶贫资源被分配给了较为富余（对扶贫资源需求较低）的村庄或者农户，因为数据问题对政策效果评估也存在疏漏。扶贫资源分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因此乡村治理的特征与扶贫资金分配有着紧密关系。薄诗雨计划在千村调查中研究“研究乡村治理如何改进扶贫资金的分配效率”的问题。比如，基层民主是否能改进资源错配。

##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究： 异地中考仍受限制，租购同权尚待深化

【编者按】近日，我院主办的“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搜狐教育对会议精彩内容进行了报道。现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都是由国内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所带来的。在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之时，这一群体及其子女却可能遭受不公的对待。一方面，流动人口往往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网络，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子女在受教育方面往往面临重重障碍。

5月19-20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主办了“第二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论坛邀请了国内外知名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国家卫健委、四川省绵阳市教育局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四川、广东等地的校长、老师，围绕流动人口子女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指出，所谓流动人口子女，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流动儿童，即跟随父母到外地打工的儿童；二是留守儿童，即父母外出打工，留在本地的儿童。这两部分是能够互相转化的。甚至还有所谓“流动的留守儿童”或者“留守的流动儿童”，此外还有“回流儿童”。

“据估计，中国目前可能有接近一亿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儿童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利的落实，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冯帅章说。

### 流动人口子女研究需要更广的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率先发展，流动人口随之产生。上海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陆建非认为，所谓人

口红利，应该进一步明确为“流动人口红利”。以上海为例，现代化地铁、高楼的建设，没有流动人口这一庞大劳动力群体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陆建非提出今后人口流动可能呈现出新生代人口流动占比上升、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上升的趋势。年龄上升主要缘于核心家庭的整体移动，先是年轻夫妇来到大城市，有了一定根基后，因为大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都比老家更好，这些“先遣军”普遍会把老家的孩子和父母接过来。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受教育问题，也就愈发凸显出来。



冯帅章教授

冯帅章强调，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时，视野不应只局限在教育的层面。对于流动儿童来说，能否进入公办学校、甚至优质的公办学校，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问题。

冯帅章还表示，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更多的是父母监护，以及相伴随的儿童人身安全及身心健康的问题。所以需要拓宽对这个人群的研究维度，研究焦点不单单是狭隘的“教育”或者“学校的教育”。

## 推卸责任，大城市终究会伤害自己

上海市民办中小学协会副会长、随迁子女教育专委会主任周纪平回顾了上海市流动人口政策的演变。周纪平提出，2013年是上海流动人口政策的转折点。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上海市开始控制外来人口，外来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的门槛随之提高。

此外，政府对随迁子女学校进行“关、停、转、并”。正常就学的通道被堵住，流动人口子女便涌进非正规的办学机构，或通过非公开的方式进入正规学校。但更多的孩子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家乡就读。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媛媛与冯帅章主持了一项对上海10个公办学校和9个农民工学校的“控人政策”调研。该项目调查四年级的学生，并跟踪到五年级。2012年，19个学校中只有一个学校出现了并班的情况。到了2017年，9个农民工学校有7个出现并班，10个公办学校有2个出现并班。可以发现，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学校，学生流失都逐年加重。

以小升初为例，在2012年的时候，大部分公办学校的孩子都留在上海，70%在民办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在上海；到了2017年，超过一半的在民办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小升初时回流，公办学校学生回流的比例也上升了。从总体来看，不管在小学内部或者是小升初，流动人口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离开上海的概率越来越大。

陈媛媛表示，只要东部沿海地区仍相对发达，这些被迫回乡的孩子，终究还是会成为劳动力返回上海。如果上海没能通过自己的优势给予这部分劳动力较好的教育，最终会损害自己的利益。

“对待流动儿童的问题上，社会上很多人缺乏正确的态度，他们虽然有同情心，认为被迫返乡的孩子很可怜，但却认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比接纳流动人口更加重要，这其实是没有科学逻辑的。”陈媛媛称。

## 流动儿童的义务后教育 ——异地中考的挑战

随着工作对知识技能要求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往往不能满足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需求。他们在城市升学的愿望比较强烈，这也涉及到“异地中考”的问题。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韩昱洁尝试从政策层面上分析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面临的问题。她区分了四类政策：第一类，异地中考报名无任何条件限制。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湖南省和昆明市，但该政策仅针对报考中职或者民办高中。第二类，仅要求有当地的初中学籍或者小学学籍。第三类，在要求学籍的同时，还要求父母的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其中，上海比较特殊，除了要求学籍，还要求有120个积分，普通流动人口家庭基本上都难以达到。第四类，只允许报考职业学校。在北京，流动子女初中毕业后只允许报考中职学校，并且异地报考中职学校规定非常繁复，如要求父母的工作证明、社保，甚至还有居住要求等等。

韩昱洁还介绍了她对高中年龄段流动人口教育状况的测算。在广州，高中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子女中，只有52%处于高中教育水平，上海这一比例只有45%。与此同时，两地的户籍人口的高中毛入学率都非常高，接近100%。

“虽然有些地方开放了异地中考，但报考仍受到很大限制。在目前教育事业持续发展，甚至提出普及高中教育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仍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决，这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学生个人，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韩昱洁说。

## 租购同权——广州新举措尚待深化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迁子女迅速涌入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城市，随之出现了城市义务教育容量与随迁子女就学诉求之间的供需矛盾。为此，国家不断发布政策，努力为随迁子女在输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寻找出路。

在经历了2001年“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

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简称“两为主”）的政策之后，2014年，国家又在政策上提出“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简称“两纳入”）。2015年，这一政策得到进一步强化，教育部公开表示要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2017年7月，广州市政府正式发布《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工作方案的通知》，对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赋予他们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实现“租购同权”。

据广州市天河区某公办小学校长介绍，公立学校招生会优先招收具有本学区户籍的地段生。从去年开始，对流动人口子女开始实行积分入学政策。地段生录取之后，再招收积分入学的学生。除了积分入学，流动人口如果属于政策性照顾人群，如高素质人才、现役军人、环卫工、殡葬工人、优秀外来工等，也可以被居住地所在学区的学校招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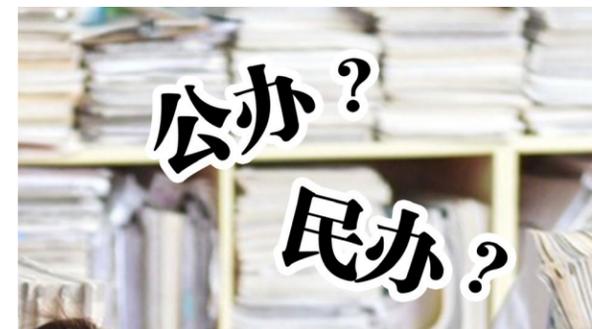
“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还包括基层政府的协调入学，这类人一般为社区服务了一定年限，如企业纳税符合条件，但积分入学指标未达到。剩下的还有机动入学，如根据在职老师的亲缘关系，学位可以进行协调。协调入学往往需要赞助费。”该校校长称。

目前“租购同权”存在“人户不一致”的问题，如果没有于所在学区购房，就不是所在学区的地段生。真正实现“租购同权”的只有广东江门，江门学位不紧张，租房一年后就可以就近入学。该校校长坦言，“租”其实还是在“购”后面。在目前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对流动人口子女来说，在流入地入学还是有较大的困难。

韩昱洁认为，广州的“租购同权”出台后，有关单位和学校按政策执行，但是对于某些公立小学来说，最终的结果跟以前差不多，地段生、统筹入学、积分入学各自的比例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韩昱洁还表示，总体来说，“租购同权”政策没有取得很大成效，租房的儿童依旧不能享受买房儿童的同等入学权利。政策实施的结果不理想主要是学位不够，财政规划应进一步加大公办教育投资。

## 谁来满足流动儿童受教育需求？ ——民办与公办的抉择



配图来源于网络

新时代下，教育发展更要求有质量。四川省绵竹市教育局局长彭波提到，目前政府要求教育部门引入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形式是公办还是民办？民办学校收费高，教育质量自然提升。但一个两难的境地是，公办与民办学校有着不同的体制和机制，公办学校难以像民办学校那样管理。

陆建非也承认，义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缩小差距，所以要求公办教育的质量要赶上一些收高费的民办，但是这很难做到。此外“教育均衡发展”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社会现象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局部解决。

针对发展公办教育的问题，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唐晓杰介绍了“上海经验”——上海的民办教育质量较高，大概百分之六十多的学生都来自民办学校。为了促进公办和民办教育协同发展，今年实行了公办民办同步招生的改革，以减少优质生源被民办学校提前录取的概率。

“其次，实行“委托管理”制度，政府向优质民办学校去购买服务、引进资源，让优质民办代管相对薄弱的公办学校，进行管理输出、课程输出、教师专业发展输出，促进均衡。”唐晓杰说。

当然，民办与公办孰优孰劣并不是一定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特聘讲座教授、原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韩嘉玲指出了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如北京比较好的教育资源更多集中在公办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昌乐小学校长郑蕙也表示，在广州市天河区，公办学校资源较好，公办和民办结对子，定期开教学研讨会。公办老师会去民办学校指导教学，政府也给予民办老师外出学习的机会。

无论如何，公办教育最终都要起到“兜底”的作用。

## 新时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挑战

【编者按】6月10日，《南方都市报》整版刊载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教授与助理研究员韩昱洁的评论文章《新时代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新挑战》。冯帅章教授长期致力于流动儿童问题的研究与跟踪，研究院下辖的社会调查中心也已开展有关于流动儿童的多项社会调查。研究院长期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希望能使该问题引起全社会的更多关注，呼吁各界力量共同解决这一社会热点问题。我们特将《南方都市报》原文转载，以飨读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并强调要推进教育公平，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这样的政策背景，对于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流动儿童群体到底意味着什么？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0-17岁城乡流动儿童规模为3581万，在2005年的基础上增加了41.37%。流动儿童在城市中面临的最主要困境是户籍制度限制带来的教育问题，据《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截至2014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名流动儿童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义务教育后，流动儿童参加考试和升学也面临巨大阻碍，大量流动儿童必须回老家参加中考，或者只能辍学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针对学龄前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管理规范。

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国家最高层面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一系列相关政策也相继出台和实施，如今流动儿童教育状况如何？他们的教育问题是否已经得到妥善解决？

周纪平补充道，政府在民办或公办的选择上有时可以更灵活些，参考欧美“试验教育”的模式。对于接纳流动人口子女的民办学校，也不宜一棒子打死，可以留一些试点学校，观察其发展的情况。

### 义务教育阶段：从有学上变为上好学

尽管法律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都有权利享受九年义务教育，但由于流动儿童属于城市的外来人员，因此在流入地享受法律所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时面临一些限制。原本义务教育的教育经费均由县(区)政府分配，并且是根据有当地户口的儿童人数划分，教育经费很难随儿童的流动而转移，而流入地政府没有足够的激励和财政预算来适应流动儿童的受教育需求，因此起初大量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公共教育体系之外。

从2001年起，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两个重大改变。第一个是“两为主”政策的颁布。2001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对流动儿童就学提出了“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两为主”政策。随后几年，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加强落实随迁子女公共教育服务的文件。第二个是“两纳入”政策的颁布。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合理规划学校布局，科学核定教师编制，足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以公办学校为主接受义务教育。”

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政策从“两为主”到“两纳入”是一个从易到难，一步步推进和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是为了教育公平，使“有学上”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能在流入地接受免费的公办义务教育。这体现在，一方面，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

的比例大幅提高，一直保持在80%左右。2015年，19个省90%以上的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纳入政府财政保障的随迁子女比例达到86.1%，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数量达到83.1万个。同时，随迁子女的经费保障机制不断完善。2008年-2015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专项奖补资金454.74亿元，对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学问题成效较好地区拨付中央专项奖补资金。2015年建立了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动实现“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本定额资金随学生流动、可携带，“钱随人走”惠及1400万随迁子女。

新时代下，教育发展更要求有质量。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在解决“有学上”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流动儿童仍面临“上好学”的问题。这从根本上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造成的。大部分情况下，流动儿童只能就读低端民办学校或质量相对较差的公办学校。这些学校的质量通常不高，体现在较大的班额，较高的师生比，比较简陋的学校硬件设施，师资力量较弱及不稳定等方面。如果流动儿童只能进入较差的民办或公办学校，其接受的教育质量较差就毫不令人惊奇了。

因此，解决流动儿童教育的质量问题必须以增加高质量的教育供给为前提。这一点可以从广州近来推行的“租购同权”政策看得非常清楚。2017年7月，广州市率先推出“租购同权”，对符合条件的承租人子女，赋予他们就近入学等公共服务权益，实现“租购同权”。具体规定为：“具有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人才绿卡持有人子女等政策性照顾借读生、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其监护人在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以监护人租赁房屋所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且房屋租赁合同经登记备案的，由居住地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含政府补贴的民办学校学位)就读。”

广州的“租购同权”出台对流动人口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作用有限。政策实施结果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公办学位不足，“租”并不可能与“购”完全同权。公办学校实际录取时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有一定的优先次序：首先要满足具有本学区户籍的地段生，剩余的学位才会用于招收政策性照顾借读生和符合市及所在区积分入学安排学位条件的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因此，“租”其实还是在“购”后面，不是第一类地段生的话仍旧很难进入公立学校。尤其是优

势学位地段的学位房十分有限，甚至连地段生都不能全面满足，更难满足租房的流动儿童。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对积分入学的流动人口子女，稳定住所只是积分的一个方面，积分还需要考虑计划生育、居住年限、社保等多方面情况。因此，仅靠“租购同权”无法解决学位特别是高质量学位的缺口问题。

### 义务后教育阶段：聚焦异地中考



配图来源于网络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高中是连接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纽带，也是学生个性形成和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更是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基础工程。近年来，伴随着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农民进城务工，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高中教育的刚性需求也更加强烈。十九大报告强调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将其作为近期国家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体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对个人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当前大部分城市的高中教育资源相对紧缺，并且受到户籍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影响，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结束后很难在流入地参加异地中考并继续升入高中就读。异地中考已经成为一个流动儿童义务教育后的瓶颈，值得重点关注，寻求突破。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等四部委颁布的《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为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的客观要求，要求各地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相应政策措施，解决随迁子女在流入地义务教育后继续升学问题。《意见》的出台给全国各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带来了希望，成为异地中考政策的重要转折点，也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2013年异地普通高中招收的流动子女大约为8.9万，到2014年招

收了10.7万，在2015年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飞跃，达到35万左右。

全国各省份和地级市纷纷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响应，出台了相关的指导意见和执行方案，对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异地中考的具体报名要求和升学条件做出了明确规定。不同城市的异地中考政策要求差别很大，有的城市限定了允许报考的学校的类型；大部分城市对父母的居住证、合法稳定的职业、住所、社保、连续学习有所限制，而不同城市对社保的年限限制、学籍限制、父母居住证的年限限制要求又有所不同；还有少量城市的异地中考没有任何限制。例如，北京、天津的异地中考政策只开放了中等职业类学校，厦门、佛山、东莞、深圳的异地中考政策限制比较多，而沈阳、合肥、青岛这些城市的异地中考限制比较少。

总的来看，不同城市有关异地中考的限制呈现不同的特点。首先，从关于就业、住房、社保等各个条件的限制来看，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子女基本上还是被拒绝在异地中考之外的。其次，北京和上海作为特大城市，政策更为严苛，门槛比较难以降低。再次，东部地区的异地中考政策较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更加严格。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大量流入，流动人口占了比较大的比例，但城市的教育资源原本按本地户口和常住居民分配，因此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问题。有的东部地区公办学校不断扩大规模，但还是难以满足大规模流动子女教育的需求。

### 学前教育：亟待纳入统一规范



学前教育（配图源于网络）

学前期是人的认知发展最为迅速、最重要的时期，在一生认知能力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的估计，

2010年学龄前儿童在流动儿童中所占比例为25.09%，规模达到899万，比2005年的学龄前流动儿童规模增加了191万，增幅达26.91%。

面对大规模的学龄前流动儿童，至今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针对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管理规范，也未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使得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难以得到保障，学前教育品质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大部分城市颁布实施的有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各种教育政策也基本集中在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阶段，而对其学前教育至今还未见到非常明确的、有力且有效的管理措施。

有个别城市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例如上海市在2008年颁布了《关于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2014年开始实施的《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在妥善安排本市户籍适龄幼儿入园的基础上，统筹安排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幼儿园就读。深圳市根据自身公办幼儿园比例低而民办幼儿园比例很高的情况，从2012年率先探索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模式。“普惠性幼儿园”是面向大众、收费较低、保教质量有保障的幼儿园。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是一项促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的重要举措，已经在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和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多次倡导。目前，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已達一千多所，基本覆盖每一个社区。普惠性幼儿园的大规模覆盖提供了大量学额，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深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

然而，由于学前教育的学位缺口本身较大，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仍比较严峻，大多数从事底层工作的流动人口要么把孩子送回老家，要么选择收费低廉资质较差的民办非正规托幼教育机构。据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2015年在上海、广州、重庆三地展开的调查显示，学前教育低品质及家庭教育缺失是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两大主要现状。

### 任重道远：从“两为主”到“两纳入”刻不容缓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凸显，到目前已经有将近二十年时间。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努力下，流动儿童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许多政策措施也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重要的是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有学上”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有效解决，公办学校在流动儿童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异地中考的探索也在一些地区初见成效，部分城市开始关注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并发展普惠性幼儿园。

但与此同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距离完全解决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流动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如何“上好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后如何继续上学？在学前教育阶段如何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长期问题。由于超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部分城市的流动儿童受教育状况还有恶化趋势。这些问题

的存在，都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甚至可以说，更好地解决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是我国实现新时代“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目前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的重要抓手，就是扎扎实实地推进“两纳入”政策，也就是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虽然“两纳入”主要是针对义务教育而言，但应将其拓展到义务教育后及学前教育阶段。

对此，需要对流动子女在流入地的基本情况摸底调研，充分掌握其分布、规模、流动性等信息，以便对各地区各阶段的流动子女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对流动子女在各阶段教育都加大财政投入，加大学位供给；进一步促进流动子女异地中考、高考；重视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学前教育，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放宽流入地落户条件，逐步解除社会福利与户籍制度的关联。



配图源于网络

## 黄埔大道西观点文章精选

冯帅章 卢晶亮:

### 新时代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提高就业水平，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新时期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总体而言，当前的就业形势处于比较好的阶段，就业状况持续改善。然而，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一样：“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理解新时期的就业问题，必须从历史的宏观大视角出发，依据精准的调查数据，深入分析当前的具体情况，合理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在此基础上，才能将十九大思想具体落地，进一步明确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途径和对策。

#### 1 历史大视角： 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升级的背景



配图源于网络

谈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离不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劳动力市场转型。在此之前，受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影响，几乎所有城镇劳动人口都在国有或集体经济部门就业，失业率非常低。但是，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国有企业遇到了很大的财务困难，导致政府对于国企进行改革，这产生了大量下岗人员。同时，私营经济部门得到发展，城镇劳动力分配机制逐步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

冯帅章、胡颖尧与 Robert Moffitt 在 2017 年正式发表的一篇合作论文 (Feng, Hu 和 Moffitt, 2017) 利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 (UHS) 对中国从 1988 年到 2009 年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进行了比较详细系统的刻画。文章根据劳动力市场发展阶段将 1988-2009 年分为三个时期：国有企业主导时期 (1988-1995 年)，劳动力市场改革时期 (1995-2002 年) 和改革后时期 (2002-2009 年)。具体而言，该文发现在 1988-1995 年间，城镇失业率非常低，这其实是对应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前的计划经济阶段。根据文章的估算，1988-1995 年，城镇户籍人口失业率的平均仅为 3.7%。在此期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仍然是所谓的“铁饭碗”，就业主要由国有部门负责解决。

1995-2002 年劳动力市场改革期间，城镇失业率上升非常快，失业率的平均值跃升至 6.2%，并且上升迅速，每年增长近 1 个百分点。失业率的急剧上升正值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和城乡人口流动加速的时期。文章发现国有企业裁员较多的地区失业率上升较多。同时，低教育程度人口，年轻人和女性的失业率相对更高。

而在 2002-2009 年间，失业率则趋于稳定且略有下降。这一阶段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已经完成，导致失业率飙升的因素不再存在。同时由于高校扩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原因，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较大改善。总体而言，2002 年后，城镇劳动力市场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尽管如此，前期失业率飙升使得失业率在此阶段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新均衡水平。2002-2009 年，城镇户籍人口失业率的平均值为 9.5%。

#### 2 现状与前景： 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



配图源于网络

##### (1) 劳动参与率

劳动力市场首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劳动参与率八十年代末开始一直处于下降过程中。根据 Feng, Hu 和 Moffitt (2017) 一文，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城镇户籍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 82% 左右，2002-2009 年期间下降到 74% 左右。对于女性劳动者而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尤为显著。这初看起来颇为令人费解，因为过去几十年间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而通常受教育程度更高者更容易参与劳动力市场。同时，家庭中的小孩数量也在减少，这也有利于女性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但我们所观察到的却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而且不管是对于年轻女性，还是年纪稍长的女性，她们的劳动参与率都在下降。

现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可以看作一种市场化改革条件下向“正常”水平的回归。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中国城镇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非常高，大大高于国际普遍水平。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上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例如，虽然现在家庭的孩子数量变少，但是孩子数量的系数效应却很大。也就是说，以前可能有没有孩子，或者说有几个孩子对于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影响不大，而现在孩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的劳动参与率。而婴幼儿的养育制度与养育环境的变化无疑加强了这一趋势。另一方面，女性受教

育程度的提高，也延缓了年轻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步伐，导致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当然，相对工资的下降导致女性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恶化也是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女性的工资收入在增长，但是和男性对比，就可以发现男女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这导致了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从长远来看，我们认为不必过度担心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女性劳动参与率“回归”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虽然受教育程度增加在短期内会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来看，受过更高教育的妇女将更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

##### (2) 失业

劳动力市场最受关注的一个指标无疑是失业率。目前我国仍然仅仅定期公布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登记失业率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待业人员”登记，与失业保障紧密联系，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失业情况。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非本地户籍人口往往不能在常住地进行失业登记，而许多失业人员因为种种原因也缺乏主动向政府部门进行登记的动力。可喜的是，国家已有计划将国际上更为通行的调查失业率纳入常规统计发布。近日，国家统计局办公室新闻透露，将在 4 月中旬召开的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公开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

在国家尚未正式公布官方调查失业率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来看看目前中国失业率的基本情况。该调查最新一轮完成于 2017 年，覆盖 29 个省 40000 余户家庭，在全国及省级层面都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代表性。根据国际通行的失业率计算方法，全国城镇地区失业率为 4.9%。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失业率为 3.9%，西部地区失业率为 5.5%，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失业率均为 5.7%。青年人的失业问题值得关注，16-24 岁人口的失业率为 11.9%。按户口类型划分，本地城镇居民的失业率为 4.9%，本地农村流动人口失业率为 5.6%，外来农村流动人口失业率为 3.6%，而外来城镇流动人口失业率为 3.2%。对比 2011-2015 中国家庭就业调

查来看，总体而言我国的失业率近年来处于低位。

失业有短期失业与长期失业之分。中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长期失业缺乏关注，而长期失业率是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指标。如果失业者的大部分都是短期失业的话，这只是一个工作搜寻和劳动力市场的摩擦问题。反之，如果大部分失业者都处于长期失业的状态，我们就需要更加仔细地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国际上的经验也表明长期失业往往与结构错配有关。通常而言，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长期失业率较高。基于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数据的估算，2017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中，失业期限超过半年的比例为48%，失业期限超过一年的比例为31%。虽然由于数据缺失等问题，这一数据未必非常精确，但是可以大致判断我国目前长期失业问题并不特别严重。

总体而言，在不发生大的经济波动的情况下，我国失业率有望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运行。但是，与劳动参与率不同，失业率的变动在短期往往比较剧烈，必须随时加以动态监测。另一方面，特定地区和特定人群的失业问题相对严重，应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应对。

### (3) 就业质量

仅仅看失业率或长期失业率还是不够的，因为就业的质量也关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居民最终福利。就业质量范围很广，涉及劳动报酬的高低、工作时间的长短、工作的规范性、工作福利及社会保障、劳动者对工作的满意度以及职业发展空间及社会评价等方面。

根据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数据估算，2017年我国19%的劳动者一周工作时间不足40小时，而一周工作时间不足20小时的比例为11%。这从侧面反映部分劳动者只能找到兼职工作，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在平均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速方面，2016年城镇地区年平均工资为49076元，相较于2014年实际增长10%。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平均工资最高，为56660元，实际增长12%，东北地区平均工资最低，为39534元，实际增长2%。从教育程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者平均工资为65761元，实际增长11%，高中学历劳动者平均工资为42199元，实际增长10%，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平均工资为32426元，实际增长7%。

农村流动人口，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就业质量较低，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群体。2017年农村流动人口自我雇佣的比例为37%，远远超过城镇户籍居民18%的自我雇佣比例；而在那些受雇工作者中间，农村流动人口没有签订正规合同的比例为59%，远高于城镇户籍居民31%的未签订正规合同比例。从事自我雇佣或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就业者一般多为低技能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报酬较低，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不完善。考虑到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比例高达43%，如果不能提高该群体就业正规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质量水平就无法真正提高。

总而言之，尽管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失业率较低，但就业质量有待提高，特别是对于农民工等特定人群。未来就业工作的重心势必向提高就业质量方向转换。

### 3 途径与对策： 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配图来源于网络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调查失业率列入预期发展目标，提出城镇调查失业率要控制在5.5%以内。这表明政府把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目的和调控的重要目标。预期政府将加强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衔接，在制定财税、金融、产业、贸易、投资等重大政策时，综合评价对就业失业的影响。随着官方调查失业率的公布，就业问题势必引发各界重点关注。实现更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就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多管齐下，将十九大报告中的指导性意见予以落实，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伴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这一过程中技能落伍的劳动者面临着转业转岗，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难以避免。国际经验表明，职业技能培训是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主要手段。一方面，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对于用于职工转岗培训、技能提升的相关支出予以补贴。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工和失业人员的培训，需要发挥公共就业服务部门的作用，切实提升这两类人群的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

### (2) 加大就业政策扶持，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解决就业的主体是企业，经济下行时，企业面临裁员压力，这时需要政策扶持来避免就业波动。2015年以来，国务院推出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政策，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缴纳失业保险费，且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企业可以领取稳岗补贴，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能提升培训等相关支出。该政策就是为了鼓励企业和员工保持长期雇佣关系，稳定就业。政府应该通过更多政策激励企业维持雇佣水平的稳定，避免大幅度裁员。

为了鼓励创业带动就业，需要在制度环境方面下功夫。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减少审批事项，规范审批行为；拓宽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解决创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于首次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和就业困难人员给予政策补贴等等。

### (3) 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多渠道就业创业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青年人群的失业状况较为严重，青年人失业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政府一直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工作，到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去工作。通过“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在资金和创业服务方面提供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我们认为，大学生创业值得鼓励，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症结在于“技能错配”，完成从“学校”到“职场”的过渡存在困难。为此，政府已经开始实施“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计划”，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组织毕业生参加职业培训和就业见习。我们认为应该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该计划，为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提供更多帮助，例如更早地开展职业培训，延长就业见习时间，提供求职补贴，解决毕业未就业的社保断档问题等等。

### (4) 破除妨碍劳动力、 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我国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型城镇化没有实现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纵向流动，农民工通过代际升级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难以实现。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遭受诸多不公待遇，例如多从事自我雇佣工作，缺乏劳动合同的保护，无法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等。农民工实现市民化，首先就要做到经济融入。根据中国家庭就业调查2011年到2017年的数据，我们发现农村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在劳动力市场表现方面有明显的趋同势头。如果能够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减少户籍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将进一步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从而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注：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并被新华社等媒体转载)

澎湃新闻  
THE PAPER

新华社  
XINHUA NEWS AGENCY

配图来源于网络

## 冯帅章：调查失业率统计方法科学规范

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在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调查失业率。这是官方统计首次正式公开发布基于劳动力调查获得的失业率数据，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在关注失业率数据本身的同时，对失业率统计方法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配图源于网络

### 1 指标定义采用国际统计标准

为解答社会各界对调查失业率统计方法的关切，笔者参照国际通行的失业率统计方法，对国家统计局劳动力调查制度进行了研究。从指标定义、调查内容、抽样设计、调查方法等方面看，我国调查失业率统计方法科学规范，符合国际惯例，我国调查失业率数据可以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也具有国际可比性。

失业率是指失业人口占劳动力（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单就失业率的计算方法看，是比较简单的。但何为就业人口，何为失业人口，则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为保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失业率可以用来比较，则必须对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定义作出统一的规定。国际劳工组织为规范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统计，保证各国劳动力市场数据可以相互比较，制定了标准的就业、失业指标定义。1982年第13届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统计的决议》，给出了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的标准定义，2013年第19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作、就业和劳动利用不充分统计的决议》又对相关定义进行了修正。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标准，在各国的统计实践中均得到执行。

我国劳动力调查同样采用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失业的统计标准。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6岁及以上才可以合法工作，所以就业人口是指在调查参考期内（通常为一周），16周岁及以上，为了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工作了至少1小时的人口，包括休假、临时停工等在职但未工作的人员。失业人口是指16周岁及以上，没有工作但在三个月内积极寻找工作，如果有合适的工作能够在2周内开始工作的人。由于采用了国际标准的就业和失业定义，保证了我国调查失业率数据与其他国家数据的可比性，在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体系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我国劳动力调查以16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为统计对象，且不论其是否进行了失业登记，均按国际标准进行就业失业状态的认定，使得我国调查失业率数据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态。

### 2 调查内容基本涵盖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方面

国际劳工组织一直致力于推动劳动力统计数据的收集与传播，并于1999年正式推出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项目，形成了包括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工作时间、工作报酬等17类关键指标。目前，国家劳工组织的数据库，收集了230多个国家、地区和区域的月度、季度、年度劳动力统计数据。从我国劳动力调查问卷所设调查项目看，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基本人口信息，包括受访者与户主关系、性别、出生年月、户口登记情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二是劳动力市场状态信息，包括就业身份、工作单位、工作时间、工作报酬、就业行业、就业职业、未工作原因、未工作时间、是否寻找工作、寻找工作的方式、未寻找工作原因、当前是否能工作、不能工作的原因、失去工作前的工作单位与职业等。涵盖了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所列的几乎所有项目。此外，还根据我国国情，设置了反映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人群就业创业情况的项目，既可满足国际比较的需要，也满足了我国就业工作对重点人群进行观测的需要。

### 3 抽样设计科学合理

我国劳动力调查在抽样设计过程中与国际劳工组织以及国内外相关机构、科研院所充分沟通交流，抽样方式、

样本量确定、加权调整、抽样误差计算几个方面均科学合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劳动力调查以我国大陆地区所有住户为总体，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第一阶段采用分层、与住房单元（house unit）数多少成比例的抽样方法（PPS抽样）抽取居（村）委会，第二阶段采用随机等距抽样在抽中的居（村）委会中抽取住房单元，并对抽中住房单元内的所有人员进行调查。

根据“在95%的置信度下，将城镇调查失业率相对误差控制在3.5%以内”的要求，全国每月总共调查约12万户（住房单元）。为减少指标月度间变化、年度间变化估计的标准误，同时减轻受访者接受访问的负担，提高应答率，世界各国的劳动力调查基本都会采用一定规则的样本轮换方法。我国劳动力调查采用2-10-2模式对样本进行轮换，即一个住户连续2个月接受调查，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不接受调查，然后再接受连续2个月的调查，之后退出样本。样本轮换确保：（1）每个月都有1/4的样本第一次接受调查，1/4的样本接受第二次调查，1/4的样本第三次接受调查，1/4的样本接受第四次调查。（2）月度之间样本有50%重复。（3）年度之间相同日历月样本有50%重复。

由于劳动力调查属于复杂抽样，其加权调整和抽样误差计算的技术要求很高。目前劳动力调查在加权调整时综合使用了无响应调整权数（non-response adjustment factor）、设计权数（selection weight）和事后分层权数（post-stratification factor），能够较好地还原总体的规

模和结构。使用“自助法”（bootstrap）来计算抽样误差，有效解决了复杂样本方差计算难题。从抽样误差计算结果

### 4 调查方法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来看，调查主要指标如调查失业率的标准误均满足设计要求，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估计精度可以满足使用需要。

由于民众对就业、失业的理解不统一，如果由受访者自行回答是否失业，则数据必然没有可比性，得到的调查失业率数据也不准确。为保证数据的准确，世界各国劳动力调查基本都采用派调查员面访的方式收集数据，而很少采用邮寄问卷或网络自填方式。我国劳动力调查也采用派调查员入户访问的方式，使用手持电子终端（PDA）现场采集数据，并通过联网直报平台直接将数据上报国家统计局服务器。这不仅可以大大缩短数据生产周期，强化调查过程的质量控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源头数据容易受到干扰的问题，提高数据采集的质量。

综上所述，月度劳动力调查的统计方法科学规范，符合国际惯例，数据质量可以得到有效保证且具有国际可比性。随着全国月度劳动力调查制度的确立，调查失业率纳入月度统计新闻发布内容，我国的劳动就业统计数据体系将进一步得到完善。

（本文首发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牛梦琦：淘宝村方兴未艾

随着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浙江、广东、江苏等地农村出现了一批专业的淘宝村。短短几年时间，淘宝村经历了萌芽、生长、大规模复制等几个阶段。后起的淘宝村村民面临着“科技红利”耗尽、房租上涨和引流竞争加剧的局面。笔者从广东省淘宝村概况与淘宝村模式出发，分析目前淘宝村发展面临的困境并提出政策建议。

### 1 淘宝村方兴未艾

根据阿里研究院的定义，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超

过100家并占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而一个镇上若出现的淘宝村数量达到3个及以上便可称为淘宝镇，淘宝村集群则意味着该县（区、市）的淘宝镇数量大于10个。2017年11月，阿里研究院对全国淘宝村和淘宝镇进行了统计和研究。目前全国发现超过2100个淘宝村，超过240个淘宝镇。全国共有六个省份淘宝村数超过100个，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今年在西部六个省市自治区，广西、贵州、重庆、山西、陕西和新疆，也开始“生长”出淘宝村。浙江省淘宝村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金华市淘宝村

数量最多，在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一。广东省淘宝村数量位居全国第二，达到411个，其中“亿元淘宝县”达到22个，广泛分布于珠三角、粤东、粤西及粤北地区，广州、揭阳、汕头、佛山的淘宝村数量位居全省前三位（揭阳与汕头并列第二）。普宁是广东省最大的淘宝村集群。

2017年广东省十大淘宝村集群

数据来源：《广东省县域电子商务数据报告（2016-2017）》

排序	城市	县（区、市）	淘宝村数量
1	揭阳	普宁	52
2	广州	番禺	38
3	广州	白云	37
4	佛山	顺德	32
5	汕头	潮南	30
6	汕头	澄海	23
7	广州	花都	21
8	佛山	南海	17
9	揭阳	榕城	11
10	惠州	惠阳	10
11	汕头	潮阳	10

## 2 淘宝村模式



淘宝村（配图源于网络）

从地理位置来看，尽管淘宝村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全国四分之三省、市和自治区均出现了淘宝村，因此淘宝村的分布极广。不同淘宝村主要经营的商品品类不同，但是根据淘宝村的兴起起源和发展特色，淘宝村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无中生有”型和“厚积薄发”型。

“无中生有”型淘宝村通常本身没有产业基础，村民自发或在带动之下利用淘宝网为主要交易平台，在线上面向消费者，在线上或线下接触供应商。“厚积薄发”型淘宝村往往本身就是某种商品生产的聚集地，村民最初利用电商作为产品的替代销售渠道，随着线上销售整体的增长，当地电商逐步专业化和规模化。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淘宝村，它们都是利用网络拓展销售时空，并在整个产业链中充当经销商或者代理的角色。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无中生有”型淘宝村完全以淘宝电商生态系统为依托，它本身既是该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需要依赖该系统联系上下游，使该系统成为一个不断完善并自我生长的闭环。

而“厚积薄发”型淘宝村往往兴起并发展于产业基础较好，甚至是形成了产业集群的地区，这些村镇不需要利用电商系统去寻找供应商，但是电商平台为他们提供了产品销售和面向消费者的新途径。

浙江丽水北山淘宝村的兴起与发展便属于“无中生有”型。2006年，在外漂泊辗转多年的青年吕振鸿回乡创业，以一台电脑加四千多块钱的成本在淘宝注册了一家自己的网店——“北山狼”，致力于销售户外运动产品，比如睡袋、充气垫等。由于北山村当时并没有户外运动产品相关的产业，其货源主要来自浙江义乌。从第一笔订单只挣到2元钱到半年后销量打开，“北山狼”第一年便创下80万元的销售额，吕振鸿的创业路径吸引了北山村村民的兴趣，村民纷纷上门求经开淘宝店，吕振鸿不仅手把手教村民店铺注册、样品拍照等一系列操作，一开始还免费为他们提供货品进行销售。在吕振鸿的带领以及政府的支持下，北山村的网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与浙江北山不同的是，广东省的淘宝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特色的产业集群，比如普宁服装、惠东鞋业、四会玉器、康江小家电等。这些地区淘宝村的发展都是建立在成熟的产业基础之上，可以划分为“厚积薄发”型淘宝村。以汕头的几个淘宝镇为例，龙湖区中华毛纺名镇外砂镇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淘宝镇。该镇的传统产业——毛织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已形成集聚优势，成规模的毛织服装企业达11家，比如获评为“中国服装名优企业”的广东爱华集团便发家于外砂镇。该镇毛织产业已形成较强生产能力，在外贸市场持续萎靡的背景下，为了扩大销路，诸多企业通过打开电商这一销售渠道来扩大市场份额。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据不完全统计，

外砂镇如今遍布着上万家淘宝店，年销售额超百万元的就有近百家。与外砂镇类似，潮南区陈店镇上的电商网批一条街，也是在当地内衣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店镇内衣领头企业之一的金伴内衣世界，不仅在线下有自己的内衣连锁品牌，同时在线上供应淘宝、天猫、微商等平台，打造线上线下联合运营的模式来提高销量。同样的，汕头澄海区电商产业的发展同样是建立在传统产业玩具产业和农产品生产加工工业的基础上。

尽管“无中生有”型和“厚积薄发”型淘宝村的兴起路径不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类型可能会相互转化，或者逐渐融合发展成集商品生产和电商销售为一体的综合集群。

以浙江省北山镇为例。吕振鸿的网店发展不久就面临了销量攀升和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的两大问题，由于当地没有生产基地，网店的进一步发展遭遇瓶颈。2008年，吕振鸿在线下创立了“北山狼”公司，建立了户外运动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真正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户外运动品牌。龙头公司实施品牌战略，村民进行分销的“北山模式”得到了村民支持。北山村各商户作为分销商，运用“订单+网上销售”模式，村民不需押金就能直接拿货在网上销售。村里90%的农户成为了北山狼的分销商，经营自有品牌的很少，“北山狼”品牌越做越大，北山淘宝村在全国销量过亿的淘宝村中也一直榜上有名。2014年以来，“北山模式”从全国走向世界，北山村作为中国“淘宝故事”的典型，分别被美国CNBC频道、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报道。

广州的淘宝村则是由“厚积薄发”型逐步转型成综合集群的典范。外砂镇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下，自发成立了“外砂毛织电商创业基地”以及“外砂毛织电商协会”。“外砂毛织电商协会”负责组织外砂镇内的电商定期分享经验，互通信息和资金互助。“外砂毛织电商创业基地”负责培训当地电商人才，实现电商各环节服务（包括店铺设计、产品摄影、美术工艺等）的专业化。同样的，陈店镇政府也设立了电商孵化基地，并联合当地一所职业学校培养电商人才。职业学校开设并且规范化电商培训课程，课程时间短，针对性强，收效快，不仅在当地广受欢迎，还得以在周边推广。类似的电商培训在全国各地的淘宝村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培训课程和培训老师如今都成了香饽饽，更是成为了陈店村可以向外推广的软实力。在以“玩具生

产占据世界市场40%”著称的汕头澄海区，不仅传统的电商蓬勃发展，更有特色的是，澄海区还发展了一种电商服务的新业态——电商展示平台。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365天全年不休的玩具展会，任何玩具批发商都可以在此平台找到当地的供应商。这样的电商展示平台其实对于产业集群地区非常重要，相当于解决了电商上游的供应商搜寻问题，也是外砂镇和陈店镇等这些村镇的电商协会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这些自下而上蓬勃发展起来的新业态也将成为推动“厚积薄发”型淘宝村不断升级的动力。

## 3 主要问题

电商平台最初“拉根网线就能月入百万”的科技红利早已消失，野蛮生长时代逐渐落幕。由于进入门槛低、经营模式同质化严重，网商业主在各类平台上疯狂竞争。一个全网销售过2500亿天量的双十一，正是由成千上万家网商的订单像蚂蚁搬家似的累计出来的。为什么这个市场能吸引大家前赴后继地投入，淘宝村甚至淘宝镇能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消费碎片化多样化的巨大市场，庞大的网商群体充当了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匹配工具，他们的存在即是合理的。然而，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后起闻风而动的淘宝村村民面临着“科技红利”耗尽、房租上涨和引流竞争加剧的局面。线上销售也不再限于淘宝、天猫、京东几大平台，微商、公众号等营销方式也在不断涌现，对于一个传统的电子商务参与者，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

## 4 政策建议

电子商务的概念早已被“新零售”所取代，“新零售”体现在线下体验和线上交易的结合，体现在人、货、场的重构。对于在淘宝平台摸滚打爬多年的电商来说，线上交易毫不陌生，但是如何结合线下体验，如何尊重“消费者”是最大的考验。想要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靠差异化建立起垄断优势，而差异化主要表现在两大载体，产品和营销。最终，“厚积薄发”型企业更可能实现产品的差异化，而“无中生有”型企业可能分化为专业的品牌营销服务商。

##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Vernon Henderson 教授： 要素市场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



Vernon Henderson 教授

2018 年度美国房地产与城市经济学会国际年会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REUEA) 已于 6 月 12 日至 14 日在中国广州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顺利举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Vernon Henderson 教授于会议开幕当日下午分享了一场题为“中国城市与城市化的胜利：要素市场的制约因素”的主题演讲。

Henderson 教授的演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视角分析中国城市与城市化的发展进程。Henderson 教授根据产业结构转变的特征将该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并探讨了不同地区及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差距。第二部分是具体分析要素市场对中国城市与城市化发展的影响。Henderson 教授分别从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并特别对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迁入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教授指出中国大城市在资本与土地市场受到的政策性优待是导致大量人口涌入的关键因素。

### 1 产业结构转变与城市发展

#### 结构转变阶段一：农民转入城市生产

Henderson 教授指出，在产业结构从农业为主导转向工业为主导的过程中，大量农村的劳动力迁入城市参与工业生产，中国的城市化也随之不断发展，不过这种发展集中于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等大城市，而普通城市则发展不明显，尤其是西部的普通城市。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差距很大，尤其是 2000 年后，大城市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Henderson 教授列出了一份数据，统计结果显示：1982-2010 年间，省级城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普通城市三者的人口年增长率分别为 1.49%、1.89% 和 0.8%；除重庆市外的其他三个省级城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的人口年增长率高达 2.36%；而对普通城市而言，除了东部地区的人口年增长率达到了 1% 外，中部和西部普通城市分别仅有 0.69% 和 0.57% 的增长率（自

然人口年增长率为接近 1%）。Henderson 教授还将各类型城市的城区人口比例与它们在汉朝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省级城市的城区人口比例比其在汉朝时期多了 80%，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则多出 64%，而普通城市仅多 29%。Henderson 教授还给出了一份从事农业人口比例的数据，1982-2010 年间，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均从 50% 多下降到 20% 多，而普通城市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则从 78% 下降到 54%，这意味着这些城市还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截止 2010 年，西部的普通城市仍有 69% 的劳动力在从事农业。

以上数据显示，西部仍然是倾向于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缺乏产业结构上的转变，西部普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也很可能是因此而长期停滞不前，且国家总体上仍有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与此相反，东部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人口增长非常迅速。于是 Henderson 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生产率吗？然而，Henderson 教授给出了一份研究结果，发现在中国城市大小与其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Total-factor Productivity, TFP) 关联很小，不少中西部普通城市的制造业 TFP 甚至高过了东部。对此，Henderson 教授认为，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受到了更多政策性优待，而不是因为其有更高的制造业生产率。教授进而认为，很多中部城市制造业的 TFP 更高，这很可能是导致 2008 年后很多制造业企业迁往中部城市的原因之一。

#### 结构转变阶段二：传统工业的扩散



传统工业 (配图源于网络)

Henderson 教授指出，标准制造业自 2008 年后开始有了明显的扩散现象，扩散的方向是由大城市的向小城市，

由东部城市向中西部城市。这个现象符合大部分发达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和韩国的产业发展历史。对于标准制造业企业来说，由于设址于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成本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高，它们很多选择搬迁至中部地区的普通城市。Henderson 教授以 2008 年为界，分别比较了东中西三个地区各自在 95-08 年间和 08-13 年间年均制造业人口增长率变化，发现东部和西部地区在 08-13 年间的制造业人口增长率比 95-98 年降低了很多，且很多城市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中部地区不论何种类型的城市的制造业人口增长率均持续走高。然而这种变化却与中部地区城市，尤其普通城市的总人口增长率没有关系，东部的省级城市仍然持续扩张，不断有外地人口流入。对此，Henderson 教授认为，这与东部地区大城市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关，便于贸易的核心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如金融、房地产、商业服务、IT 和媒体）不断发展，而中部地区或普通城市仅仅是发展了制造业。数据表明：省级城市的制造业人口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为 29%，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 37%，普通城市为 43%；而省级城市的核心服务业人口占非农业人口的比例 16%，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为 10%，普通城市仅有 5%。这说明在产业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核心服务业和创新产业很可能对城市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制造业的发展则与城市发展关系不大。

Henderson 教授尤其提到了西部地区城市不论是在人口增长还是产业发展及结构转变上持续停滞、落后的情况，提出了一个“该如何帮助西部？”的问题。教授特别指出，现有的对西部地区增加建造更好的高速公路系统的措施并没有帮助解决城市不平衡发展的问题，Henderson 教授和其他几位合作者即将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上发表的论文证实：修建高速公路加剧了区域首府和该区域其他内地城县之间的发展差距，对当地公路的投资每增加 1% 会导致当地内地城县人口减少 0.17%、私人企业工资减少 0.16%、制造业受雇人数减少 0.35% 以及商业服务与金融产业减少 0.29%；而对于当地区域首府而言，政府对公路的投资均对其在以上的各项指标带来了提升。因此，如何更好地帮助西部普通城市，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 2 缓慢的要素市场变革

某些城市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它们享有政策上的优待。在中国，受到优待的城市主要是东部的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和一些副省级城市。受政策性优待的优势表现在这些城市能获得价格更低廉的资本、相对更多的资本配额和新增城市建设用地配额。工厂、工人纷纷涌入这些特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过大，有些城市出台了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来应对过多的人口流入。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福利损失。

Henderson 教授分别从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三个要素市场进行阐述。因为这些要素市场的变化通常都很慢，所以他称之为缓慢的要素市场变革。

### 资本市场：“优待城市”资本更低廉

在中国，资本配置是由在首都或省会城市的银行总部决定的，其他城市的银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很小。Henderson 教授和其他两位合作者 2017 年在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发表的论文证明：受政策优待的城市能够享有更低廉的资本价格，或是获得更多的资本配额。

Henderson 教授对 2007 年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享有更低的资本价格，这表明着国有企业相较民营企业更受优待。接着，教授比较了位于一般城市的民营企业与位于北京、上海和天津三个东部直辖市的民营企业资本回报差异，发现位于直辖市的企业获取资本的价格更低，同样也说明这些直辖市地区享有政策倾斜。教授进一步分析了 2013 年情况，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仍然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政策性优待，不过有所好转的地方是：西部和中部城市的资本价格与 2007 年相比有所下降，北京和省会城市的资本价格则没有变化。

### 土地市场：“优待城市”土地配额更多

Henderson 教授首先从住房供给弹性入手进行分析。从城市短期住房供给弹性数据来看，北京和上海的住房供给弹性很小，意味着这些城市新增住房供应量对于新增住房需求量的反应很小，也就是说住房供给无法满足住房需

求，这也是北京上海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而与北京、上海相比，中国普通城市则有较大的住房供给弹性。

城市住房供给弹性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结果？Henderson 教授指出了常见的解释机制，它与建筑容积率（Floor to Area Ratios）正相关，也就是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通常政府会对建筑物的高度及用途作出各种限制。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位于沿海城市的建筑，以及位于同一城市内部的黄金地段的建筑受到的限制更强，使得这些建筑的容积率较低。然而，如果排除这些限制，在市场本身力量的驱使下，处于这些好位置或地段的建筑会比在有限制条件时要造得高出 25%-33%。由于政府的限制降低了这些建筑的容积率，进而降低了住房的供给弹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城市的房价上涨。

Henderson 教授还给出了另一个解释机制——国家对未开发绿地（Greenfield）的分配。出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中国政府限制农业用地变成城市建设用地。新的城市建设用地的分配受到条件约束，政府只能将未被使用的土地规划为建设土地，或者相对地从基础农业用地中规划出部分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然而，这些土地配额具体是怎么给出的呢？2006-2020 年新增建设城市建设用地数据显示：越大的城市和发展越快的城市获得更多的土地配额。受政策性优待的城市能够获得更大的土地配额，然而，这些大城市的住房价格弹性却很低，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把这些土地用于发展商业和工业。

## 劳动力市场： “优待城市”面临流动人口问题



中国流动人口（配图源于网络）

Henderson 教授指出，为了利用更低廉的资本和更多的土地配额，受政策性优待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企业的进入和扩张，并进一步导致了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带来了流动人口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Henderson 教授认为需要关注 2000 年中国政府放宽户口管制后，仍然长期存在的对人口流动的某些隐性限制，比如某些东部沿海大城市仍在提高外来人口的落户门槛。

具体来说，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主要受到来自住房、孩子上学、缺乏社会保障和受歧视这四个方面的阻力。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人口不仅不能在城市购房或无法获得房贷，而且他们面临很差的居住条件。农村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也十分值得担忧，由于他们的孩子很难进城里的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上学，一些父母要么把孩子留给老家的老人照看，要么把孩子送到地下学校、未经法律许可的私立学校，于是带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此外，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极度缺乏社会保障，同时也遭到来自本地市民的地域歧视。

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城市流动人口问题，Henderson 教授认为给外来人口城市户口这个方案太过简单。根据 Cindy Fan (2016) 的研究，很多农村移民之所以不愿意

要城市户口，是因获得城市户口要求他们放弃自己在乡下的财产。所以如果不改变农村的这些规定，仅仅提供农村移民城市户口这一改革措施是行不通的。进一步来说，户口改革还要求消除城市本地居民对农民工的歧视。

Henderson 教授特别指出了令人惊异的现象：即使面临着严峻的流动人口问题，四个直辖市的人口持续增加，且这些城市超过 45% 的劳动力是由外来流动人口提供的。对此，Henderson 教授也给出了相应的解释，根据 Tombe & Zhu(2017) 的研究，实际上中国的人口流动成本很高，尤其是跨省流动。不过，即使提高了落户门槛，大量的人口在过去 20 年中仍不断涌入像北京这样的城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实际上在于流动人口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北京有很多城中村，一些村的名字就是聚居在这里的人以他们家乡名字命名的。外来人口可以事先依靠在大城市的关系网络找到维持生计的工作和住处，且这些关系网络能在很长一段时间持续给外来移民提供帮助和机会。

此外，Henderson 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他目前正在着手的一项研究——计算中国各地区城市的迁移成本。研究的初步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的迁入成本较高，而广东省则是迁入成本最低的省份，且广东省也是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省份。

最后，Henderson 教授和大家分享了他目前计划要做的一项研究的想法与思路，他试图用结构模型，在分析各种规制或限制因素对中国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影响的基础上，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学术层面的解答：假设去除掉对中国一些城市在政策上的优待，使所有城市处于同样的平台上，即它们面临不收任何偏袒优待的、机会平等的资本和土地市场时，提高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会对城市规模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对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Henderson 教授认为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的问题。

## 2018年度美国房地产与城市经济学会国际年会 “业界论坛”精彩回顾



与会嘉宾合影

会议伊始，Titman 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决定了城市的建设规划”。余猛认为，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中央政府决定了每一座城市的人口、结构等，而地方政府则在更具体的领域决定了城市的发展，但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受到中央政府的限制的。换言之，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决策需要上报至中央，并最终由中央部门拍板决定。然后，Titman 教授继续提问，“政府如何决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在余猛看来，地方政府会根据现在和未来的土地需求对土地的用途规划进行权衡取舍。而王洋则认为，高层建筑的决定权由中央政府决定，若建筑的影响力越大，则对其建设拥有决定权的政府层级也会越高，但目前绝大部分的建筑决定权仍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上。当问到土地出卖的过程时，王洋回答说，由于土地所有权在政府手中，因此开发商购买的土地都是从政府手中购买的二手土地，其购买大多是通过法律规定的拍卖形式进行。在拍卖进行的前20天，地方政府会公开拍卖土地的信息，而在这20天时间里，一方面开发商会对拍卖土地进行研究，并决定如何开发这块地，另一方面，有远见的地方政府也会考虑如何利用拍卖土地打造更宜居的城市社区。



四川成都领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  
战略投资中心总经理 王洋

针对土地拍卖，王洋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开发商在制定预期开发计划时会考虑多种因素，其一是他们的销售速度，其二是他们的定价策略。开发商通常要花数个月的时间与政府谈判，并准备各种文件，例如土地使用许可证、土地开发方案、土地绿化、施工工程方案等。王洋认为现阶段政府的供地能力较弱，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的土地需求远大于土地供给。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Sheridan Titman教授

但令 Titman 教授感到困惑的是，在考虑建造更多住房及供应更多土地时，中央政府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余猛认为，怎样提供更多的住房是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问题，因为在目前的住房供给上，有的开发商仍然持有大量未出售的住房。而邓永恒教授则补充说，作为城市规划者，政府应该更多考虑城市需要什么。在货币市场上，中央银行在市场过热时可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以调节市场，但土地市场毕竟不同于货币市场，如果在土地市场过热时，政府增加土地供应以稳定住房价格，那么将容易导致市场发生混乱。因此他认为，城市规划者只需要关心城市需要什么，而开发商才需要关心市场需要什么。而姚文雄副教授以香港市场为例解释，香港的房价之所以一直居高不下，部分原因是香港只开发了不足20%的土地，而八成以上的土地则被作为储备，不允许开发。政府在其中面临的困境是，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与住区研究所副所长 余猛



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罗宾逊商学院 姚文雄副教授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威斯康辛商学院 邓永恒教授

它应该是容许房价高涨，抑或是以降低房价为名实施破坏市场稳定的政策。

在讨论土地供给问题时，王洋认为，近年来，政府的供地速度越来越慢，这使得只有少部分家庭可以承担得起高昂的购房成本。当问到是谁在购买住房时，王洋的回答是，这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购房群体，一类是为了满足购房自然需求的买家，一类则是买房不为自住的投机商，还有一类是为了满足未来住房需求的家庭，而第四类则是为了孩子教育而购买学区房的群体。目前政府的调控政策大多是企图抑制后三类住房需求，但现实表明其效果并不显著。

在问答环节，有听众提问，从街道的角度观察，为什么国外的城市规模都普遍较小，而中国的城市规模却显得较大。在余猛看来，这是由城市间竞争造成的，资本密集的城市会建造更宽敞的街道，更高的建筑，而有些资源稀缺的城市的街道也更窄，人口密度更低。中央政府近年来也不断出台政策以求降低城市的人口密度以及开放城市社区等。其后，姚文雄老师就他关心的中国“鬼城”问题提问，一座城市在沦为“鬼城”后，其城市规划及其土地市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余猛认为，不同的城市，其情况也会不同。他举例说，郑东新区便是“鬼城”改造的成功例子，首先郑东新区距离郑州市中心不远，其次，郑东新区所在的郑州市是河南省会，集中了全省的资源，而同为“鬼城”之一的鄂尔多斯却只是普通城市，难以享受到郑东新区同样的资源待遇。

##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Joseph Gyourko： 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美国经验值得借鉴吗？

2018年度美国房地产与城市经济学会（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REUEA）国际年会已于6月12日至14日在中国广州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顺利举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 Joseph Gyourko 于6月14日下午分享了一场题为“Understanding Chinese Housing Markets: Learning from the American Experience?”的主题演讲。



Joseph Gyourko 教授

Gyourko 教授的演讲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加总数据出发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和数量变化的差异，进而强调中国特殊国情的重要性；第二部分选取了中国和美国一些极具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第三部分则是总结，Gyourko 教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解剖析。

在第一部分，Gyourko 教授首先展示了美国 1975-2017 年分季度统计的 Case-Shiller（由标准普尔发布的房价指数，以重复销售定价技术为基础）和 FHFA（Federal Housing Finance Agency）房价指数，两者变化趋势非常接近，共同反映出美国房价存在周期性变化的特征事实，那么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呢？为此，Gyourko 教授展示了衡量中国土地价格的沃顿-清华（全称 Wharton-Tsinghua Chinese Residential Land Price Indexes, CRLPI）指数从 2004 年第 1 季度至 2017 年第 4 季度的变化趋势，该指数涵盖了 35 个主要城市。从结果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年均上涨 16%，约为中国 GDP 增速的 2 倍。Gyourko 教授指出原因

之一可能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真正开始发展是在 1988 年邓小平改革之后。因此对于基数较小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略微的增长都会显得增长率很高。但即便这样，我们仍然会去思考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真的存在泡沫？

然后，Gyourko 教授将关注视角从房屋价格转移至房屋数量。其一，通过展示 1975-2017 年美国房屋交易量数据，他指出过去 40 多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交易量翻了一倍，人口每年 1% 的增长率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其二，美国房屋拥有率也从 1965 年的 63% 达到 2004 年的极值点 69%；其三，房屋数量与价格的变化是密切联系的，从数据也可以看出随着房屋需求数量的变化，房价指数几乎呈同趋势变动。而对于中国而言，数据显示从 2007 年第 1 季度至 2016 年第 4 季度房地产市场建筑面积增长率在 0 上下进行剧烈波动，并未呈现出单调变化的趋势。Gyourko 教授认为这背后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外，一定程度上可能也体现了政府调控的作用。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如果关注和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仅仅关注价格信号是不够的，还需关注房屋开发数量上的一些特征。

在第二部分，Gyourko 教授详细分析了中美房地产市场一些代表性的城市。首先，他展示了美国 FHFA 房价指数 1975-2017 年在三类不同市场中的变化情况：第一类是美国的“阳光地带”，数据包含亚特兰大、夏洛特、达拉斯、拉斯维加斯、迈阿密、菲尼克斯和坦帕等城市；第二类是美国东部沿海城市，涵盖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第三类则是美国西部沿海城市，包括丹佛、洛杉矶、波特兰、圣地亚哥、旧金山和西雅图等。从中可以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差异越来越大，近 40 年的数据反映出“阳光地带”的价格指数变动微弱，而东部与西部沿海城市的房价呈现出周期性波动上升的趋势，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答案可能是住房供应弹性。过去几十年，涌入“阳光地带”的人口急剧上升，但住房数量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匹配这种需求的变化，这也是“阳光

地带”崛起的原因之一。而在美国东西部一些沿海城市虽然对房屋的潜在需求旺盛，但住房供应缺乏弹性，新建的住房单元少之又少，所以这些急剧增长的需求最终反映在了高房价上。对于中国而言情况类似，Gyourko 教授以北京和大连为例，前者的房价从 2004 年至 2017 年急剧增加，而后者的房价波动变化、增长较小。对于房价区域差异的解释仍需回到对市场结构的剖析中，因此他用图例详细对比了不同土地供给弹性下房屋价格与数量的变化，为经济学的直觉性分析提供了理论框架。

然后，Gyourko 教授指出房价是由供给与需求两种力量共同决定的，所以要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变化就要将这两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为此，他与合作者测算了 2001-2014 年中国 35 个主要城市的房屋供需比，从中发现北京（87%）、杭州（79%）、深圳（73%）上海（70%）等 6 个城市出现供给不足，这些无法满足的需求比例达到 10% 以上；而成都（230%）、重庆（193%）、呼和浩特（178%）、西安（130%）等 14 个城市则出现过度供给至少 30% 的现象；昆明（120%）、长沙（119%）、海口（101%）、广州（93%）等 15 个城市则处于前两类之间。

最后，Gyourko 教授使用房价收入比与购租比两个指标再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进行分析。一方面，通过计算中国 12 个主要城市从 1999 年至 2016 年的房价收入比，他指出这些城市的最低房价收入比都在 5 以上，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多年都在 10 以上，而像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在 3 左右。因此，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非常高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未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增长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意义深远；另一方面 Gyourko 教授与合作者还计算了上述城市从 2009 年第 3 季度至 2014 年第 1 季度的购租比，从中发现北京、广州、南京等城市有略微上涨趋势，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大连等城市基本保持稳定，杭州、成都、长沙以及西安则有所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Gyourko 教授在第三部分进行总结讨论，主要得出以下观点：第一，由于数据限制，关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的问题还无法得出确切结论；第二，房地产市场周期性变动的特征在中国并未出现；第三，相比美国，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较多的行政干预，所以要研究中国问题不仅需要关注房价，还应关注房地产数量；第四，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存在过度开发（尤其是中西部城市）、投机、道德风险等问题。



美国拉斯维加斯（配图源于网络）



中国房地产工地（配图源于网络）

# 数据调查

- 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参加“学生领袖成长计划”调查方法专题讲座
-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 2018 AREU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与会嘉宾参观社会调查中心
-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第一轮宣讲会圆满结束
-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预调查顺利开展

## 社会调查中心受邀参加 “学生领袖成长计划”调查方法专题讲座

2018年4月14日下午，受暨南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邀请，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花芯、王依淳老师赴番禺校区开展“社会调查方法与社会科学”主题讲座活动。作为我校“学生领袖成长计划”培养课程之一，该讲座面向中级和高级研修班学员展开，主要分为调查研究概述以及问卷设计两大板块。学院教务黎莉老师也出席了本次讲座。



讲座全体师生合照

讲座正式开始前，研修班全体学生对中心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随后，黎莉老师对社会调查中心以及社会调查协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社会调查活动，提升专业技能。



黎莉老师（左一）介绍社会调查中心以及社会调查协会

首先，调查研究作为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之一，花芯老师介绍了其应用领域和特点，并在帮助学生整体把握调查设计流程的基础上，结合丰富的案例，对抽样方法选择，数据收集、处理、分析，调查报告撰写等环节进行了细致地分析。



花芯老师、王依淳老师针对调查方法作介绍

随后，围绕调查问卷，王依淳老师详细介绍了问卷设计的流程、结构以及常用网络问卷平台，并从问题的语言、数量、顺序以及提问方式等角度分析问卷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王依淳老师还结合具体的问卷案例与学生进行互动，通过对问卷“找茬”帮助学生消化理论知识，调动其兴趣和积极性。

最后，围绕学生关注的调查报告获取途径、调查数据的社会意义等问题，花芯、王依淳两位老师又针对性地作出了解答，帮助学生更进一步地了解调查理论知识、提升调查应用能力。

“学生领袖成长计划”是我校学生领袖人才培养重要平台，此次讲座在增强学生干部社会调查能力、社会实践热情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提高了同学们对社会调查中心及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的了解。



学生进行问卷“找茬”

##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成立仪式顺利举行

2018年5月18日下午，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成立仪式暨我校第十九届大学生学术科技节开幕式、第二届“青年之声，等你发声”大学生调研大赛决赛在图书馆二楼大厅顺利举行。暨南大学副校长饶敏、经济与社

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校团委书记成书兴、暨南大学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以及各学院党委书记、团委书记出席了此次活动。

首先，饶敏副校长发表讲话，对协会的成立以及第二届大学生调研大赛决赛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一直以来提供支持和帮助的领导和老师表达衷心的感谢；她表示学校高度重视科技以及创新创业工作，协会的成立可以让同学们亲身走进社会，通过参与调研活动锻炼同学的问题分析与理性思考能力，希望同学可以肩负起重任，为学校、为中华民族贡献青春和力量。

致辞结束后，饶校长、成书记、冯院长、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以及协会学生代表柴秋香共同为社会调查协会揭牌，在一片热烈掌声之中，红牌布被揭开，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正式成立。

随后，冯帅章院长进行致辞。冯院长首先对饶敏副校长以及各位领导的到来和一直以来给予经济与社

会研究院和社会调查中心的支持表示感谢。冯院长向与会领导和同学们介绍了社会调查协会成立的初衷和概况，表示社会调查是了解国情、社会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协会将向暨大学子传播更专业的调查知识，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最后，冯院长发布了下一届调研大赛的主题“乡村振兴”，并从国家、省级战略的角度进行了解题。



饶敏副校长致辞



揭牌仪式



冯帅章院长致辞



活动现场

仪式尾声，饶校长宣布学术科技节开幕，由校团委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大学生调研大赛决赛也拉开帷幕，20余支团队现场接受评委评审，并最终决出前12名获胜队伍，获得挑战杯资助立项。

至此，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成立仪式圆满落幕，相信在学校领导与老师们的支持下，在社会调查中心的带领下，协会将会为全校同学提供更专业的调研培训，举办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的同学能通过社会调查去认知现在的社会环境，提升自我的综合能力和科研水平。



答辩现场

## 2018 AREUE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与会嘉宾参观社会调查中心

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 American Real Estate and 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AREUEA) 一年一度的国际年会于2018年6月12日-14日在中国广州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举办，会议首日，在 IESR 副院长、本次会议组织者张思思副教授的带领下，与会学者嘉宾们参观了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为直观认识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 (Survey Data Center, Jinan University, 以下简称调查中心) 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以下简称研究院) 所发挥的作用，更全面地了解调查中心背后项目、数据、技术以及执行团队，参加2018年美国房地产和城市经济学会的学者嘉宾们在研究院副院长、本次会议组织者张思思副教授，调查中心副主任李芮、薛森的的带领下，于12日参观了调查中心。

与会学者嘉宾分别参观了调查中心的办公区域和电话调查室，调查中心全体成员对学者嘉宾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研究院及调查中心领导向学者嘉宾们介绍了调查中心的组织架构及运作模式。随后，调查中心副主任李芮，项目主管蔺昱夏，数据分析师刘润芝分别从中心概况、主要调查项目、调查质量控制方面向来访嘉宾介绍了社会调查中心。嘉宾们对中心调查数据的收集能力及成果印象深刻，双方针对调查项目细节、数据获取的渠道和方式等方面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希望未来能在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方面展开合作。



学者嘉宾与研究院、调查中心领导及中心成员合影留念

社会调查中心作为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坚实的項目开展平台、数据收集平台以及调查研究平台，目前已开展多项与国计民生、热点问题有关的大型调查项目，调查方向主要为关注城乡迁移人口、劳动力市场、制造业企业、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等内容，与国家、各级政府的政策需求高度契合。房地产和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热点问题，中心将以 AREUEA 会议为契机，把中心成果分享给更多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者，并为将来的数据收集做准备，继续致力于为经济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支撑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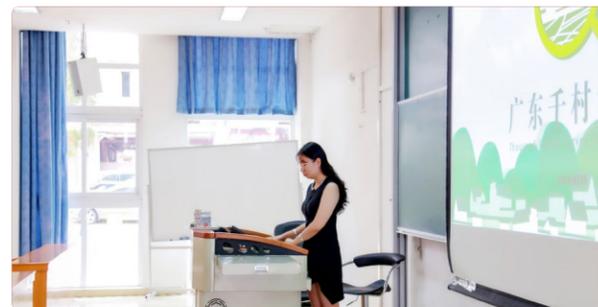
学者嘉宾与研究院、调查中心领导展开讨论

##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第一轮宣讲会圆满结束

2018年6月15日，“广东千村调查(Thousand-Village Survey in Guangdong, 以下简称千村调查)”第一轮宣讲会在暨南大学富力教学楼 A124 教室举办，千村调查项目主管花芯带领项目组成员及部分暨南大学社会调查协会会员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宣讲会伊始，花芯首先向前来参加宣讲会的同学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向与会同学简要介绍了千村调查的项目发起方和执行方。千村调查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起，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社会调查中心作为具体执行方，并于2017年曾执行过四项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其中中国家庭就业调查也是与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共同主办，在暨南大学等广东省高校内招募了逾百名调查员。暨大学子李蔚同学作为2017中

国家家庭就业调查项目的学生代表分享了去年参与项目的体验和感受。他认为社会调查不仅能够增长见闻、深入基层、了解社会，而且能够获得更多学术研究方面的启发和人生成长，此外李蔚还分享了很多实用性的实践经验，为今年即将加入调查项目的同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千村调查项目负责人花芯老师向参会同学作介绍

随后，本次宣讲会进入最重要的环节，花芯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千村调查项目开展的背景、意义、招募计划及后续安排。千村调查将深入广东乡村进行入户调研，从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治理与乡村运行效率、农村生态环境、教育脱贫战略、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征地问题、农村金融改革等角度出发，系统地收集广东省乡村发展的微观数据和相关信息，并利用收集到的一手数据研究三农问题，实现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有机结合，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在介绍环节之后，针对同学们最关心的前期抽样、项目执行过程中的指导以及费用报销等问题，花芯一一为同学们进行了详细解答，并分享了自己参与调查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同学们积极参加社会调查中心的项目。



学生代表李蔚同学分享参与调查项目的经历和感受



参会同学们向花芯老师提问



部分参会同学与项目负责人、项目组成员合照

## 广东千村调查项目预调查顺利开展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2018年6月15日，在端午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广东千村调查”开启了项目预调查。本次预调查团队由研究组助理教授马祥、助理研究员李承政，社会调查中心项目主管肖和以及项目督导梁志樵、慕容英奇、李步清、陈浩然组成，目的是在预调查过程中，从问卷设计和实地执行两个方面检验问卷的效度。

15日上午，项目预调查团队一行驱车来到佛山市南海区某村委会，并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对该村村民进行了入户问卷访问，以及对村干部进行了村问卷的访问。在访问过程中，预调查团队成员认真记录下村民回答问题时的表现和所思所想，尽可能地提前发现问卷漏洞，理顺问卷的整体逻辑。

中午稍作休整，预调查团队立即驱车前往下一个预调查点——广州市花都区某村委会。在路上，预调查团队就上午访问时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详细的讨论，并确定了下午访问时需重点关注和检查的题目。下午15时，预调查团队一行来到了指定村委会，在村干部的安排下，分别对村民以及村干部进行了入户问卷和村问卷的访问。有了上午的经验，团队成员在第二次访问时显得驾轻就熟，有针对性地对受访者进行询问。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结束对本轮预调查样本村的访问后，预调查团队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通过本次预调查，预调查团队对问卷的结构和题目的设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对广东农村的现状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而这些理解和认识将会被记录下来，推动问卷设计的进一步优化，在正式调查时结成丰硕的成果！



预调查团队与某镇居委会干部（左四）合影



研究组助理教授马祥对某村民进行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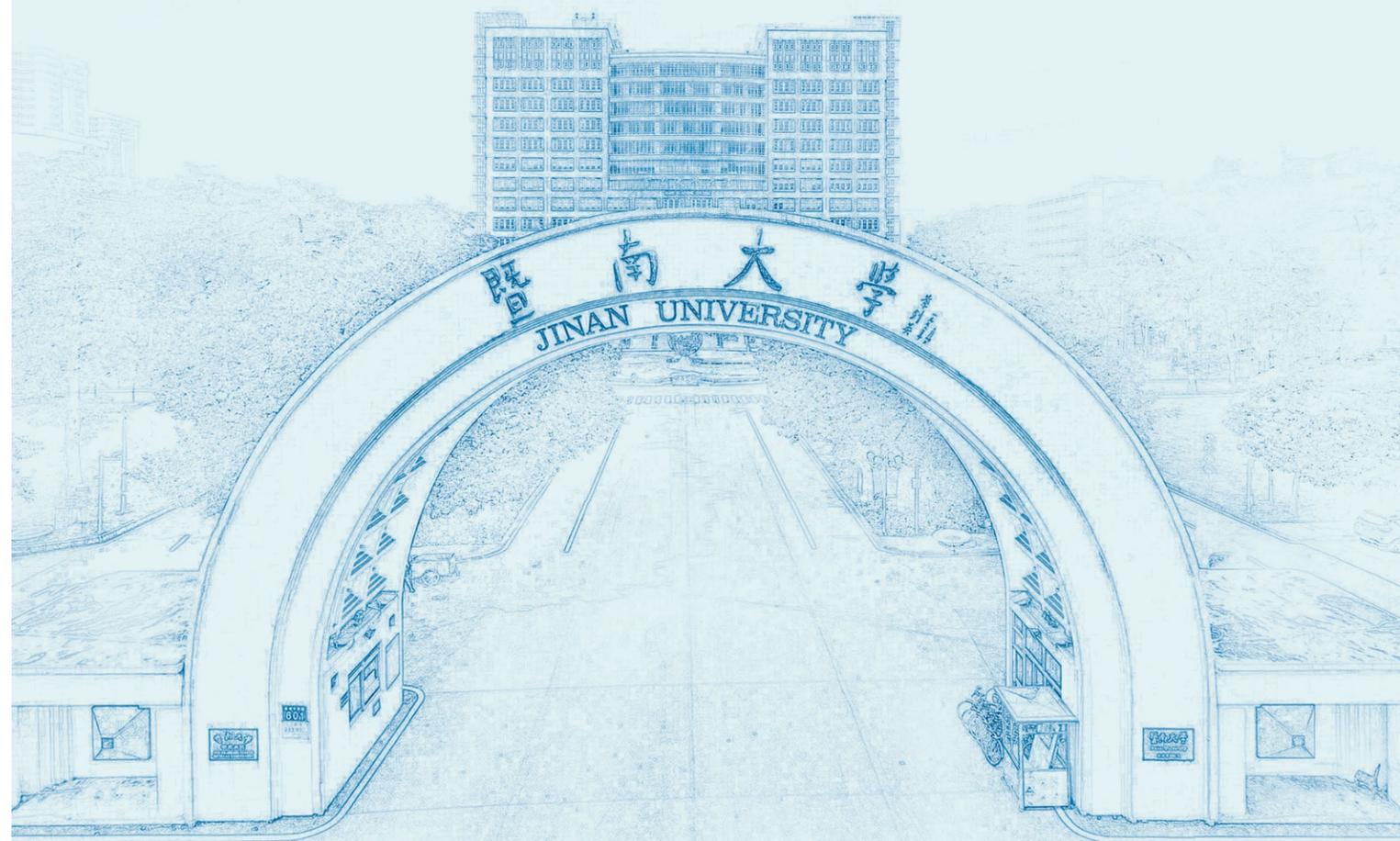
项目督导慕容英奇、陈浩然对某村村干部进行访问



预调查团队与某村村干部（左四）合影

## 对外交流

-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访问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 匹兹堡大学Daniel Berkowitz教授来访我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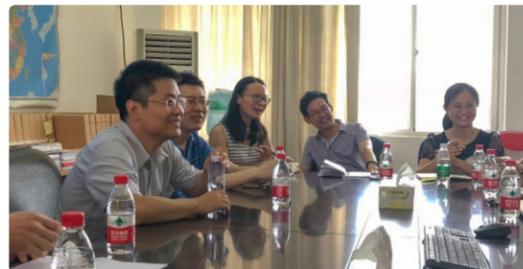


##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一行访问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双方交流现场

2018年6月19日上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带领“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一行前往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进行交流访问。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必良对项目组一行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组织研究院师生与项目组一行开展了交流。双方就“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问卷、执行方案等内容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探讨。



冯帅章教授介绍项目团队

经过讨论，两个团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拟在广东农村调查的数据收集和资源共享方面开展一系列合作，并期待在未来进一步拓展合作内容。



罗必良教授分享乡村调查经验

## 匹兹堡大学 Daniel Berkowitz 教授来访我院



分享会现场

2018年6月21-29日，匹兹堡大学 Daniel Berkowitz 教授来访 IESR。在此期间，除了参与 IESR 主办的主题为“中国经济”的论文研讨会外，Berkowitz 教授还与 IESR 的青年学者们分享了他的学术和生活经历。Daniel Berkowitz 教授曾任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的共同主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及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学、法律和金融学、应用微观经济学等。Daniel Berkowitz 教授的研究成果已在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等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

Daniel Berkowitz 教授首先分享了他对做研究的体会。对于研究内容，Berkowitz 教授认为目前中国有很多十分有趣的问题值得研究，参与这些社会经济热点话题的讨论非常重要。在阅读学术论文时，可以关注论文的被引用率，被引用率高说明这个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作为中国的学者，要留意这些话题，然后选择其中最让你印象深刻和最能激起你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对于研究过程，Berkowitz 教授则建议青年学者不必纠结于获得的数据是否完美，发现好问题和构建好模型比获得完美的数据更重要。

接下来，Berkowitz 教授还分享了他的阅读习惯与兴趣爱好。他认为一个经济学家要培养广阔的视野，除了经济学，他还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进行广泛的跨学科阅读。在科研之余，Berkowitz 教授爱好旅游和骑行，他鼓励各位青年学者们找到除学术之外的兴趣爱好，好好享受生活。



Daniel Berkowitz 教授

最后，Berkowitz 教授提到这一周在 IESR 的经历与体会，他与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及 IESR 不少全职教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IESR 的发展速度、师资质量、正在进行的研究问题以及社会调查项目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来，他希望与 IESR 的学者们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 人物专访

IESR人物  
名师零距离

## IESR 助理教授殷立娟：让 经济学研究真正地经纶济世

### 工作上的启蒙

殷立娟早期曾就职于一家财讯公司做财经编译与市场分析工作，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研究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基本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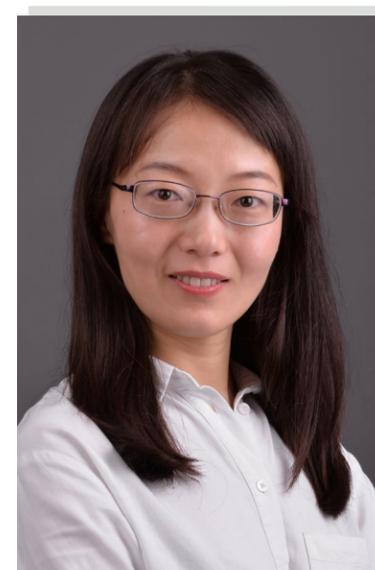
那个时候的殷立娟每天盯着的都是全球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一方面，变幻莫测的市场让她为之困惑和震撼，而另一方面，市场预测又让她痴迷不已。这样的工作内容不仅让她加深了对经济学的理解，还驱使着她去不断地去查阅并学习新的理论知识。殷立娟在工作当中将所学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逐渐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也激发起她对经济基本面尤其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兴趣。从那个时候起，经济学在她面前，释放出了巨大的魅力。

能将工作与兴趣相结合，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财讯公司的工作实践是殷立娟最初的兴趣的来源，让她找到发自内心为一件事认真投入的感觉。或许正是那段时间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内容让她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感受到自我价值，她决定系统性地深入研究经济的运行规律。

### 远行必有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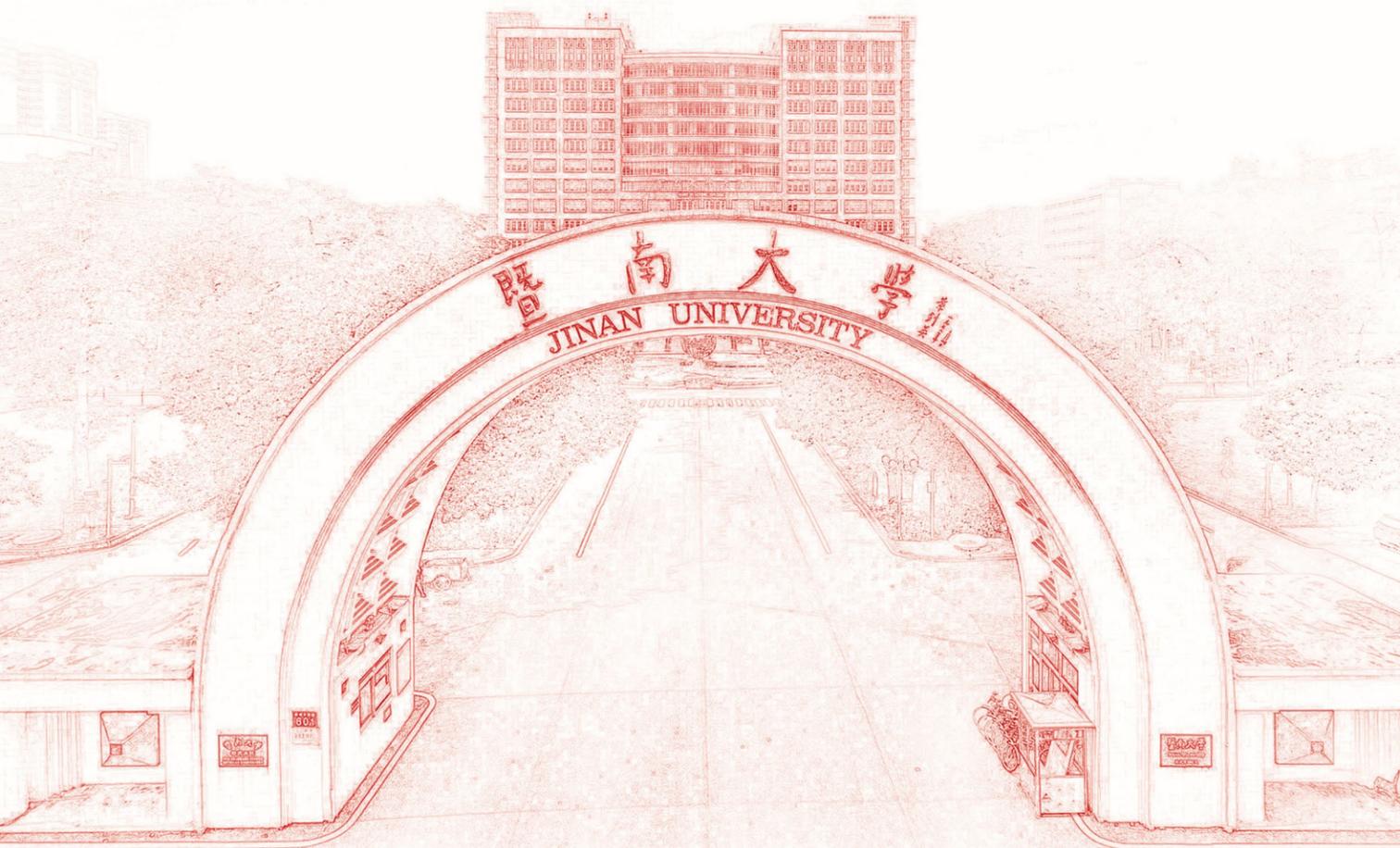
殷立娟本科就读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专业，大学本科四年的迷茫是她求学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毕业后，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适当的自我怀疑可以加深对自身的了解。可能性格内向的殷立娟，天生就是属于做研究的吧，她决定赴海外继续求学之路。

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殷立娟遇到了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她的博士指导老师



### 人物名片

殷立娟，2017年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她于2010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应用经济学。



Robert C. Feenstra 教授。Feenstra 教授是一位学识和人都让人钦佩的学者，他早上 6 点会准时到办公室工作，即使寒暑假也很少休息。

“他会在我的论文进展缓慢心情抑郁的时候，讲他在 MIT 读博研究的心理历程告诉我研究是一个过程，要多尝试并且坚持迟早会有成果；他从来不会敷衍学生，不管我的想法多么幼稚和不着边际，他都认真倾听，仔细思考过，再和我一起分析研究计划的可行性，优势和劣势。Feenstra 教授是一个 deep thinker，很少听完学生的陈述立刻给建议。我和导师会面场景经常是我讲完之后，他开始沉思。”殷立娟说。

Feenstra 教授对待学术研究专注勤奋，对待学生和蔼可亲，殷立娟在 Feenstra 教授的身上，看到了做学术研究应有的样子。研究是一个过程，要多次尝试并且坚持，要慢慢去感受发现真理的过程。



殷立娟在博士毕业典礼上与导师、同学合影

远行必有收获，博士求学生涯不仅仅让她收获了学识与阅历，还有她对自我更加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未来规划，让她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更加坚定。

### 最难得的科研品质

研究需要不停地探索和思考，所以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全身心投入的专注，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存在各种层级的摩擦。中国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国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等经济全球化现象时，不能直接套用西方

的经济学理论。”殷立娟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各个不完全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交互作用，可以说这是中国国情下的国际贸易。一方面，她从微观主体（主要是个体公司层级）出发，研究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下，进一步开放市场对短期资源配置，各个阶层福利效应，以及长期产业升级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从微观主体出发，分析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对我国国家制度产生的影响。面对微观主体的差异性效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节以最大化生产效率。

“我的研究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用科学严谨的方法搞清楚这些问题，并希望政策制定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让经济学研究能真正地经经济世。”

科研工作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有所收获的，要把握事件背后的原因，见别人之未见，要耐心、要细心、要信心。除此之外，殷立娟认为，科研中最难得的品质是诚实，好的研究需要严谨，需要尊重客观事实。好的研究者要诚实地面对数据和事实，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既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保持自己的初心，追求真理，才是做有意义的研究的本质所在。

“引用凯恩斯说过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罕见的天赋组合。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理解符号计算而且能用文字表达。他必须用一般表达他思考的特别事物，并在同一思索中触及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按照过去研究现在，目的是为将来考虑。他必须考虑人类的本性和他们的习俗。他必须抱有明确的目的但同时又要做到客观公正，他要像艺术家一样冷静而不流俗，但有时又要像政治家那样实干。”

### 保持初心、砥砺前行

人生之路，除了荆棘还有惊喜。2017 年，殷立娟在获得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后，开启了人生中一个新的阶段——正式受聘 IESR 助理教授。

在她眼中的 IESR 是一个认认真真做学术的地方，是一个能让人拥有好心情并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地方。这里是一

片沃土，汇集了一个年轻蓬勃的团队，适合年轻学者打拼与做研究。“我向往一个轻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因为研究工作需要有好心情。IESR 有着外向交流的开放心态，有想要做到最好的野心和稳扎稳打逐步发展的谨慎，有学术管理上的民主。总之，我觉得 IESR 做得比我想象的更好。”殷立娟说。

谈及 IESR 新成立的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在殷立娟的言语之中透露出的全是展望。目前，去年 IESR 已经举办了第一届“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发展”学术研讨会，今年这样的会议不仅会延续下去，而且还会定期邀请海外贸易领域专家来举办更多的 workshop，让该中心真正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



殷立娟在自己的独立办公室做研究

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目，经世以致用，作为一名研究者，最希望的就是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给出有见地有洞察力的政策建议，这是殷立娟想要努力的目标。

## IESR 副教授徐吉良： 用科学的理论模型解构社会

### 人物名片

徐吉良于 2009 年 6 月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4 年获得印地安大学伯明顿分校数学博士学位，1996 年和 1998 年先后获得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和数学硕士学位。徐吉良的研究领域为微观计量经济学、应用计量经济学、应用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目前，他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s Journal, Economic Modelling,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Economics Letters, Empirical Economics 等国际期刊。

穿着牛仔裤，背着黑书包，亲切随和，丝毫没有博导的架子——他便是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的全职教师徐吉良。

曾有老师打趣说：“徐吉良老师，吉良吉良，顾名思义就是在做‘计量’。”徐吉良专注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他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板块——非线性面板数据和测量误差模型。在他看来，复杂的理论模型最终的落脚点是剖析社会。”



## 从数学开始

徐吉良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获经济博士学位，先后在国立中正大学经济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以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任教。身为计量经济学专家的徐吉良，一开始选择的道路却不是经济，而是数学。

“其实本科读数学就业范围比较窄。我没有考虑这么多，只是纯粹出于兴趣——比较喜欢数学思考。”徐吉良说道。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到美国印第安大学，徐吉良走的越来越远，最终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精研数学也为他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数学转向经济，源于一堂经济课。在徐吉良即将取得数学博士学位时，偶然的一堂经济课让他发现经济学是一门广博的学科，它有不亚于数学的深度与复杂性，但同时又带有独特的广阔性。徐吉良渐渐开始反思到，数学深度有余但广度不足。在他看来，生活不仅要有深度，还需要广度，高深的理论知识不应束之高阁，还应服务于现实生活。就这样，他走进了经济学的殿堂。

从数学转到学习经济，徐吉良的思考模式以及学习方法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调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然而徐吉良却十分享受不断思考、克服困难的这个过程。他回忆起上大学的时候，在宿舍自学因特网。那时计算机操作十分繁杂，还需要自己搭建 wordstation（一种通用微型计算机）。虽然困难，但他并没有放弃探索，最终也顺利掌握这门知识。

## 经济学的多样化

通过对经济的进一步研究，徐吉良越来越体会到经济的包容性——在经济学这一大类下，还有若干交叉学科，如环境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当下，经济学作为一门显学，其覆盖面日益宽广。”

在一些人看来，经济正在逐步入侵许多学科，其研究领域扩展到很多传统的非经济学关注的领域，被称为“经

济帝国主义”。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经济学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其他学科解析问题本质的手段，与其他学科是相辅相成的。”

徐吉良解释道，在实证经济学中，研究者通过数据来说理。通过对数据的挖掘，为各个学科学说提供现实证据，使研究结论更加科学客观、更加有意义。“一门学科若只有理论，那就变成一种哲学了。当经济研究成为一种哲学时，它并不能分析出事情的本质。”徐吉良认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很宽容的学科，它与人类社会相通，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学科的融合。”

“IESR 成立的调查中心就是最好的例子。”徐吉良最后说道。IESR 在成立之初即建立了以高质量微观数据收集为重任的社会调查中心，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 (CEMP) 会结合社会调查中心的高质量数据，帮助学术研究客观、严谨地认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从微观角度认识社会的均衡发展，成功地将计量经济学与社会调查相结合。



徐吉良为参加 IESR 夏令营的同学带来学术讲座

## “男主外，女主内” 的刻板印象转型存在困难

关于计量经济对社会现实进行研究上，徐吉良曾就“探讨配偶相互就业状况如何影响个人就业决策和分工的家庭琐事”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在计量经济学中，数据是由外部给定的。对数据的解释则含有较大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解析与思考。计量经济研究并不像数学一样只是从逻辑上得到一个结果就可以了，还要与客观现实相符合。

徐吉良的课题探究的是：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变高，外出工作需求上升的情况下，家务方面的劳动是否要根据工作量进行重新分配？通过构建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他发现，在现在的中国，“男主外，女主内”刻板印象的转变还是存在着困难。即使双方都出去工作，大部分的家务活还是要由女性来承担，而男性则不用。

徐吉良提到，在家务分配影响因素中，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比经济因素还要大些。如果一个决策要达到最大效率的话，家庭的分配应该根据个体在外的工作量发生改变，但其“不变”引发了我们对男女平权的思考。“在女性生产力日渐提高的情况下，其家庭地位并没有获得提高。男女平权仍在缓慢进行当中。”徐吉良总结道。

## 未来的可能——AI 预测结合经济学

除了社会领域的应用，经济与科技的融合也是时下关注的热点。徐吉良提到，AI 的工作原理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存在许多差异。现在 AI 使用的更多是一种统计方法，主要侧重预测能力，其运用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测。经济学更注重因果关系，看因变量如何产生变量，即 X 如何影响 Y。比如，薪资增加了之后人们会不会多工作一些？如果会，会多增长几个小时？是否通过多工作一些时间获取更高报酬的人比较缺钱？工资高了是否会少工作一些，用更多的时间去 enjoy life(享受生活)？经济学就是通过这些现象寻找它们之间的影响，找到“因果关系”。

AI 对因果关系并没有那么讲究，偏重的是预测，而经济学偏重因果，从而预测可能出现的影响。徐吉良对此做出了大胆的猜想：“我在想未来是不是会有一种可能，将这种因果关系与 AI 的预测能力结合起来，用数据对未来进行更精准的预测。”徐吉良坚信，经济学的未来有很多种可能性。

## 是逆流而上，还是顺势而为？

学术道路的研究并非从来都是一帆风顺的，徐吉良在经济学这条道路上，也曾遇到过瓶颈。

他曾想做一个关于 IO Data 产业组织的研究，但这个研究需要大量繁杂的公司资料，有效资料获取难加大了这

项研究的难度，徐吉良最终放弃了这个课题，转向其他的方向。“固执地坚持一个难以展开的课题并非良策，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与其耗费大量精力在这上面，不如选择专心研究其他有价值的课题，提升效率。”



徐吉良参加我院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学术研讨会

许多人都会面临着“是否应该放弃自己的选择”这一问题。“由于经济学广度比较大，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口味，大家对问题的重视度会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人的研究方向。受瞩目的课题就会被大量研究，当人们觉得这个课题不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个研究就会停滞。”徐吉良说道。他进一步举例，计量经济学里可以粗略分为宏观计量和微观计量，在之前宏观计量颇为流行，但现在因为数据庞大粗略等缺点，近年来人们对宏观计量的关注度就减少了。

“不合潮流”的课题是否还要进行下去呢？在徐吉良看来，研究与否关键在于个人的心态。如果只是想单纯地做研究，那时代的偏好对个人的影响就不大。但如果只是想要追求学术上的成就，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可能受时代的影响会比较大。可以说，自由与否主要看个人想达到的目标。

为谋求对经济学更深入的研究，徐吉良选择来到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学院。吸引他的不仅仅是研究院与他较为一致的研究方向，同时还有 IESR 团队的干劲和活力。

在谈及自己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的时候，徐吉良说道：“我希望学生能比较深入地思考，同时也广泛关注一些前沿消息。未来的高端知识人才需要能力也需要眼界。我觉得学习要有一个过程，也就是先有深度，再拓宽出广度。”

# IESR 助理教授苏应俊： 寻找中国产业组织的出路

## 人物名片

苏应俊，2017 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她于 2011 年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9 年获得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她的研究领域为产业组织、发展经济学。

### “我的大学”

“我对产业组织的研究产生兴趣是源自童年时代的经历。”提起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研究方向，苏应俊如是说。

“父母在国企工作，经常带着我一起上班，我童年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国企的大院里度过的。”从“大锅饭”的规律生活，到竞争上岗，再到竞标等现代市场企业元素的出现，国企改革步伐在不经意间对苏应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有了对经济学最基础的启蒙和思考。

苏应俊在本科期间选择经济学专业，回想起当年的大学生活，她也感慨万千。在四年的本科生活中，苏应俊取得了国家奖学金，在大三时赴法国克莱蒙一大进行交换。同时学习法语、数学、经济学三门学科的她一度一周要修五十节课。苏应俊指出，本科时代的积累，是她之后学习和研究的养料。

“在北美求学期间，我的两位导师 Tom Rawski 教授和 Loren Brandt 教授都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在匹兹堡大学四年半的学习生涯中，苏应俊逐渐接受了完备的学术训练，并坚定了对产业组织与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其中她的主导师 Tom Rawski 教授对她的鼓励与帮助是功不可没的。



苏应俊获得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其实，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该校并没有产业组织相关的课程，这给苏应俊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戏剧性的是，多伦多大学的 Loren Brandt 教授接触到了苏应俊和她的课题，并邀请她到多伦多大学做交换，学习 IO（产业组织）相关的课程。冰天雪地里的六个小时的车程，从匹兹堡到多伦多，苏应俊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开始了”。

在多伦多大学，苏应俊在 Victor Aguirregabiria 教授的产业组织课程上受益良多，Aguirregabiria 教授深入浅出的授课方式使她受益匪浅。迄今，苏应俊还能回忆起在多伦多大学时和教授及研究伙伴们的思维碰撞，她直言，是在多大的学习经历唤醒了她对学术的热情。同时，苏应俊指出，Loren Brandt 教授对待学术十分严谨与专注，是她一生学习的对象。

### 对“企业生产率”的思考

苏应俊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企业生产率”。她指出，在比较不同类型和不同组织模式企业的生产率时，非专业人士可能止步于发现企业间生产效率存在的差异。作为研究者，苏应俊更注重于科学的评估。通过数据的优势，发现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差异，以这种差异解释企业的生产率的不同。以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比较为例，在生产、融资环境、原材料采购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如果直接横向比较，很难得到科学的结果。

苏应俊的当前研究重点是“如何科学地测算垂直联合企业的生产率”，以此出发比较不同所有制结构企业的差异。“目前得出的结果是私企相对于国企效率更佳”，但苏应俊指出“这并非全部的故事。”她解释到，私企相对于国企的效率优势仅存在于企业规模不够大的时候。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私企相对于国企的效率优势会逐渐消失，这归因于不同的竞争环境下私企不同于国企的企业组织战略模式。研究表明，私企亟需公平的竞争环境以更好地发挥效率优势。

### “做研究不能脱离实际”

苏应俊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尤其是在产业组织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学术领域，不能只关注形而上的理论和数据。在北美留学时，苏应俊便受到导师们的影响，养成了脚踏实地的学术研究风格。“我在博士的前几年，都会在假期回国，实地到企业的一线生产车间进行调研。”在建立模型、处理数据等环节，苏应俊都会和相关企业规划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工程师进行座谈，力求研究符合实际。在研究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率的过程中，她甚至学习了解了钢铁的冶炼步骤和冶炼方法。



苏应俊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 “选择 IESR 是种必然”

在谈到为什么选择 IESR 时，苏应俊表示，IESR 选择了她的同时她也选择了 IESR。在和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进行短暂的交谈之后，苏应俊便做出了加入 IESR 的决定。

“对于我们这样的研究人员来说，有机会参与数据的收集、获得第一手数据，是非常难得的。”在了解到 IESR 的学术环境与前景规划，特别是社会调查中心准备进行全广东省制造业企业调查之后，她便迅速做出了决定。“IESR 能为一个学者提供的资源和数据是相当可观的。”

苏应俊还特意提到了 IESR 新成立的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的研究中心，作为该中心的一员，她对该中心的发展前景十分乐观，“中心有非常有实力的学术带头人和同僚。”

### “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

苏应俊表示，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要服务于现实，小到企业战略，大到国计民生。“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合理地借助模型，研究解决如产能过剩等实际问题，评估产业政策，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才是研究的实际价值所在。”

“研究本身就要忍受寂寞和挫折”，她表示“我很佩服在研究这条道路上坚持踽踽前行的同仁们，我自己也会不断充实自我，坚持在研究的第一线。”毕竟，寻找中国产业组织的出路，服务国计民生，任重而道远。

# IESR 助理教授邱筠： 在绿水青山里寻找经济价值

## 人物名片

邱筠，2016年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得农业、环境与发展经济系博士学位。此前于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统计学学士双学位。

## 对研究的兴趣需要培养

提起自己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活时，邱筠露出了回忆的神色。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经济学这门学科时，邱筠讲道，其实选择经济学是机缘巧合，只是在许多学科中选择了一门自己不那么讨厌的，阴差阳错至今，才踏上了研究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道路。

“所谓农业、环境与发展经济学，其实就等同于应用经济学”，提到自己的专业方向邱筠如是说。邱筠表示，选择这个方向，更多的是因为自身对环境问题以及交叉学科的兴趣。

“我出生在江西的一座小城里。”邱筠认为，儿时山清水秀的生活环境可能早在她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与她对环境问题的兴趣不无关系。提起自己的家乡，邱筠脸上不禁浮现出了会心的微笑。

“当然，”邱筠告诉笔者，“兴趣更多的是在自我提升的过程中培养出来的。”邱筠认为，一个人很难对一门学科产生突然的兴趣，后天对自我兴趣的培养相对更为重要。邱筠提到，在学术研究领域，随着论文阅读量和对该学科了解的深入，就愈加能了解这门学科的魅力，对其的兴趣也会愈加浓厚。



## 环境资源价值评估

邱筠表示，对环境资源价值的评估是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她在论文和博士课题中也多次探讨过相关问题。邱筠告诉笔者，以她曾经研究过的美国一处海滩为例，以从远处沙源运输沙子拓宽海滩的方式围海填沙，可以在减少飓风对海滩建筑产生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起到吸引游客的作用。作为研究者，邱筠则关注在这项对海滩的保护措施生效后，沿海房产价值的变化，以衡量这项保护措施的收益。

邱筠表示，对环境价值的评估在美国是一项非常受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美国超过一半的人口与经济发达区域都聚集在海岸线以及近海处，对海岸线相关环境资源价值的评估便显得尤为重要。邱筠认为，不仅是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迫切需要加强对环境资源价值评估的关注度，这对环境资源的保护以及管理大有裨益。



邱筠游历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 我的“藤野先生”

“2012年，刚刚从杜克大学毕业的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成为了我的导师，我是她的第一届博士生。在学术上她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但在生活中她对我们也非常友好。”提起自己读博期间的导师，邱筠表示，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可以说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也是自己要一生学习的榜样。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对邱筠的深刻影响体现在她学术生涯的方方面面。邱筠提到，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十分注重对学生演讲能力的培养。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学生每学期要向同系同学分享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以及进度，在邱筠每次展示自己的研究之前，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都会要求她事先在自己面前预演展示。邱筠表示，作为国际生，英语水平很难达到和母语使用者相同的程度，而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对她演讲能力的严格要求和不断鼓励使她在语言方面收获颇丰。邱筠提到，在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的教学中，Sathya Gopalakrishnan 倾向于用问题来启发学生思考，而非灌输理念和知识，这样的教学模式也使她受益良多。

回忆起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对自己的关照，邱筠说，她对学生的关心不仅体现在学术方面，还体现在生活上。“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从来没有掏过钱。”邱筠回忆道，“据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说，她的导师在她博士期间也是这么做的，她认为这样的传统应该保持下去。”

邱筠指出，迄今，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身上对学术严谨的态度、不畏难题、坚持不懈的精神，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她表示，Sathya Gopalakrishnan 在

博士研究生时期对她的严格要求可以说是当今她严谨学术态度、对自己严格要求的滥觞。



邱筠游历美国阿卡迪亚国家公园

## 在 IESR 教学相长

“我应该是 IESR 第一批加入的老师”，提起加入 IESR 的经历，邱筠表示自己很幸运。“IESR 刚好需要环境方面的老师，和我的专业对口，恰好我的丈夫是专攻计量方向，也是 IESR 需要的对口人才”。邱筠表示，IESR 的研究环境非常好，人文氛围也十分适合进行研究，管理模式也比较先进。

在研究之外，邱筠还负责了 IESR 一部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我现在在给本科生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这门课。”谈及自己的教学体验，邱筠表示，IESR 的本科生学习非常积极，课前还会准备问题。邱筠认为，给本科生上课本身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授课本身就是对自己认知深度的促进。邱筠告诉笔者，“只有自己对问题的理解透彻了，才能更好地教会学生。”

邱筠认为，作为本科生最需要养成的品质在于乐观和毅力。无论在研究还是生活中，挫折都是常有的，而乐观和毅力可以保证你在遭遇困难时不那么轻易放弃。邱筠特别指出，提升整理东西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她告诉笔者，在博士期间，她的导师 Sathya Gopalakrishnan 博士曾经特地就整理文件的能力提醒过她。邱筠表示，在学术研究中，长期同时进行几个不同的项目是常见现象，如果缺乏对文件的归纳整理能力，就会在寻找资料时费时颇多。同时整理能力对多任务处理效率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

## 寻找绿水青山背后的价值

邱筠表示，在美国留学期间，她和丈夫曾经在北美游历了许多地方，从加拿大极北的冰天雪地到美国南方的夏日海滩。她告诉笔者，北美的自然风光以及对自然风光背后的价值的科学评估与管理都令人印象深刻。她指出，美国落基山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等国家公园已经建立超过了百年。自《寂静的春天》1962年出版至今，美国人对环境保护、环境资源科学利用、环境价值评估与管理的意识可以说是深入人心。

邱筠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其实并不属于某个个体，而是造物主寄予人类的礼物，人类其实有责任合理地开发

利用这些自然资源。邱筠提到，她曾经在纽约州阿迪朗达克山脉旅行时，自我仿佛沉浸在这片森林里，“有种想跳进去，沉醉其中的感觉。”自然景观对她的震撼也坚定了她对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信念。

邱筠指出，中国的环境资源管理是亟待加强和重视的，如九寨沟每况愈下的自然环境，其实归本溯源就是环境资源管理不到位的结果。回国后，邱筠也愈加关注国内的环境问题，她表示，通过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希望我国环境与资源的价值评估与管理也越来越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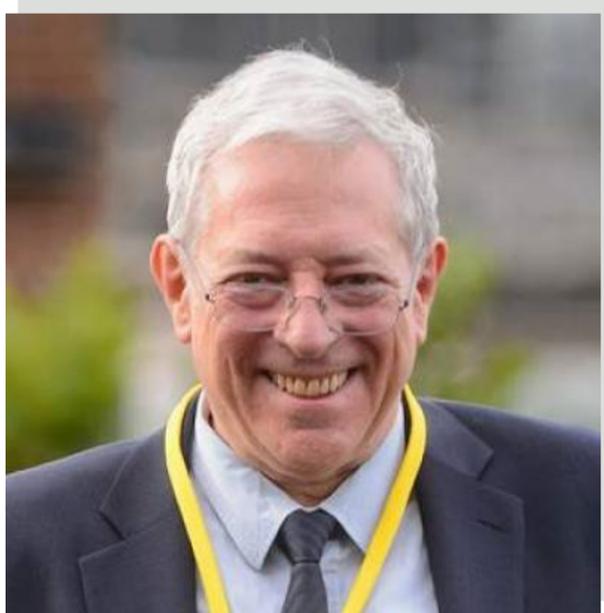
毕竟，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 名师零距离

### 人物名片

Andrew Chesher, 现任伦敦大学学院经济系 William Stanley Jevons 讲席教授, ESRC Centre for Microdata Methods and Practice (CeMMAP) 主任。

Andrew Chesher 教授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 (Royal Economic Society) 主席、英国科学院 (British Academy) 院士、世界计量经济学会 (Econometric Society) 会士、美国经济学会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荣誉外国院士。曾任 Econometric Society Monograph Series,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Economic Journal,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Econometric Theory, Econometric Reviews 等知名期刊副主编。研究领域包括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等。



2018年5月，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 Andrew Chesher 教授，受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的邀请，到我院进行为期一周的短期访问。Chesher 教授访问期间，为师生们带来了主题为“Endogeneity and Identification”的名师讲堂。在四天的课程里，Chesher 教授深入全面地阐述了多种计量模型和识别方式，带领师生们系统地学习计量经济学相关的理论和实例。此外，Chesher 教授还在我院的 seminar 上作了题为“21st Century IV: Extending the Scope of Incomplete Models”的报告，分享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工作之余，Chesher 教授也非常乐于同我院的青年教师及学生们交流，经常可以看到下课后，老师和同学仍围绕着 Chesher 教授站在白板前，一边板书，一边讨论问题；Chesher 教授的办公室里，也常常有老师和同学预约和他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在这期间，我院的学生记者有幸和教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采访，听 Chesher 教授分享他的学术经历和人生感悟。

**学生记者：**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学者，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您在经济学的各种分支中最终选择了计量经济学作为您的研究方向？

**Andrew：**我更愿意称自己为一个关心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家，而非单纯的计量经济学家，更准确地说，是我对人类行为本身的兴趣将我引向了计量经济学。在研究人类行为的时候，我发现这些行为可以被数据和计量经济学构建出的模型准确地表述和解释。同时，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可以相对更容易去构建模型和了解数据是否具有良好的分布形态。

**学生记者：**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我们常常会觉得计量经济学非常抽象，也因此更具有挑战性。它不像统计学那样相对是纯粹的数学理论，也不像经济学特定的研究领域例如劳动经济学一样关注具体现实问题。所以您是如何定义计量经济学的？

**Andrew：**在我看来，计量经济学是一门集建构、鉴定和预估行为模型于一身的学科，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可以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领域。至于统计学，我更愿意用数学性而不是纯粹性来形容。统计学是帮助理解抽样数据的概率和分布，而计量经济学更关注个体行为如何生成这样的数据分布。

**学生记者：**您可能也有了解到，我们学院刚刚成立了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 (Center for econometrics and

microdata practice, CEMP)。而您作为CeMMAP的负责人和创始人之一，可以给我们CEMP的发展——如人才培养和研究领域方面——提一些建议吗？

**Andrew：**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CeMMAP一些人才培养方面的项目吧。我们有面向教员和学生的培训课程、学术会议、工作坊和研究生课程。我们也常常邀请全世界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来分享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学术界的人物，也有诸如政府工作人员。在我们CeMMAP的官方网站上，你不仅可以看到工作论文的出版和展示，也可以看到一些软件使用新方法的分享。总而言之，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中心，首先需要提供给研究者和学生们一个丰富的资源库，使研究者和学生们彼此之间可以方便地相互交流，而且有机会和学术界之外的新面孔及新思想进行交流，这样才能跟上行业、学界的发展速度。

**学生记者：**在学术圈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现在有些学者为了尽快发论文出成果，追求论文数量，往往会去选择短平快的研究项目。您会对有这样想法的研究者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Andrew：**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位叫Wittgenstein的哲学家，他一辈子只出版了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质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他本人也因此进入了剑桥大学做教授。所以，短期内的论文发表数量并不重要，以数量为目标的心态也错误地鼓励了学者去研究小议题以求短期成果，但真正推动学术进步的大议题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和努力的。所以，我个人来说，希望学者们可以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由表及里地去做一个对人类社会发展有贡献的议题，同时，高等院校等学术机构也应该用各种方法鼓励人们对关系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研究。

**学生记者：**您平常会选择怎样的娱乐休闲活动呢？

**Andrew：**我有几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结束工作回到家后，我会陪陪她们，并不一定和她们一起玩游戏，而是会听她们说一说当天发生的事情。孩子的世界总是很美好的，我喜欢和她们一起，待在她们的世界里。

**学生记者：**作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您会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孩子学习经济学吗？

**Andrew：**不会的。我还是希望她们可以找到最适合她们自己的东西，就像我找到了最适合我的计量经济学一样。

# 学生天地

- 冯帅章：IESR小班教学不流于形式，切实为学生学习助力
- 点赞！本科班的“益友型”良师
- 润物细无声——记IESR本科导师制
- 接轨国际、全英教学，这两年他们收获了什么？
- IESR海外硕士项目学员顺利结业，即将赴美
- 我院举办多场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高考招生咨询会



## 冯帅章：IESR 小班教学不流于形式，切实为学生学习助力

2018年4月13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与经济学本科国际化创新班的同学们在课余时间相约中惠楼106B，就近期学习进行深入交流。交流会现场气氛活跃，不时传来琅琅笑声。

找研究课题，通过自己的研究得出研究成果，并要向其他学者阐述该课题的学术意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个过程就需要研究者有创造性思维。IESR的教学就是对大家进行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



冯帅章院长与同学们亲切交流



交流会上学生各抒己见

冯院长首先开了一个玩笑，提问在座的学生“学习成绩好还是差？”，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介绍，在座的学生愉快地“接梗”。其后，冯院长指出，玩笑背后是希望同学们不要单纯注重成绩，因为班内排名总会有先后，同学们更应该关注自己的成长与进步、学习感受以及在整个行业人才里的竞争力。要明白“大学阶段的积累是最重要的”，“第一名未必很好，最后一名也不见得差，也许是潜力还未发挥出来”。

### 【课程反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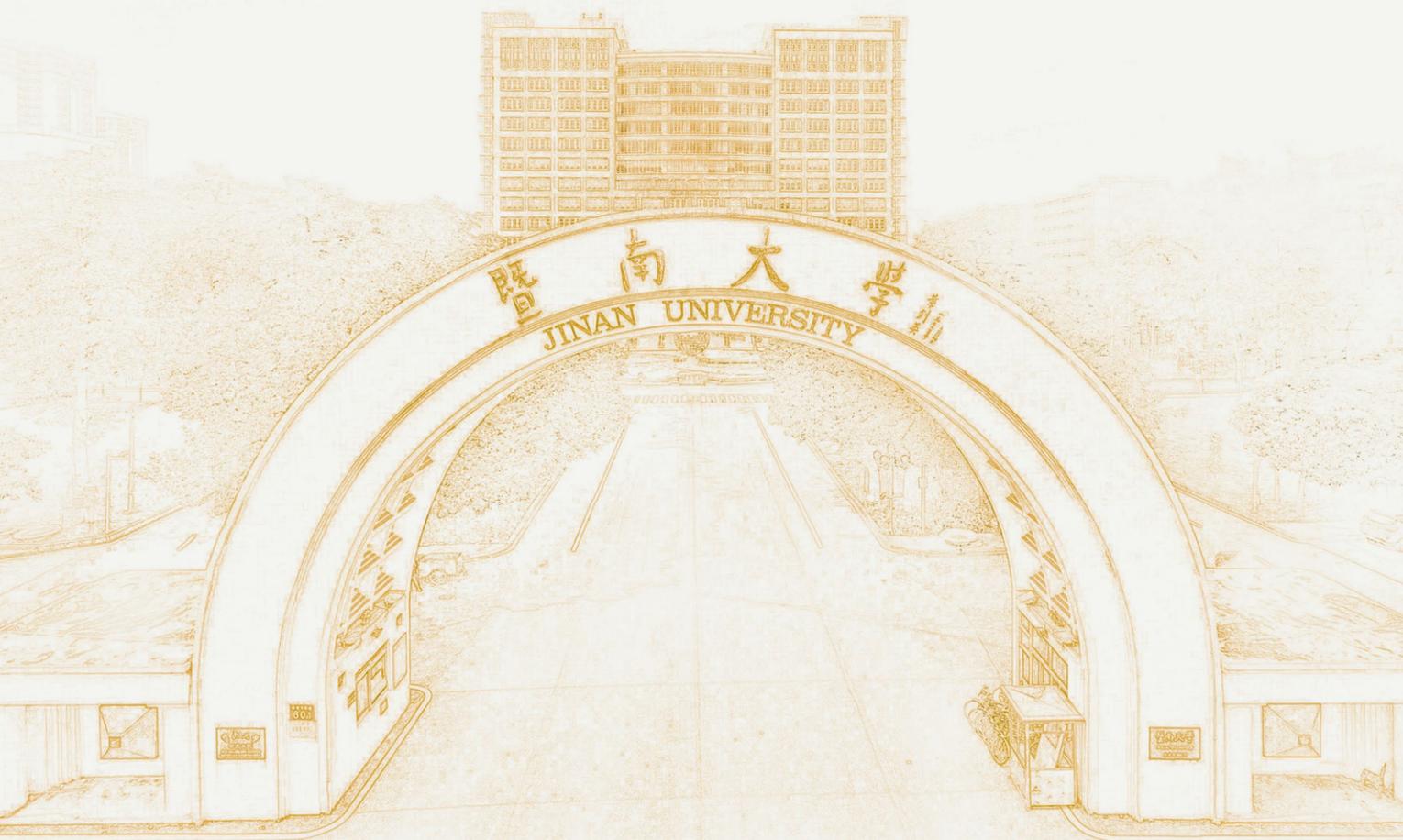
打开话匣子之后，学生纷纷对近期的学习进行反馈。他们纷纷表示对IESR有归属感，认为来到了“真正的大学”，学院的课程有利于培养经济学直觉，并给院内多位老师点赞。冯院长笑言期待学生的表扬信。另一方面，学生明言全英文教学增加了听课的难度，对此，冯院长建议学生提前向老师拿教学材料进行预习。他表示学好英语能提升个人价值，对长远发展非常重要。

### 【培养目标】

在谈及教学模式时，学生一致认为IESR实行小班制教学有利于师生进行直接有效的沟通交流，冯院长表示小班制确实是优势，但不希望其流于形式和数字，而应切实为学生学习助力。其次，基于学生对人才培养目的的疑问，冯院长先陈述IESR本身的特点是：“国际化”、“中国问题”和“实证导向”，即“以数据来说话”，培养模式是“偏学术化的”。但基于这一培养模式的未来发展趋向并不单一固定在做学术。之后冯院长继续阐发，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需要学生现阶段打下非常好的学术基础，而学术基础并不限于知识，更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做研究需要自己寻



交流会现场气氛活跃



关于学生反映的课程内容过少，某些课难度较大及老师讲授内容安排或有不妥等教学设置问题，冯院长听取意见，表示会作出针对性的勘查和相应调整。就课堂上学生怯于说“不懂”这一问题，冯院长进行开导，希望学生能转变心态，要勇敢说出“我不懂”，认识到问问题是一种学生在课堂上的特权。

### 【发展规划】

针对学生关注的招生与继续深造的问题，冯院长表示

招生宁缺毋滥，学院更看重的是生源质量而不是数量，并且希望把学生送到国外一流大学继续攻读硕博学位。得知一些学生对毕业去向与未来规划等问题感到迷茫时，冯院长表示现阶段学生“唯一能做的就是 prepare yourself”。对未来过于繁复的设想只会让自己更加迷茫，未来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此不要“那么功利”地事事听从学长的“趁早”式经验建议。冯院长随后进行解释并延伸：“只要你基础打好，你到时不管是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该做的事情你就一步步把它做好，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成功取决于你的目标”。目前，同学们应该针对自身发展需明确努力方向，为自己的梦想勇敢拼搏。

## 点赞！本科班的“益友型”良师

### 【好评如潮，活力满满】

近来，本科教学的两位老师频频被同学们点赞：

“现在就特别愿意上课！从不迟到，哈哈……”

“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课堂，参与感很强。”

“感觉老师很有活力，讲得很好，不仅没有照本宣科，还照顾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学习进度！”

这两位，就是 IESR 王芷苓老师与宋彦老师。他们作为年轻教师，教学经验并不丰富，却将自己的课堂变成了同学们开拓思维的乐园，让大家在听课的过程中收获知识与欢乐，也引领同学们沐浴在求知的快意与温馨中。他们究竟是用什么魔法，使枯燥的教学过程生动有趣的呢？

### 【化难为易，启发至上】

王芷苓老师告诉我们，在教学中，善于举例的方式方法非常重要。虽然站上讲台仅一个学期，但她在教学上已有了许多心得体会，效果奇佳。

她所讲授的课程内容是线性代数，因为深知数学课对于学生而言，特别容易引发畏难情绪，因此，王老师时刻谨记，切勿将抽象、枯燥而生硬的教学内容直接推出去让学生自己消化，应该先切换视角，站在学生的角度去通读一遍内容，深入理解，对所有的定理、符号与公式进行反刍性的拆解，找到最通俗易懂的比喻或者实例，力求生动、经典，在最短时间内帮助学生最大程度上将知识点吸收，这是对于学习上融会贯通、举一反三的优良基础。王芷苓老师举例说：“因为我自己也很爱玩游戏，受植物大战僵尸和狼人杀的启发，在讲授马尔可夫链的均衡状态时，我就写了一个人类大战僵尸的数学应用题。通过不断改变题目中的各个参数条件，逐步展开讲解。比如情境一是人类变成僵尸后不可逆转，情境二是加入了一种神奇的药水，每晚可以救回一部分人类，等等。”对此，同学们深有体会。IESR 大二同学武乘羽表示：“芷苓老师上课爱举一些生动有趣的例子，为原本严肃的数学课增添了许多生机。”

同样的，已有一年授课经验的宋彦老师也对此种教学方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认为讲课绝不等于“注入”、“填鸭”，课程应当富有启发性，以激发学生的思索欲与批判力为目的。所以他善于使用讨论的方式，在授课过程中不断给同学们设置问题。刚开始学生们不适应这种方式，但



宋彦老师讲授宏观经济学课程

是随着时间流逝，如今他们的回应已经非常积极，也从侧面树立了他们的自信心。IESR 大一同学柴秋香认为这样的授课方式“鼓励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本质，引导我们学会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宋老师称，当看到学生们在课堂上逐渐地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思考知识，是他最欣慰与满足的时候。

### 【贴近生活，学以致用】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二位老师也非常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引领同学们在课堂学习中打开自己的感知能力，培养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学直觉。

王芷苓老师在课堂中常重复一句忠告：“Keep your eyes and ears open to what's going on in our daily life.” 她认为，关注实事，留心小事，是每一个经济学学生的必修课。在自己的线性代数课堂上，她表示，自己更注重实际的理解和背后含义：“比如在讲一个复杂的定理概念之前，我会给学生举一些这些定理在生活中的应用实例，通过生活中实际的事情慢慢引入到理论上去，这样学生会比较记得住。”

她强调，市面上的那些经济学畅销书，如《牛奶可乐经济学》等，就是从小事出发去解释经济学的。而对小事及时事的关注，是本科生普遍欠缺的一项能力，因此她在教学过程中也十分留意培养学生这种习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切勿过分执着于书本知识，应当同时关注时事。她说：

“把书本上的东西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的能力，是特别重要的。”



王芷苓老师讲授线性代数课程

将课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宋彦老师亦是个中高手。他的独门武器是“紧追热点”：“比如现在讲课讲到了国际贸易，我就会把当前很热点的贸易战问题加入进来，并且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拓展。” IESR 大一同学龙腾对这件独门武器感受颇深：“宋老师经常通过案例分析给我们讲解理论。比如说讲解贸易赤字时，宋老师花了很多时间从美国的三大贸易赤字历史时期给我们分析贸易赤字是否是坏事，深入浅出。”

### 【亦师亦友，教学相长】

论在学生中的人气，两位年轻老师简直是“当红小花旦”与“爆红小鲜肉”，但他们受欢迎的秘笈却没那么神秘。他们真诚地袒露，学生们热情与爱戴令他们惶恐，因为他们打心底里认为，自己不过是比学生们在某个领域有更深涉猎的另一种程度上的“学生”。“芷苓老师为人亲切，讲解深入浅出，课后回答大家问题非常有耐心。此外，老师还非常关心大家的上课动态，她记得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名字。”提到与老师的相处过程，IESR 大二同学李欣桐如是说道。

为了不让同学们有障碍感，宋彦老师在课堂提问时基本从不点名，一方面，是为了激励同学们共同思考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消除“师高生低”的距离感，他表示这个习惯颇有成效：“即使是在课后，我的 office hour 学生们会主动来问问题或者对我的授课进行反馈，比如哪里他们觉得讲得不够清楚等等，对我帮助很大。我觉得他们的学习主动性都特别高，非常认真。”

对学生怀有浓厚感情的王芷苓老师忆起第一次授课时，虽然准备得很充足，却依旧紧张，学生们给了她莫大的宽

慰与鼓励。由于师生之间建立了强大的信任联结，有时她在课堂上被提问，一时给不出答复，她也会坚持深思熟虑后，为学生们以邮件形式作答，因为这种仔细思考过的回答会更加系统、细致与全面，学生们也对这种方式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王老师为爱生们所倾注的时间与精力，也换来了同学们的心。她感动地描述：“有一个学生曾因小测试没考好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在邮件里反省自己为什么没有考好，哪些地方还有不足，表示下次一定会更加努力，不辜负老师的期望。看到这些我真的被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打动。”

为回报同学们的信任与热情，让学生们能更高效地获取知识，王老师也在教学中如神农尝百草般不断变换新意，力求让课堂活跃起来：“我会采取一些有趣的授课方法，抓住他们的注意力。我们见过太多课程，老师在讲台上读课件，台下学生有一半都在睡觉。所以我想每一分钟都能

抓住学生的眼球，让学生在课堂的教学节奏里头跟着我把这节课“畅游”完，满足又轻松。”此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不“恃宠而骄”的王老师，还坚持着独特的授课原则：“我不愿意拖堂，因为我觉得一堂课45分钟已经算是学生能集中注意力的极限了，只要在一堂课尽百分之两百的努力把课讲好，我觉得就足够了。”提到上课体验，IESR大二同学鄢瑜说：“课程紧凑，感觉一节课过得很快，跟着老师的思路感觉就像坐过山车，很爽很过瘾。”

正因为这份良好的心态，二位老师才会将每一节课都视为自己成长的坚实脚印，尽力呈现出最佳状态，与同学们分享由智慧凝聚的甜美果实。

教学相长，是一件幸事；良师益友，愿能长伴人生。让我们为本科班二位可爱而努力的好老师，加油点赞。



## 润物细无声 —— 记 IESR 本科导师制

一提起经济学，许多人第一反应是：“这是一个让你将来赚大钱的专业！”刚接触经济学的同学们，有时也不能“免俗”。“进 IESR 之前，我就想着将来进入高端的金融行业，赚大钱！”亚婕同学笑着说。

事实上，经济学也是一门需要坐得“冷板凳”的严谨学科。不过，坐“冷板凳”是循序渐进的过程。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IESR”）的导师制，帮助还有些懵懂的同学去感受这个过程。

“最近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困惑吗？”

“对于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找一些文献来读一读。”

如今，导师与学生每周或每月见面交谈，已成为 IESR 的寻常景象……

### 【导师制的三棱镜】

本科导师制并非 IESR 独创，但为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配备导师，在国内仍比较少见。通过导师制，IESR 努力做到因材施教，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

文文同学回忆道：“一开始，我会去看老师们的简历，了解老师的研究方向，发现朱宏佳老师做的环境、房地产方面的课题自己挺感兴趣的。另外平时学院会议有接触到朱老师，感觉他很认真负责。”肖雄同学则坦言因为自己喜欢数学和统计，所以选择研究计量的史炜老师作为自己的导师。

李蔚同学选择蔡澍老师作为导师则是因为一次采访。那一次李蔚同学作为学生记者，采访蔡澍老师对精准扶贫的研究。采访中李蔚意识到，对扶贫机制和效率的研究，

将切切实实帮助到遥远大山中的人们。他至今仍然很感慨：“我第一次了解到，做研究、写文章，有时候不仅仅是个人的事儿。好的经济学研究，是与社会脉搏紧紧相连的。”

在大二上学期，同学们会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专攻某一经济学领域的老师。再经过学院协调和老师选择，最终确定导师关系。

然而，“理想”与“现实”往往有一定的“差距”。导师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给了同学们意外的惊喜。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懒，史炜老师很认真严谨，我想他会通过布置任务来 push 我！”然而，老师选择的方式却和肖雄同学想的不太一样。史炜老师并不会具体安排任务给肖雄，“我觉得兴趣很重要。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有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我不会去限制他，只要他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都 OK。”因此，当肖雄提出某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史炜老师会帮助他圈定一个合理的范围，让他自己寻找文献阅读，再在下次导师见面时进行反馈，一起探讨。

私底下朱宏佳老师也给文文和亚婕同学不一样的感觉。“选朱老师为导师后，我们发现平时开会严肃的朱老师，其实很亲切和蔼。”文文同学说道，“他常常会关心我们学习压力大不大，让我们学习与娱乐也要兼顾。每次和朱老师都能从学习聊到人生和未来，挺有意思的，这也促使我进一步去思考。”

有时，朱老师看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学生可以消化的文章时，会转发给学生看，然后一起交流。“朱老师常常告诉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兴趣，不能把别人给的任务忙



IESR本科同学合影

完了，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亚婕同学对朱老师的这句话印象很深。

### 【经济学的想象力】

每次面谈后，朱宏佳老师会给学生数据，给她们一个处理方向，让她们自己去探索。“一周后，她们给我反馈处理情况，如遇到了什么困难，做到哪一步了。我再针对她们的问题进行解答。”不过，总是面对冷冰冰的数据，亚婕同学一度觉得快要失去兴趣：“朱老师指导我们清理空气污染数据。但大部分的空气指标常常是冬季差、夏天好，北方差、南方好，久而久之觉得很无聊。”

了解到亚婕的想法，朱老师跟她讲了数据之外的故事：看似很有规律的东西，很可能具有“人为因素”。此外，朱老师还向学生介绍用卫星灯光数据衡量经济发展，文献中如何讨论影响基金经理业绩的因素等等。“感觉朱老师提到的事情很神奇。他让我重新觉得看似枯燥的数据也能很有趣，值得深挖的地方还有很多！”

宋彦老师也常常给乘羽和乃嘉同学发一些有趣的经济学文章，让乘羽印象较深的是一篇伯克利本科生写的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论文。论文中，作者选取一个经济学职业论坛网站，抓取论坛话题及其评论数据，通过文本挖掘，作者发现，在一个与女性相关的话题中，评论的学术和专业导向减弱了，还伴随更多的隐私信息和外貌描写。“读完之后感觉作者的选题和研究方法很有趣，没想到经济学也可以这样研究！”

“和老师交流多了，视野更加开阔，意识到还有很多



IESR两周年院庆师生合影

要学，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亚婕觉得能选择朱老师作导师很幸运，“遇见朱老师之前，我不太了解学术；和朱老师谈了之后，觉得做学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 【细水长流】

“罗马建成非一日之功。”学术素养的培养亦是如此。通过导师制，同学们跟着导师，从数据收集、项目策划，再到项目执行、论文撰写等等，深入了解科研的整个过程。

亚婕和文文同学对空气污染这一问题感兴趣，她们的课题《短期空气污染抑制政策的效果及影响机制评估》得到了2018年的挑战杯和校级大创立项资助。“朱老师会循序渐进让我们掌握一些做实证研究的技能。比如数据清理，老师给我们一些原始数据，让我们尝试整合、配对，处理缺失值、重复项等等。”近一个学期下来，她们的实证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朱老师也很欣慰，“虽然她们刚入门，还不能独立做科研，但是她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科研思维和自己的想法。”

肖雄和稚雯同学的课题《不分“闰左”可得安居乐业？——用主观幸福感对混合居住模式进行价值判断》获得了2018年的广东省攀登计划专项资金重点项目、挑战杯和国家级大创立项资助。相关问题的思考，却可以追溯到去年 IESR+“数据驱动的城市设计 & Talking data 科研合作战略”讲座。

那时，史炜老师和肖雄同学一同听讲座，他们了解到，Talking Data（一个移动数据服务平台）上大量的用户特征数据较好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如不同阶层人群存在时空折叠（即工作的地点、消费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讲座还提到社区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听完这场讲座之后，我们两个都觉得挺有意思，便一起收集相关文献，这可以说是课题的缘起。”史炜老师回忆道。

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肖雄同学发现，配建保障房政策中对混合居住的安排缺乏理论支持及合理的价值判断。一个有价值的课题便慢慢成型了。

如今，学院很多同学也经历了课题立项的过程。通过导师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大家立足社会现实，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积极进行课题立项申报，共获得5项“2018年度暨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及6项2018年暨南大学“挑战杯”竞赛项目立项。“老师的知识面很广，在选题过程中给了我们很多启发。”肖雄说。在立项申报书的撰写过程中，导师们也给予学生很多建议，使申报书更有条理。

### 【余记】

和导师相处的过程中，有很多让同学感动的瞬间。寒假时，李蔚同学尝试自己做一个小研究，他将实证的思路发给蔡澍老师看。让李蔚同学感动的是，蔡老师对思路做了很详细的批注，大到总体思路的改进建议，小到某个字词的运用。

肖雄同学则记得，在准备挑战杯立项那会，不巧史炜老师也在准备一个学术会议。一天晚上，他给史炜老师发了一封邮件询问立项相关问题，“凌晨2点，我收到史炜老师的回复！当时特别震惊！”

亚婕和文文几乎每周都同朱老师见一次面。“我们知道朱老师自己的科研很忙，还肩负一定的学院工作，还坚持每周找我们谈一次，挺感动的。”

对于 IESR 的老师们来说，对学生负责总是要放在工作的第一位。“我觉得教学和科研对大学老师来说都不可偏废，无论教学对科研是否有帮助，都应该把教学工作做好，对学生负责。”朱宏佳老师说道。

怀着同样的初衷，折射出不一样的光彩。导师制的故事，还将继续着……



## 接轨国际、全英教学， 这两年他们收获了什么？

回想起刚进大学时，读完一篇英语四级文章都如履薄冰的自己，如今的李蔚已经能主动到海外网站上浏览资讯。而给他带来这一转变的，正是这两年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以下简称 IESR）的全英学习。

和许多习惯于中文授课的中国学生一样，李蔚一度把英文看作接触国际前沿知识的“拦路虎”。“但在 IESR 的全英培养下，我硬着头皮把英文读下去，久而久之不再觉得语言是很大的障碍，这也使我们得以更自由地接触经济学最前沿的成果、了解更多资讯，这对未来发展帮助很大！”他说。

参照北美一流经济系研究生培养模式，IESR 设立的本专业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采用全英教学模式，实现教材和教学方法上的国际接轨，力图打造国内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黄埔军校”。

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其实是不小的障碍。IESR 提出采用全英模式讲解经济学，究竟有怎样的用意和效果？

### 【为什么用英文教材？】

英文或中文教材，知识点可能是一致的，本质上只是盛放知识的“容器”不同。不过，有时“容器”的特性也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即将就职 IESR 的张毅老师，本科就读于密歇根州立大学。对于中英教材的区别，他有着自己的见解。

现代经济学发源于西方，很多经济学术语都由西方文献翻译而来。同时，国外经济学学科沉淀时间较长，发展也更加充分。因此，“对经济学来说，英文教材选择性更

多，且往往由经济学界知名教授编写、并经过美国大学的教学检验，更加完善与成熟。”张毅指出。目前，即使是中文授课，国内高校也往往采用英文教材的翻译版本。但是，“中文的表达习惯和语境，可能使专业定义的表达不太精确，而直接阅读英文原文，在理解上能带来不小的优势。”

IESR 大二本科生陈思棋对此感触颇深：“直接阅读全英教材相当于直接去跟作者对话，直接理解作者的思想，而不用再通过翻译者这个‘中间人’。虽然很多英文单词能够找出相对应的中文词汇，但将词语放在英文语境中，涵义就产生了细小的区别，而这些细微的区别往往对于我们理解和掌握知识有非常大的影响。”

### 【中文重归纳，英文重概念】

不少同学表示，在刚刚接触英文教学时，学习的效率比较低。“对全英教材一开始我不太适应，在中文里很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如果放在全英的教材里，就显得晦涩难懂，使得学习进度很慢。”

张毅一语中的，这是因为中文与英文授课模式存在很大的不同。中文表达注重归纳总结，因此中文教学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总结知识点，建立经济学的知识体系。然而，学生可能会忽略对单个概念的透彻理解。相反，英文教学非常注重定义，通过对一连串概念的直接叙述，让学生形成对经济学的认识。相比中文教学模式，全英文教学对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相对较慢。

授课方式区别的背后，往往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张毅坦言，为了适应全英教学，他不得不舍弃在高中时“过分注重整体框架”的学习习惯，强迫自己改变自己的思考模式，对每一个经济学概念和意义进行深入的思考。通过这种改变，张毅得以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为之后更深层次的

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全英文教学让我能在本科生阶段就探索前沿课题，这也是我成功申请经济学博士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 【克服学习的“惰性”】

对 IESR 的同学们来说，全英授课无形中给予他们一种推动力，让他们养成更好的学习习惯。

“以前用中文课本的时候，容易产生惰性，感觉课前一扫眼就大概知道课本在讲什么了。”陈思棋笑着回忆道。可如今，她却没办法如此“清闲”。“由于英语并非母语，这种‘扫一眼’的预习方式已完全不奏效，这就‘强迫’我课前要花上一定的时间去预习！”

此外，全英课堂上难免有未能马上理解的知识点，而小的疑点可能阻碍深入理解，这也督促了陈思棋在课后进行知识整理，令她“温故而知新”。大一本科生陈厚全对此深表赞同，“在全英的环境下，我需要课前、课后做大量预习复习，才能完全领会老师所讲的内容！”

被动接受知识、不愿主动提问，也是不少中国学生的通病。这一“惰性”在全英教学模式中也得以克服。据不少同学反映，课堂上不太敢开口说英文，有问题宁可等到下课用中文问，本科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IESR 副教授史炜建议同学们可以先从一些简单的问题开始，慢慢锻炼起来。

“There is no silly question!” IESR 的老师们经常跟同学们这样说，鼓励大家提问。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掌握所学知识，IESR 也为每一门专业课设置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助教，每周老师或助教都有固定的答疑时间。“之前在其他学院，每周没有答疑时间，同学们有问题都是私下解决。”陈思棋坦言，进入 IESR 之前，她较少向老师提问。“来到 IESR 之后，慢慢受到身边同学的影响，我也慢慢地开始提问。”她对这样的转变也很开心，“能提出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知识在不断被消化吸收，知识体系在不断构建！”

### 【全英授课的教学相长】

在教学过程中，张毅也看到，由于国内部分学生存在语言障碍，全英文授课有时会让部分同学不适应，并因此对整个课程失去兴趣。这也督促 IESR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为了让同学们保持学习的热情与动力，IESR 定期开展交流分享会，听取学生建议。“老师有时候讲课不是按照课本的思路走，或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给复习带来一些困难。”“感觉老师的教学进度有点快，希望可以放慢些。”……交流会上的反馈声音，让学院和老师们及时了解同学们的想法，并适时作出调整。

提升全英教学效果，也是老师和同学们相互配合的过程。“为跟上老师的节奏，一定要全程专注。此外关键是预习，自己吸收一遍课文的内容，然后标记好难点，带着难点疑点去听课，会大大提高吸收知识的效率。课上若是真的没听懂，课后就要自己找渠道去解决，这也是一种学习能力。”陈思棋介绍道。

张毅建议，学生要适应全英文授课，除了预习与复习外，对于概念涵义一定要反复思考，确定自己理解到位。

### 【多元的收获】

IESR 很多老师都是国外知名大学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他们多样的经历也给同学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学习体验。陈厚全觉得，老师们从不同国家毕业，通过上他们的课，可以感受到了非常多元的文化和知识体系，“这是最大的收获之一！”

英文教学从某种程度上也给予学生自由获取信息的能力。对很多中国学生来说，英文是他们了解国际前沿知识的较大障碍。而英文教学恰恰打破了这一屏障，李蔚发现，经受住 IESR 全英培养的考验后，语言不再是障碍，现在的自己可以自由地接触经济学最前沿的成果。

出国深造也是很多同学发展的方向，这也要求同学们适当了解国外的经济社会背景。IESR 大二本科生张浩然就觉得，英文原版教材是一个了解外国社会文化背景很好的媒介，“教材的案例更多来自欧美，这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跨文化知识背景。这些案例可能会在将来写论文、或是与国外同学交流时用到。”

此外，全英授课为将来出国留学打下了更扎实的基础。“所学知识的概念和表达方法和国外介绍的一样，不会出

现明明学过，但是因为语境不同而产生障碍。”

对于直接选择就业的同学而言，英文能力也能成为职场上的重要加分项。如今，英语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国际上的工作交流大多通过英语，“在 IESR 培养到的英语能力必能对日后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陈思棋说道。

##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学员 顺利结业，即将赴美

近日，参加 2017 年海外硕士留学项目美国德州 A&M 大学的学员们已完成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精心安排的系列课程学习，全部顺利结业，并陆续收到美国德州 A&M 大学的 offer。

参加结业仪式的有 IESR 海外硕士留学项目的学员和老师们，出席仪式的老师分别是谷一桢、朱宏佳、邱筠、孙伟增、黎莉。结业仪式上，IESR 谷一桢副教授对完成预培养课程学习的学员表示祝贺，也期望学生们未来到美国学习，能够找准目标、踏实努力、学有所成。

随后，学员与老师们就未来在国外的学习生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激奋人心的时刻来了，每个学员依次上台接受老师颁发的证书。朱宏佳老师、孙伟增老师、邱筠老师分别为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学员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对未来充满期望。



谷一桢副教授



交流现场



颁发结业证书



师生合影

## 我院举办多场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高考招生咨询会

6月25日-28日，为了进一步加深广大考生和家长对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专业的了解，我院于广东省实验中学、福建省福州一中高中部（大学城校区）、肇庆市肇庆中学等地的中学举办了多场招生咨询会。

咨询会现场人潮涌动，考生家长以及考生自己对专业录取条件、本科生培养计划、院系教学条件等问题都进行了询问，我院老师都给予耐心详细的解答。多位学子与家长对我院全英文教学模式、雄厚的师资力量、国际化的学术活动、专业的社会调研活动、以及丰富的国际交流机会等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热烈的咨询氛围也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6月28日，我院唐飞燕和林嘉瑜老师受邀参加2018肇庆市高考志愿填



福州招生咨询会现场



广州市第二中学



广东省实验中学



广州市第六中学



广州铁一中学



咨询会现场

报现场咨询会，并作为暨南大学招生宣传代表参与高招会直播，同步观看直播的人数达7万多人，咨询会现场门庭若市，各中学的家长和学生纷纷前来咨询如何填报志愿。

直播期间，西江网主持人对暨南大学的热门专业、填报志愿的注意事项等进行了提问，我院唐飞燕老师一一进行了解答，并介绍了我校作为中国第一所由政府创办的华侨学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创设商科百年名校之一。暨南大学人才培养不仅在商科领域卓有成效，在医学、新闻传播学、中药学等领域也位居全国前列。



唐飞燕老师在接受采访

唐飞燕老师介绍，暨南大学注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同时也十分重视学校国际化发展，近些年，暨南大学成立了多所与国际接轨的研究院，努力打造世界最顶级的资源共享平台，盘活全球最领先的学术资源，并新增了若干新的专业，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汇聚本研究领域最优质的师资队伍，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并参照北美一流经济系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国际学术视野、又熟悉现实国情，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优秀人才。

通过此次招生宣传，为当地学子填报志愿答疑解惑，让有意向填报暨南大学的学生和家长对暨大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让更多的家长和学生了解到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一流的学习环境和学术资源。

# 图说

暨南大学五一环校跑活动

